

- 51 家祭无忘告乃翁
—— 记黄埔同学、民革党员毛鸿基 / 闫锋
- 54 我的部队在长沙 / 顾少俊

我的黄埔前辈

- 57 一位黄埔四期生的人生经历 (下)
—— 记父亲姚国俊 / 姚建

历史

口述历史

- 63 新疆黄埔人的空军生涯 / 张玉堂

黄埔往事

- 67 抗战大片《血战台儿庄》背后的黄埔故事 / 李务起

黄埔研究

- 70 抗日伤残官兵生产自救的安置事业(下) / 杨守礼 黄胜利

黄埔收藏

- 76 我珍藏的黄埔生朵含章签名本《军队教育》 / 单补生
- 83 一寸丹心图报国
—— 从一枚六分校实寄封说起 / 王翀

黄埔日历

- 88 1926年5月10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广东省农民大会及第六次教育代表大会代表900余人到黄埔军校参观 / 贾晓明

黄埔连载

- 92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十二) / 熊子杰



双月刊单月1日出版
2023年第2期总第209期



2 曾经沧海横流渡 回首皆是动人歌 —— 四川黄埔同学风采



40 黄埔“独臂将军”第一人刘畴西



63 新疆黄埔人的空军生涯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Andro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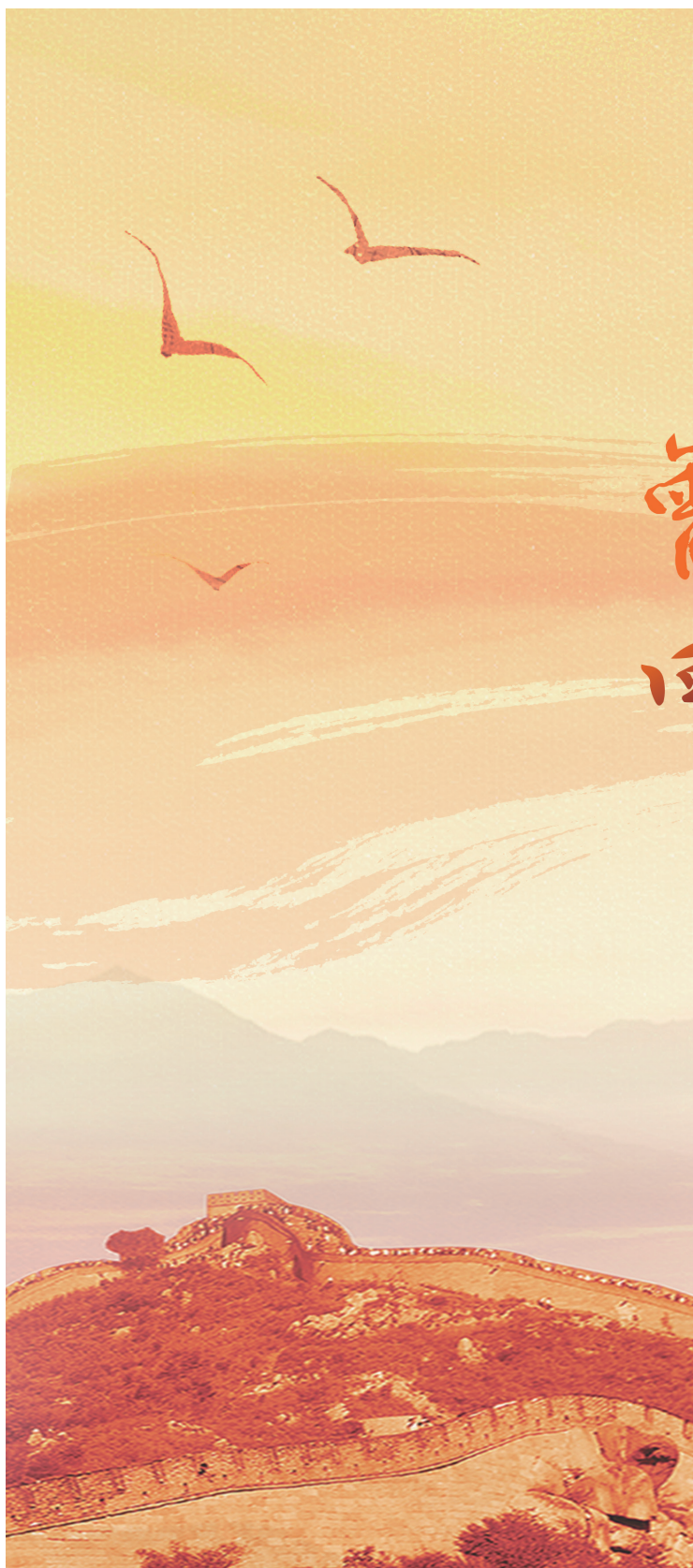


iOS

1935年，黄埔军校在成都设立分校，培养军官达6000人。1937年，黄埔军校本校西迁，1939年迁至成都。14期至23期共3万多学生皆在成都时期的黄埔军校受训毕业。他们中绝大多数奔赴抗日战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乃至滇缅前线，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1949年后，他们有的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继续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有的学习深造，成为铁路工人、学校教师等，为中国的建设、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更多的回到广袤的农村，隐姓埋名过着平淡而又平凡的生活……

1988年10月，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他们踊跃入会，开启了人生中又一不平凡的新篇章。他们秉持“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促进川台交流，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建言献策、献智出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

白驹过隙，回首成歌。当年从成都北较场走出来的热血青年多已离世，健在的也已进入鲐背之年。2020年以来，我们着手采访黄埔老人，旨在用笔和镜头记录下他们热血激昂、波澜壮阔的人生，特别是发生在他们身上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故事，更希望黄埔同学的殷殷赤子情、拳拳报国心能够广泛传扬，激励更多黄埔后来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曾经沧海横流渡 回首皆是动人歌

—— 四川黄埔同学风采



张修忠 :乐观人生

我老家在湖北天门市，过去叫天门县，只有小学没有中学。我跑到应城县一个工会办的中学读初中，毕业后到武汉考入省立三中（高中）。1938年，我16岁，黄埔军校到武汉招生，共有1600多人报名，录取了160多个，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和16很有缘！后来碰见黄埔同学问我是哪一期，我就开玩笑地说3个16。初看录取榜时，没找到我的名字，以为落榜，就打算去延安。当时在我看来救国的路只有这两条，不是上黄埔军校就是去延安。后来遇到一位同学，他说在录取榜上看见我的名字，我又专门找报纸查看，终于看到我被录取，这才去黄埔军校报到。

我们黄埔新生乘坐商船由武汉到重庆，在重庆下船前往铜梁，学校把我们在铜梁的时期叫做预备教育。预备教育结束到成都报到后，我们就住在成都青羊宫草堂寺里面。学校没有正规教室，用的是草屋顶和泥巴墙搭建的那种房子。到成都半年以后，才开始考试分科，分步、骑、炮、工、辎，就是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交通兵。分科的时候，想当炮兵的



张修忠，1922年出生于湖北天门。193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随第2军参加反攻宜昌之战和滇西远征军抗战。1949年起义。1950年底考入成渝铁路重庆筹备处（后改为成都铁路局），历任工程技术人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省政协委员、省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副主任。2023年2月8日在成都离世，享年101岁。

人很多，因为炮兵需要掌握的知识多，所以学得多。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的就是炮科。还有一个原因来自虚荣心，炮兵和骑兵、辎重兵都要发马靴，穿上马靴特别精神。由于我年龄小又写得一手好字，队长早就看上我并让我周末帮他刻蜡版，所以到分科的时候，他知道我也想学炮兵，就当我的推荐人，帮助我如了愿。我进入16

期1总队炮科学习。毕业后，在一位同学的引荐下，我被分发到第2军的炮兵营。后来遇上军部选见习参谋，我又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加上书香门第出身，被选到了军部当见习参谋。

1941年秋，为了牵制日军，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我们第2军奉命反攻宜昌。快要成功攻占宜昌时，日军施放毒气，都是糜烂性毒气，我们没有防毒面



/ 2004年6月,张修忠(右八)参加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座谈会。

具，官兵中毒者甚多，伤亡很大。

1942年春，我们第2军被调往成渝公路永川至隆昌沿线整补待命。是年秋，奉命分两路：以第76师经由川滇东路之西昌至滇西之元谋、永仁地区集结整训待命；军部及所属炮4团、工1团、炮55团战防炮1个营、防空学校编组高炮1个营，机械化学校编组摩托化1个营及第9师、新33师经由川黔西路之叙永、毕节向贵州之晴隆至盘县地区集结。12月各部队均到达指定地点，奉令调归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

1943年元月，杜聿明从贵州普安县军部所在地出发，沿

途检阅了部队，命令第2军开赴滇西祥云、下关地区整训。3月，杜聿明再度来到祥云县，召集全军官兵训话，要求部队抓紧整训，准备获派新的战斗任务，并

许诺为第2军更换美式武器装备，鼓舞了部队士气。

1943年春，蒋介石下令在云南楚雄成立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陈诚任司令长官。陈诚调



/ 2010年,张修忠(中)接受媒体采访。



/ 2013年6月，张修忠（右三）参加在成都召开的黄埔论坛。



/ 2015年8月17日，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任晓鸣给张修忠（右一）佩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霍揆彰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进驻弥渡县，改令第2军归霍揆彰指挥。霍揆彰令第2军军部进驻顺宁云县地区（澜沧江以西），第9师进驻怒江以东之镇康县德

党地区，新33师进驻耿马安宁地区，第76师驻顺宁云县地区。部队一面担任江防，一面作备战训练，并更换美式装备。

当时防空学校有5个高射

炮连，抽了一个高炮连配给第2军。防空学校带队的连长完成交接任务后就回防空学校了，我们参谋长就让我负责高射炮连。我说：“我不是学高射炮的，怕干不了。”他说：“他们的排长都是学高射炮的，又不要你去教他们专业，你去搞管理。”这样，我就由军参谋处调任高射炮连长，到滇缅边境的耿马守备猛撒机场。

上级规定凡换美式装备的部队，团长以上人员必须轮流去印度接受美方的军事训练，时间是每期6个星期。其余副团长以下军官则指定到昆明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由美方主办）受训。我亦于1943年秋参加了昆明乾海子干训团的炮兵第4期受训，3个月结业。但一直未给我们装备美式高炮，仍使用防空学校拨来的意大利造37式高射机炮，直到抗战胜利缴回防校。

1943年秋，第2军防区内民间发生了“回归热”症，迅速蔓延到部队。由于此病来势凶猛，我们又缺医少药，半年间，全军病死官兵近千人，加上交通不便，后勤补给常难以为继，幸好得到当地政府和民间头人的帮助，他们与部队共建军民合作站，发动民众大力支持部队，解了不少燃眉之急。

1944年4月下旬，将要强

渡怒江反攻的时候，第2军突然改归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指挥，并作为左翼军参加滇缅边境的反攻战役。在反攻战中，第2军初期强渡怒江，攻占平嘎，再克象达，后期攻占了芒市、勐嘎、勐棒等地，终于在1945年元月与驻印军新1军会师于芒友。

1949年，我随第2军在郫县起义。起义后不久，成渝铁路开工，我参加了成渝铁路的修建工作。那时候修铁路条件很差，主要由各县的民工出工出力。成渝铁路修建完工后，我又先后参加宝成铁路、川黔铁路的修建。最后，我以副总工程师的职务从铁路系统退休。

1988年，四川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我最先加入。后来组织又安排我任黄埔军校同学会（总会）副会长，最后一次到北京开会是在2003年，之后身体渐渐不行了，就没有精力再出远门。但是我很乐观，乐观一点对身体好。

我有1个女儿、3个儿子，最大的儿子已是古稀之年，最小的也已是花甲，他们都在铁路系统工作，见证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见证了中国从贫困弱小的国家，到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大国。我永远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 张修忠含饴弄孙。



/ 张修忠看杂志。

金玉生：永不停止学习的一生

我叫金玉生，1926 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小史店镇申营村。9 岁开始读私塾，两年后

转入镇上的小学，由于勤奋，我的成绩一直很好，还担任学生干部。入学后，我就开始接受抗日

救国教育。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11 岁的我有了保家卫国的信念。

1943 年秋，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县中，但家境贫穷阻碍了我的求学之路。后得知汤恩伯正在河南叶县建鲁苏豫皖边区学院，还为学生提供免费食宿。我刚开始错过了免试保送的机会，后来凭自己的努力通过了考试，顺利入学。但好景不长，1944 年三四月间，日本侵略者轰炸了我们学校，随后学校西迁到河南南阳，但因为经费短缺，无法继续为学生提供免费食宿，我又在此时感染重病，只能休学回家调养身体。

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攻进了我的家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犯下了累累罪行，百姓痛苦不堪。我二哥的岳父 60 多岁，被日军抓住并逼他背几口将近 100 斤的大锅。他说我走不动了，日军就用枪托砸他的腿，见他被砸倒，实在走不了了，就拿刺刀刺他，最后，还倒上汽油，把他点着，这才离开。二哥的岳父看到有个水坑，大冬天的就躺到水坑里，把火熄灭，然后爬起来钻到附近农村的草窝，后来被人救了，勉强活了下来。



金玉生，1926 年生于河南省方城。1944 年考入黄埔七分校 19 期（本校 21 期）骑兵科学学习。1949 年随部队在灌县（今都江堰）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平叛和剿匪。1956 年调入成都军区军训部工作。退休前任成都陆军学院后勤干部训练大队训练处处长。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让我更加坚定了保家卫国、抗击侵略者的决心，在同村就读黄埔军校16期李贵根的建议以及家人的支持下，我报考了黄埔军校七分校第19期，并顺利通过考试。

入学后，先是入伍生教育，学习射击、投弹、刺杀，同时补习数、理、化、国文、英语。1946年元月升学考试，考场设在大操场。有些有钱人家的子弟读书不行，怕通不过考试，就找别人穿上我们的学生服替考，结果被监考老师发现，全都被取消考试资格。最后，大家根据成绩来分科，成绩最好的分到炮科，然后是工科、通信科、骑兵科。

我被分到骑兵科，我之前从没见过马更没骑过，就挑老实的马骑，不敢要调皮马。开始学习骑着马转圈、转八字，然后学马背上的技术、马上射击、马上战术等，学了两年。此外，还要学习俄文和五大教程，有战术、兵器、地形、交通、筑城。筑城主要是修工事，包括单人掩体、指挥部的掩体等。地形学就是测绘地图，学校提供10平方公里让学生进行测绘。

1947年9月18日，陆军、空军在咸阳举行毕业联合对抗大演习，我扮演“红军演习团搜索排”排长，最后以前10名的成绩光荣毕业。第一战区长官胡



/ 1959年底，金玉生即将参加甘孜剿匪，特意拍全家福留念。

宗南把我们前10名留下，并安排我到某部人事处工作。没多久接到命令，21期黄埔学生（由于七分校撤销，我们并入本校21期）一律下派连队。90军参谋长、四川三台人肖碧光听说后，就来找我们谈话：“我欢迎你们来。”经过商议后，我们10个人同意加入川军，并随即前往西安户县即现在的鄠邑，帮助指导训练班长，随时准备去四川带兵。两个月后到达广元，我被分配到25师675团2营机枪连当排长，负责教授机枪连的班长射击技巧。

1949年10月底，我跟随所在部队在灌县（今都江堰）起义。1950年，国民党特务煽动基层群众，部分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开始叛乱，有些起义后的原国民党部队枪杀中国共产党派驻的军代表，随后叛变。我们团参加了平叛工作。我所在部队官兵

大多是穷苦人家出身，随着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不断深入了解，大家开始初步有了阶级觉悟，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爱国爱民。我的内心也逐步起了变化，尤其是家里来信说分到了房产和土地，这让苦了一辈子的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对共产党更加认同。当被问道我们95军是否愿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60军合并时，我们全部赞成。合并后，我到540团3连担任副连长，正式成为一名解放军军人。

8月，我们接到命令，我们军9个团，每个团抽1个连，除9连以外，剩下8个连组成新军指挥部到重庆，编为重庆市公安局公安中队6中队。我们从此戴上了公安臂章，我任副中队长。

其间，我前往现在的西南科技大学深造。在那儿，我学习



/ 1964年，金玉生(前排中)参加全军比武大赛后与战友合影。

了社会发展史和关于共产党的先进理念，并成功加入共青团，这段时间的学习经历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过去的谣言说共产党不相信我们，不让入团。我申请入团时，我们班上批下来4个，我的一开始没有批下来，我有点消极，后来知道是因为我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副连长，需要校本部批。

后来，我还参加了西南军区的扫盲实验班，为学员们进行扫盲辅导，由于我辅导得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51年11月，我又参加重庆市土改工作团，曹荻秋亲自给我们做动员。我担任重庆市南川县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1955年底，我参加成都军区公安干部集训，表现比较好，就从重

庆公安总队调到了成都军区干部训练大队当战术教员。我在那里办了一个战术训练班，教授小分队战术。

1960年，我们到甘孜州去剿匪，和敌人打游击，有同志伤亡。1964年全军比武，我带了一个爆破班。平时训练都是10斤以下的炸药，我那次为了体现实战效果，用了几十斤炸药把十几米宽的壕沟炸平了，坦克过去一点事没有。那一次，我们在全军比武中获得了第一名。

1973年，我回到成都军区军训部工作。1974年成都军区成立军区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改名成都军区步兵学校，1981年改名成都陆军学校(后改为学院)。我到学校担任毛泽东思想理论教员，后来任主任教员，最后调到后勤干部训练大队当



/ 金玉生练书法。

训练处处长并在这里光荣退休。

1987年，朱德的女儿朱敏牵头成立军地两用人才大学。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们15个退休干部同朱敏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发挥余热。于是，我又在军地两用人才大学成都分校任职10年，为部队培养了很多基层官兵，包括排长、连长、战士，也培养了不少地方年轻干部，自己学有所用，我感到非常自豪。

1999年，我73岁，开始学画花鸟。2008年，我82岁，又开始学习书法。我把对人生的感悟融进花鸟绘画和书法创作中，分享给更多的人。

回顾我这近一百年的经历，年幼时懵懵懂懂挣扎求学；年轻时保家卫国投身黄埔；中年时追求先进理念、崇高人生目标主动求学；年老时老骥伏枥，坚持学习，我的一生也能称作学习不止的一生。学习让我更加充实、饱满、自由和豁达，我愿把这些心得分享给更多的人，希望他们也能同我一样，在学习的道路上永不停息。

王友文：我的抗战人生

1927年，我出生在四川成都，初中毕业考上国立剧专。还未入学，国民党就发动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我那时虽然不到20岁，但眼见大后方成都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我的邻居、同学、亲戚被炸死，便把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于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参军。

入伍大概一个月，接受了一些基本训练后，我就参加了远征军。从成都新津机场飞到印度的阿萨姆邦，途中要翻越驼峰，飞机一会上升一会下降，人在里面就容易晕。那天，一位毕业于华西协和医科大学牙科的郑姓大姐和我们搭同一架飞机。在候机室，她教我们坐飞机的注意事项。可飞机起飞后，她却先倒在我身上说想吐。一会儿，一位叫柯凯乐的美籍华人驾驶员走了出来，打开氧气，告诉我如果大姐要吐，就拿桶接着，还给大姐吃了一粒药。后来，看大姐睡着了，我才知道那粒药就是让她睡觉的。

在阿萨姆邦叫雷多附近的汀江机场降落后，我的不适感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兴奋。举目四望，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新



王友文，1927年出生于成都。初中毕业后报名参军，编入远征军后被派到印度受训学习炮科。抗战胜利后，参加日本战俘遣返工作。后入黄埔七分校军官班学习。

奇，甚至连空气都有一股特殊的味道，有人说这个叫“嘎啦味儿”（音同）。那个“嘎啦味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是英文、印度文、缅甸文还是别的什么，后来什么东西都叫“嘎啦”，比如当地地人卖的本地烟就叫“嘎啦烟”。“嘎啦烟”不是香烟，香烟是美军发，一天一包。给我们学生发的除了一包烟，还有一包糖，我不抽烟，就拿它和我的同学换糖。

接着就是受训，内容是基

本操练，比如立正、稍息、队形操练，还有步伐等，半年后选科。我被分到新陆军14师，由于之前我看到美国炮兵的样子很神气，就选炮兵。结果14师的炮兵是山炮兵，一门炮包括测量器材大概要六至七匹骡马驮。所以，我们先要学怎么驾驭马。前3个月，天天早上起来打理马匹。用刮子和布把马身上擦得透亮，还要给它擦眼屎、勾蹄型。马蹄里有个窝窝，经常会被石头、马粪等东西卡住，走起来很痛，所以要把马蹄弄干净。我最不愿意干的就是给马洗屁股，洗干净后还要拿个湿帕子擦干。

教官对我们很是优待，让我们把马整理好交给马兵，其他的不用管。他还告诉我们：“你们这个山炮营，要跟马打交道，你们要懂马，这是一个过渡期，今后你们就不搞这个了。”3个月后，我们开始学测量和绘图。军官的级别不同，需要地图的比例尺不一样，级别越高，比例尺越小。连长、排长一般用大比例尺图，很详细，可以看到哪些地方有树、井、铁道等。学了测绘图，最后才学炮。

印度的雨季很怪，刚刚还是艳阳天，突然飘来一片云，马

上就下雨，而且是云走到哪雨就下到哪。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边晴天在打篮球，那边在下雨。一天中一会晴一会雨的好几次，让你感觉一天到晚都在下雨。

森林里最烦的就是蚂蝗，天气很热，教官让我们打绑腿，上面穿个褂子。有人就吓唬我们说，如果你们不打绑腿，蚂蝗钻到你们血管里面，最后就钻到你的心脏，要你的命。我们有时候光腿，蚂蝗钻进去半截，医生看到就提醒我们：“注意，不要看到就乱扯，扯断了留半截在里面，那就非做手术不可。”然后教我们用一只手按住外面半截蚂蝗，另一只手慢慢推、慢慢挤钻进去的半截。还给我们每人发了瓶药，可以对付蚊子，也可以杀蚂蝗。我们就把药全部洒在鞋子上，用完再领。

为了适应战场需要，我们还要下连队见习。下连队时，连长交代我们，一举一动都要服从命令。但我有一次擅自行动，看到日兵败退，士兵追截，就跟着士兵跑，想去看个究竟。连长急忙喊我回去，正在这时，前面一个子弹就擦边飞了过来。当时只知道我的裤子动了一下，没有看见流血。后来感觉有点痛，把裤子卷起来，才看见被子弹擦伤了，好在伤得不重，现在还有印痕。回去后，边包扎伤口边挨

骂，后来就再也不敢违反命令了。还有一次，我们在一处小树林追截日军。按照作战要求，刚发射炮弹进行火力压制，小树林里立即钻出十几名日军四处逃窜，还有一名妇女举着双手朝我们跑来，一边跑一边高喊“我是中国人”。连长一听，就用脚踢了一下炮手，叫他打高一点。此时，一名日军端着枪成立射姿势，瞄准妇女正要射击。连长命令轻机枪手赶快射击，同时向那个妇女高喊“趴下”。日军被射中，那个妇女站起来继续往我们这里跑，近了一看满脸泥水。因担心这个妇女可能是间谍特务，由我们见习学生把她看管并护送到后方。

我们的随营学校在一个小镇里。小镇建在树林里开辟出来的空地上，我们叫帐篷一条街。我们的军用帐篷一律草绿色。老百姓的帐篷花里胡哨，什么颜色都有，功能也很全，卖日用品的、开咖啡店的、还有一些卖药的等，宛如一个集镇。咖啡店往往是多事之地，有一次，我们和英军就在咖啡店里为争座位打了起来。我们看到一把空椅子，刚要搬过来坐，一名英军一把抓住椅子不准我们搬，然后把他的哈巴狗放在椅子上。我们队长是十七八岁的湖南人，火气大，想了一个办法。他用食物诱惑哈巴狗，越扔越近，等哈巴狗走到

跟前时，猛地一脚把狗踢飞了，双方开始发生冲突。咖啡店的老板，跟中国、美国、英国军官都有联系，就通知各方把自己的人带走。平日里，英军只有见到美国军官会打招呼，而对于中国军官根本不理，一副瞧不起的样子，所以双方经常发生冲突。

滇缅路打通后，我们回到云南昆明、楚雄等地整训。那段时间，我们没少吃宣威火腿肉。宣威火腿贵，我们的军需处副官就联系做火腿的工厂，找他们商量买做火腿修边剩下的肉。对方说：“可以卖给你们，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糟蹋，一般都是把它们做成罐头，你们抗战有功，就便宜些卖给你们。”刚开始时，我们都觉得好吃，一段时间后也吃腻了。

1944年，来到湖南芷江，我们炮兵营平时要练习打炮，经常到芷江城外一个叫玉树湾的地方练习。那时候，部队电影队还会来放美国电影。我还记得由小说《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的两个主角斯嘉丽和白瑞德，斯嘉丽是费雯·丽扮演的，白瑞德是克拉克·盖博扮演的。我很喜欢看克拉克·盖博那留着小胡子、酸溜溜的样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此前的8月14日晚上，我们已经知道。当时我们正在看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的《出水

芙蓉》，突然听到从芷江城后头传来的火炮声，以为出事了，仔细一听不像打仗。炮兵营通讯司给城内师部打电话，师部接电话的是个女孩，她说日本鬼子投降了，说完撂下电话，也没挂。我们这边从电话里听到唱歌、吵闹、放火炮儿的声音。我们营长赵鑫缙就开吉普车带着我们进城，路上看见老百姓也往那儿走，大家都很高兴。人越来越多，汽车引擎都挨着前面的人，还有人坐到引擎盖上，我们营长干脆把车挂到空档，慢慢溜进城。当时，芷江有一部分人是从湖南沦陷区逃来的。我们在路上就看见一个大概三十几岁穿旗袍的女人，跟疯了一样在大街上打转转，边转边喊：“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旁边有个女孩在那儿喊：“妈，你走哦，你不要在街上出洋相。”天快亮了，我们看见有个包子铺，就去买包子。包子铺的老板说：“本来我们说的是准备给他们上班的人，你们吃了就算了，我们今天另外做。他们今天不上班还难说，我们现在做的四笼包子你们随便吃。送完了事，我也不收钱了。”那几天，面馆、烟店、饮食店基本实行减价，有些甚至不要钱。

几天后，我们部队出发去接收南京、上海。我们军长廖耀湘说，让日本鬼子看一下我们中国军队，打了8年仗，他以为我



/ 2021年，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看望王友文(中)。

们兵员缺乏，士兵都是老弱病残，让他们看一下我们还有这么年轻的士兵。

后来，我又参加了遣返日本战俘的行动。我跟随部队到秦皇岛登陆，遣返的战俘由美军第七舰队负责运送。那时候海水都结冰了，美军用破冰船先去破冰。之前没有见过破冰船，以为是用船上的工具把冰撬开，其实破冰船前面是高温区，用高温把冰融化来破冰。融化后的冰块会逐渐由大块分成若干小块，再变成一个圆球浮在海面上，看上去像是一个个汤圆，很好看。这是我第一次到北方，我奇怪北方怎么到处都是火车箱。北方同学说：“什么？这是人家老百姓的房子，怎么会是火车箱子。”原来北方人民为了防寒，盖的房子都很厚，顶上是平的，平常就晒粮食、晒衣裳，看着很像火车箱。

抗战胜利后，我就在成都

考黄埔军校，第一次考第20期，被录取为备取生。第二次又去考第21期，按规定应该是把我这样的备取生先招，可结果先招收正取生，又把我放在了备取生里。我就去找招生办主任李邦藩。他是本校的步兵科科长，湖南人。我在北较场截住他的汽车，然后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笑着告诉我，我已经是第四个找他的人，由于本校不招军官，所以没有录取我们，而有关情况他已经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报告，让我等回信。不久，李邦藩主任告诉我，专门为我们这些预备军官设立了一个军官班，但是这个军官班要在现役部队招生，主要招收连排长。而我不是现役的连排长，还是不符合招生条件，一下子犯了难，李主任又给我出主意，重庆璧山县刚成立了一个师，让我到那去落个脚再进军校。就这样，我终于进了黄埔军校七分校的军官班。■

叶敦重：两代黄埔人，永远黄埔心



叶敦重，1930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45年，入陆军军官第一预备学校学习，后升入黄埔军校第22期，1949年毕业。曾带领第23期部分学生起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现任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1930年，我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我祖父办过小学，当过校长，思想比较开明，家境也还算殷实，我4岁就启蒙读书了。

我7岁的时候，抗战全面爆发。第二年，日本飞机轰炸宜宾，我开始跑警报。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我们到山沟里租房子住，学校也搬到山沟的古庙里，没有菜吃，就用酱油拌饭，生活非常艰苦。幸运的是，我们躲过了日机轰炸，但宜宾城里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一次，日本飞机又来轰炸宜宾，出于好

奇，我爬到一座高山上看，只见城里有些没来得及躲进防空洞的人拼命往岷江和金沙江的江边跑，日机在上面追着轰炸，还把炸弹投到了江里，一时间，江水被染红了，分不清哪是鱼的血哪是人的血。那一刻，我暗自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打日本鬼子。

后来，由于父亲在黄埔军校第19期2总队任上尉军需官，我们全家搬到成都，我被获准直接进入黄埔小学就读。当时，我家住王家巷街52号，离北较场很近。我经常从黄埔军校校

门口过，校门口“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伴随着我长大。年少的我对于黄埔军校，以及这个学校里的官兵师生，内心一直充满着敬仰。1945年，我正在四川大学附中读高中二年级，准备再过两年（高中要读4年）考四川大学。这时，蒋介石为了加强军队建设而创办的陆军军官第一预备学校招生，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参加了考试，谁知居然通过考试被录取了。我立刻放弃考四川大学的计划，转而进入陆军军官第一预备学校学习，从此开启了我们叶家两代人与黄埔军校的因缘。

当年4月，我进入陆军军官第一预备学校学习，校址在新都宝光寺。我们用的是南开中学采用的高中教材，请的是四川优秀老师讲课。课程设置的比例大约是十分之四是文化课，十分之二是军事课，所以，我们的文化知识学得还是很扎实的。一年后，学校改成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徐幼常任班主任，学习仍按照原教学计划进行。预备班毕业后，我升入了黄埔军校第22期。我们那期在黄埔军校分为3个中队，即1中队、2中队、

3 中队，我们预备班的都在 3 中队。

毕业前夕，蒋介石来训话，就在北较场的中正堂，我们站在那，一动都不敢动。记得当时蒋介石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是他还跟我们吹牛，说对付共军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还说国军很强大。蒋介石那时住在北较场的黄埔楼，校内警卫全部换成在校学生，我被选中并派在黄埔楼蒋介石官邸值岗。有人要觐见蒋介石必须在大校门递申请，然后打电话经过二校门批准，再通知蒋介石官邸。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守官邸那个电话，然后报告侍卫官，同意了才能觐见。那段时间，蒋介石坐的专车是黑色流线型小轿车，我还记得他的牌照号是 000009。给他做饭的厨子胸前都要挂一个大白牌，上面写着：天厨某某，每天的鸡鸭鱼肉蔬菜都是用好几部车拉进学校。晚饭后，蒋介石会披一件黑色尼龙避弹衣，带两个侍从官，到北较场的城墙上走走。有一次，他经过我的岗哨，看到我很年轻，就停下来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哪一期的？我说我是 22 期 3 中队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好好干！”然后就走到城墙上头去了。他在城墙上散步的时候，城墙外面都布满了警察。1949 年 9 月 27 日，我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



/ 1953 年，在秦皇岛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连营团三级干部集训的叶敦重。



/ 1954 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教员主任的叶敦重。

国防部警卫团。

我父亲毕业于川南师范学校，他们当年的教导主任是共产党员，他自己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受其影响比较大。我去重庆报到前，父亲带我去见军校教官汪寿鹏，暗示我要随机应变，做好起义的准备。同时，我在川大附中的同学邹先才也来到我家，指出蒋、宋、孔、陈四大

家族的腐败，并赠送有关社会发展史的书籍给我阅读，更加坚定了我起义的决心。后来由于形势所迫，我先到重庆国防部报到，任排长，和同时去国防部警卫团报到的 6 位同学（朱斯达、裴君作、张志光、黄庚、白绍宗、吴昌华）暗地约好见机起义。重庆即将解放，国防部乱成一锅粥，我们警卫团接到护送国防部官员到成都机场的任务。之后，我们被改称为独立 60 师，离开机场，先后在新津、成都、新都、广汉、什邡、金堂、绵阳一带活动。记得到金堂的时候，部队就往山上拉，还给我们每个排长发了 160 块银元，10 个一两一块的小金砖，意在拉拢和收买我们。当时，我们团长想把部队拉回浙江，因为警卫团团长以下的干部，几乎都是浙江人，都是蒋介石的同乡。我们已经约定好准备起义的几个同学，觉得如果此时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部队到了中江县清河乡的时候，正值我放排哨，那天半夜 12 点，我就联络他们，每人带 1 支手枪、1 支卡宾枪、两个手榴弹，冒充师部检察官，从我的哨位跑了。

我们回到成都本校，联系上中国人民解放军 18 兵团领导，带领学校的部分学生兵起义，并按照贺龙的指示，把起义队伍一个不少地带到新都，受到贺龙的亲自接见。我被任命为 18 兵

团随营学校的区队长。后来随营学校改成西南军大川西分校，我到川西分校6队学习，学习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通过学习，我们的思想都开始扭转，有了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贡献的愿望。

1950年夏，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分校部分学员和革命干部突击修筑成渝铁路。这是大西南第一条铁路线，修筑意义十分重大。我参与修筑的是资中县银山镇一段。那些日子里，我们用大锤、钢钎、撬棍和锄头、十字镐，整日打炮眼、撬大石、挖土方，光着膀子大干了几个月，有的同学牺牲在工地上。

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纷纷报名。我被分配到60军181师541团1营3连1排任排长，被批准第二批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期间，我参加了1951年4月开始的第五次战役。战场上，我的右腿被迫击炮的炮弹片打伤，硬是靠自己咬着毛巾，拿树枝把那个弹片抠出来。当时没有药，身上只有一盒万金油，我就把万金油塞在伤口里。我们那时的条件特别艰苦，有时候补给跟不上，只能一把炒面一把雪。“一把炒面一把雪”并不是说吃一把雪再吃一把炒面，而是把那个雪搓成汤圆坨坨，含在舌头中间，让它慢慢化开，然后再含一把炒面，不然牙齿受



/ 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叶敦重。

不住。抗美援朝战场实在是太艰苦了，经过这样的磨砺，之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算什么了。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纷纷写信慰问我们。我收到的是丁玲亲笔信，标题是“写给‘最可爱的人’”。那封信是用钢笔写的，字迹清秀，写得很好。在朝鲜时，我一直把它揣在怀里，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弄丢了。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们开始回国。由于丹东组织欢迎仪式，部队要求我们在新义州集中后，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统一过鸭绿江大桥。我们大概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过江的部队等齐。那天正好我值班，我是副连长，胸前还挂着值星带，大家极度高兴。但由于我被炮弹爆炸震得头痛的毛病犯了，咬牙坚持到丹东，就实在受不了了，赶快把值

星带交给连长。吃了点止痛片，在火车上熬了两天两夜到达邢台时，头痛得连来看我的同志都不认识，还胡言乱语。当时又没有医院，有个医生是起义人员，是原来国民党军队的老军医。他看到我实在不行了，就给我打了一针。头痛慢慢地止住了，但是人很虚弱，部队就出钱安排我到老乡家里。老家乡只有母女两人，她们专门照顾我，每天给我吃山药、小米稀饭、大枣和鸡蛋。我在那儿调养了十多天，就完全恢复了。临走时，我给了她们我一个月的津贴，算是感谢，但忘了留下她们的名字。

我爱我的家乡，爱我的家人，这种眷恋在后来我的人生选择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5年，在60军当军事教研主任的我，婉拒了团长让我随他前往南京的邀请，选择回到四川，在温

曾广文：以赤子之心，书写“百年印记”

我叫曾广文，今年93岁，出生于四川省广汉县（现在的广汉市），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小学教师。为了糊口，父亲借债在成都少城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正对面开了一个“国泰”照相馆。后来，照相馆挪到牌坊巷街口，取名叫“好莱坞”，不幸被日军飞机炸毁，只好歇业。

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我初中没念完就考到一所公费的农业职业学校学习。学校没有教材，上课时，老师在黑板上写，学生在下面抄，学不到东西。后来，我进入附近的协进中学学习。一天，我在街上看到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招生的消息，连忙跑回家告诉母亲。因为我大伯是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他们家符合学校招生的条件。母亲找到我大伯的家属，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全省一共录取了8人。四川省省长邓锡侯为了照顾我们，给我们买



了从成都飞到南京的机票。曾广文，1930年出生于四川广汉。曾入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学习。1949年考入黄埔军校第23期。1988年任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现任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了从成都飞到南京的机票。

学校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办的，第一任校长是宋庆龄，第二任是蒋介石，建校的目的就是要把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中的这些遗孤照顾起来，继承前辈遗志，校址就设在南京

四方城中山陵。招收的学生中男孩和女孩都有，小的只有五六岁，由保姆照顾。学校的环境和条件比较好，除了文化课还有很多实践课程，几何老师上课都是用英文。农场里还有宋美龄到各地化缘来的奶牛，为此，我们

（接前页）

江县粮食局农管股任股长。

后来，我加入了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担任理事，并作为温江黄埔联络组的负责人，组织温江黄埔老人、后代和亲友参加活动。同时，利用自己黄埔学生

的身份，加强同台湾黄埔同学的联系。台湾退役将军黄幸强就是我的同学，我们后来还见过面聊过天，虽然彼此人生际遇不同，但黄埔同学的身份让我们依然心意相连，依然谈笑如故。此

外，我还进社区、进校园传播黄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为大家宣讲黄埔故事、爱国故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勉励更多的年轻人热爱祖国、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文化师范学校第三期全体功臣合影，前排左一为曾广文。

早上可以喝到一碗牛奶。学校还免费给我们提供衣服、信笺、肥皂，等等。1948年底，南京快要解放时，人心惶惶，学校酝酿要搬迁到台湾。我家有母亲、外婆、外祖母三代人，只有我一个男丁，我可不想去台湾。彼时，我听说黄埔军校在南京招生，就跑去报考，考上后就回到了成都本校。

当时去黄埔军校的路上非常乱，我足足走了3个月。从南京到杭州再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到江西南昌，过株洲到武汉，再坐船到重庆，直到1949年1

月才终于到成都入学。一开始，我们被集中在双流进行预备入伍训练，主要是挖厕所、垒靶场等体力锻炼。3个月后，转到成都皇城，我被分到23期步兵3中队，接受正规步兵训练。1949年底成都解放，军校南迁。我当时特别想家，加上思想比较进步，对国民党散布的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谣言也有自己的辨别力，觉得不能再跟军校跑了。

11月的一天，正好我值日，任务是上街监督炊事员买菜。值日生有一个红袖套，凭那个可以自由进出学校。我趁此机会离

开了学校，临走时还在床铺上留了一张白纸，意思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后军校南迁遇阻，又返回北较场，并在报纸上刊登消息，让所有私自离开的黄埔军校学生返校。我看到报纸后又回北较场报到。这时，黄埔军校的总指挥代表全校教官和学生发通电，学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随后北迁到了新都铭章中学。在那里，我们开始系统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毛泽东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来，学校改成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我思想转变

比较快，被任命为学员班的班长，带大家完成思想改造，但由于我的年龄较小，经验又不足，所以开始的工作开展很不顺利，尤其是遇到一些故意捣乱的老顽固时，我束手无策。组织上便派老干部协助我最终完成了任务，还被学校留下当文化教员。我之前没有教过书，又没有教材和参考资料，只好从家里带上一本《中华字典》，边教边学，硬着头皮给学员们上课。好在不久，学校就被接收了。我们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教导第1团，团长是老红军苏新，我任文书。那时，成都到灌县（现在的都江堰）有公路，灌县往西就没有公路了，国家准备修建灌茂公路。我们负责修建灌县到汶川这一段，修了差不多1年，我还把我们修路的情况写成文章给《川西日报》投稿，文章很快被刊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期，迫切需要有文化的干部。而当时南下部队中工农士兵居多，文化程度都很低，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就成了当务之急。组织上把我调到川西军区文化速成学校师资培训班学习速成教学法，校址就在将军衙门（现在的金河宾馆）。学习结束后，我转成教员，后来又当了教员组长。我当时也就二十一二岁，学员年纪都比我大，有的是营长、团长，还



/ 2003年，曾广文（右）与张扩强在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合影。

有的是战斗英雄。后来学校搬到了新都，取名叫第七文化速成中学，就是后来的“七速中”。不久，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又把我送到重庆西南军区文化师范学校（后来改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文化师范学校）中文系学习。组织上对我很信任，我既当学员又兼任区队长，还被选为共青团支部书记。学习结束后，组织上给我评了三等功。后来我留校当了老师，学校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预备学校，主要任务是招收和培训部队干部，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让他们回部队再去培训其他学员。我最远到过东北的鸭绿江边安东，去接收从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部队干部。

后来，成都军区要发展文化教育，调我去编写部队用的

速成中学语文课本。1961年底，又被借调至军区政治部编辑记录部队战斗英雄故事的《英雄簿》。1962年，我被留在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监察科任监察干事，工作了大概4年后，我离开了监察科。

记得是在1980年，我被调到新成立的成都大学。起初我在中文系任职，后因教师要评职称，学校为此成立了一个办公室，把我调过去负责给老师写鉴定评语。之后学校筹办学报，又调我去办学报。几年后，学校任命我为成都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但当时的成都大学还没有专门的图书馆，我就去深圳、广东、广西参观调研，获得经验后回来起草图书馆的修建草案，最终把图书馆建了起来。

那时候，四川省黄埔军校



/ 曾广文摄影。

同学会成立，我作为特邀代表去参加成立大会。会上，我当选为理事，又被聘为副秘书长。会长是郭汝瑰，他是兵团司令，家又在重庆，难以顾及省同学会的工作。其他副会长年纪都大了，只有我还年轻，经常给他们跑腿办事。负责的副会长就动员我：“你这么年轻……为祖国统一，

你不来？你还是党员。”成都大学的校长听说后，他说：“老曾啊！你要考虑哦，那是军团体哦，你去了以后要考虑哦。”但我想我是党员，党员就要当好先锋，做好表率，不来不行，更何况还是做促进祖国统一的

工作，就义无反顾地去了。就这样，我又从成都大学调到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一直到退休。退休后，我被选为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副会长。

2006年，我带着省同学会组织的旅行团一行19人，第一次到台湾访问，见到了很多学长、学弟，大家相谈甚欢。游览台湾后，我还写了访台记。后来，我把自己多年来写的游记集成了一本集子叫《这里的星光灿烂》，邮寄给世界各地的黄埔同学。我想通过游记的形式宣传美丽的中国，传播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统一。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知道为了祖国的建设和统一事业，大部分黄埔同学都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在平凡的岗位上贡献力量，如星星闪耀天空。我还积极组织和安排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友在大陆的寻访活动。83岁的时候，我自费出版了一本书《百年印记》，主要写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黄埔军校的相关情况，都送给了同学，希望通过文字把他们凝聚起来，一起传承黄埔精神，为国家做贡献。



/ 曾广文游记《这里的星光灿烂》。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 朱松岭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之巅，以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眼光，在对新时代开始十年以来文化建设经验提炼和总结的基础上，为未来实现文化强国目标，进而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响亮号召。这一重要号召释放出新时代新征程上铸就文化强国的重要信号，为未来中国文化发展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一、为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自始及今始终如一，文化自信也一直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坚定文化

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自信认识的进一步提升，进一步指出了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是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步骤。中共二十大报告不仅继续强调文化自信，还第一次提出了“文化自信自强”的核心概念。从“自信”到“自强”是一次重大认识飞跃和实践飞跃，既有迫切性又有现实性。因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2035年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目标似远实近，既有迫切性，又有现实性，既需要自信，更需要自强，而且时不我待，这就是“推进”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增添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需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引领中华民族冲破惊涛骇浪、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精神力量。也正是在不断提升文化自信自强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引领中华民族走进新时代。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系统总结

了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并将“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突出成就，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深知强大精神力量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悠久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文化根基雄厚，文化符号清晰、文化传承赓续、文化成果辉煌，中国人一向具有文化自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刻不容缓。

二、如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党全民族文化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方面取得辉煌成就，在如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为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提供了成功的借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文化自信自强的内涵、道路、内容做了明确界定，对文化自信自强提出了一系列新思维、新看法，在守正创新中坚持文化自信自强，有条不紊地推进文化

强国建设进程。

一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形成了一系列璀璨明珠一样的精神标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雄厚基础，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共产党重视、继承和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坚守住中华文化立场，充分展现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必然会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建设文化强国进程中展现异彩。

二是明确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道路指引和具体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如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做了全方位的整体部署，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其中饱含创新思维，具有一系列新思路、新提法、新办法，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一，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有具体的方向，那就是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复杂局面下坚持守正创新的重要方向。第二，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国家、社会、个人三个面向，具有全方位、立体性的丰富内涵，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本身就是对古今中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本身就立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之巅。广泛，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众基础；践行，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实践性，需要落在实处。知行合一，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意义，文化自信自强才会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才会再上层楼。第三，指明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社会基础，即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是从中山先生以来中国革命先驱们一直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文化建设和社会文明共生共存、息息相关，文化建设的成就，直接展现为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要求和重要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重点难点、实施步骤都做了具体部署，目标可期，前

景光明。第四，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两大支柱，即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概念是中央在2002年首次提出，在有了丰富实践经验之后做进一步推进的。其中，文化事业是为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在文化领域从事研究创作精神产品生产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组织机构。而文化产业则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这两大支柱涵盖国有和民营，涵盖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两大支柱都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自强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担当，必将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五，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人类文明图谱上，中华文明是唯一自古及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传承，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独树一帜，至今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雄劲基础、丰厚土壤和重要成分。但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优越论甚嚣尘上，抹黑中华文明的言论沉渣泛起，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声音不断，这些都对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出了现实的需要、迫切的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成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目标。

三是提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创新要求。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加快”展现出三大体系建设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的重要性。学科体系展现出文化自信自强的科学性、体系性，学术体系展现出文化自信自强的严谨性、升华性，话语体系展现出文化自信自强的传播力和感召力。三大体系的构建，必然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对形成与中华民族地位相称的国际话语地位有着重要作用。再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又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些重要举措都对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必然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这股力量的滋养和支持下，必然会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必然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先，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必然能激发出更深入持久的文化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注意到文化力量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文化力量就是文化软实力，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黏合剂。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以来，将文化自信从自发推进到自为阶段，更加重视文化的核心功能，并号召和带领全党全民族充分发挥文化的核心功能，发挥文化的力量，用文化凝聚人心、整合社会、促进发展。在有意识推进的情况下，文化建设的方向感更强，内容提升更精准，建设更具有体系性，对社会的正能量更足，激发出的力量更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的精神能量更多。

其次，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是文化自信的必然阶段和结果。“坚定文化自信不能止步于坐而论道，必须体现在文化自强的行动上。”从文化自信升华到文化自强，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飞跃，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步骤，是激发更强烈责任感和主动性的必然之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这些重要举措把握时代大势，顺应历史潮流，使得文化自信自强有蓝图、有步骤、有条不紊地踏实持续推进。

第三，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必然会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必然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精神力量。建成文化强国，是为了让中华文明更加灿烂辉煌，让中国发展更有力量。为此，“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这就要求用世界眼光，用兼容并蓄、中西兼容的态度，用宽广的胸怀，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将中华文化推进到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让中华文化在创造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更好地走向世界。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成中国特色文化强国，是扎实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会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格局，增强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书写新的壮丽篇章。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两岸和平发展之障碍与进程

□ 郑旗生(台湾)

郑旗生，台湾退役少将，陆军官校40期生，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史记与克毅文化出版社董事长、中华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总裁。

20余年来，携有关同仁反对“台独”、宣传“九二共识”、弘扬传统文化、推动两岸交流往来，连续多年举办“两岸认同与互信研讨会”“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及抗日精神传承研讨会”“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在岛内青年群体中深具号召力。目前已出版《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台湾的抉择——从孙中山先生谈起》《台湾的抉择2——孙中山思想与新古典社会主义》《台湾的抉择3——人民有权？政府有能？》《黄埔建军百年史》《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等著作。

2022年8月10日，国台办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文中提及“我们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解决两岸政治分歧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这段话指出了两个要点，第一个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第二个是两岸政治分歧的存在。就上述两点则需以对话沟通增进相互间的理解，进而达成共识，方能有两岸的和平发展，和平统一就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目前，两岸的实际情况和上述的理想相差甚远，若不审视实际情况，全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两岸的走向可能导致中华民族的另一

个悲剧。

统“独”交手下的两岸关系

两岸长期分离是个事实，但不代表两岸不同属一个中国。就台湾而言，自1949年至“两蒋”执政结束，都是以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两岸关系。最能表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场景，就是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将“中华民国”安理会席位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接。此时，美国趁势要求台湾仍留在联合国中形成“一中一台”的格局，但被蒋介石严加拒绝。蒋经国也延续此一政策。蒋经国于1982年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台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来回应

1979年1月1日大陆对台湾所提的“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这一政策的宣布，实质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1987年11月2日，开放两岸探亲，打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1988年初，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可以说，“两蒋”时期都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直至李登辉登场。李登辉的叛国是有计划的。首先在1992年丢出“直选”，等于直接废除了国民大会。199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抛出“两国论”，造成了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1996年，李登辉连任后，更是肆无忌惮地去中国历史、去中华文化、培植民进党“台独”势力。2000年民

进党第一次在台湾执政，陈水扁否认“九二共识”，推行“一边一国”论。

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并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会谈，会后发表《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国共两党达成一系列共识。

2008年，坚持和认同“九二共识”的马英九为国民党重新夺回岛内执政权。两岸交流日益顺畅，从而带动了两岸政治互信，促成了2015年新加坡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两岸领导人以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态度，围绕推进和平发展、致力民族复兴的主题，就两岸关系相关问题坦诚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若能长此以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心灵契合，甚而进入统一进程指日可待。

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2022年蔡英文再度连任，彻底否认“九二共识”，更表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被逐渐泡沫化。

大陆坚持两岸和平统一

解决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后未竟全功的遗憾，特别是1950年之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美国深度介入台湾问题，从而干预了中国统一的进程。台湾问题的性质已从

国共斗争转为中美博弈，而中美之间存在实力差距。故而中国的统一需要客观条件，需要大陆实力的提高，需要时间。

就大陆而言，在中国统一方面，也在不断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在战略上有所更张。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中，两岸处于敌对状态。1979年后，大陆在两岸问题上逐渐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因为“和平统一”是最符合两岸利益的方式。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希望维持两岸分离现状，反对中国统一，也不支持台湾独立。以往中国实力无法抗衡美国的情况下，能做的只有消极阻止法理“台独”，无法推动国家统一。中国改革开放后，政、经、军实力大增。在2005年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有力震慑“台独”分裂势力的同时，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大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提高经济实力 and 民生水平，在经济上已被公认为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军事上也不断创新发展，在政治上更有大国局面，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豪迈宏愿。大陆取得了种种令世界惊叹的成就，更有底气宣告：大陆在中国统一道路上掌握着主导权与主动权。

中美对峙下的两岸困局

特朗普上任之初，中美关系原本还维持友好互动，然而，2017年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主要挑战之一。紧接着，2018年，美国就对中国掀起全面贸易战。特朗普任内更善于打“台湾牌”，美国国会通过多项“友台法案”，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即为美国众议院于2020年3月通过的“2019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内容主要有：持续对台军售，提供防御项目；鼓励高阶官员赴台访问；适当支持台湾获得不需要以“国家地位”为要求的国际组织观察员地位。

拜登上台后，认为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发展，威胁到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与秩序。为此，拜登及其官员联合奔走，成立“印太联盟”平衡印太国际关系。至此，中美关系已走向“战略性竞争”状态。此一时间段，美国国会陆续出台“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等，其中对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竞争法案”，内容包括：定期对台军售，台湾可在美国展现“国旗”、成立基金会，承认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重要一环及增加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等。面对美方种种做法，中国大陆依

然保持“四个坚持”“四个自信”等主基调不变，直到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窜台。大陆虽然曾于访问前多方劝说，却未能阻止，最后只有展现实力，6个区域同时进行环台军演，形成对台湾封锁的状况。此举直接告诉美国，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自行解决。几十年来，所谓的“海峡中线”完全消除。而此时，美国只能保持静默，连原本在台湾附近海域的里根号航母，也远远地不知去向。这几年来，“台独”分子到处兴风作浪，此次台海危机的结果表明，“台独”分子“倚美谋独”的后续发展已经很清楚，“倚”是“倚”不了的，“独”也是肯定“独”不成的。

借鉴中山思想突破障碍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他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中国的崛起是必然趋势，对美国最有利的战略是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提供武器给台湾，鼓励台湾替他打“代理人的战争”，使双方卷入“长期而且血腥”的消耗战，美国则应袖手旁观，伺机获取更多利益。2021年12月，美国前国安会顾问奥布莱恩正式提出“刺猬之岛”的概念，建议美国政府售台大量军火，在台湾训练出大批民兵部队，以进行“全面

战争”。蔡英文当局对美国的阴谋，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乐于当美国人的棋子，提高国防预算，创下历史新高，目的就是配合美国构想，把台湾当成一个巨大军火库。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就视台湾民众生命为刍狗，简直是丧尽天良！台湾被这一群没有国家、民族意识的野心政客操弄得几近民不聊生，台湾民众还不觉悟吗！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不断疾呼“九二共识”的和平概念，但在民进党全面掌控台湾媒体的情况下，能发挥的功效极为有限。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不要拘泥于两岸目前的意识形态，而是将和平统一的论述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相结合。中山先生是国共两党公认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得到两岸民众的尊重与敬仰。中山先生在多次演说中都曾提到：“我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中山先生民生思想的“均富”社会，与中国共产党不断倡议的“共同富裕”目标似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山先生在百年前为中国救亡图存所建构的思想，对西方学说及先进国家的制度、经验有所借鉴，为中国规划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建设蓝图时，则从适合中国国情立场出发，融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这又

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谋而合。因此，两岸在建构和平协商的过程中，应将中山先生思想作为两岸沟通的渠道，进而追求两岸心灵契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结语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2022年10月16日召开，二十大报告中涉及台湾问题的论述仍以“和平统一”为主轴，强调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呼吁两岸共同坚守民族大义，坚定反“独”促统，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两岸关系若能畅行和平发展，国家统一则水到渠成。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道上横阻两座障碍：一是外部势力的介入，美国、日本是障碍的主要炮制方；二是台湾内部“台独”分子主政，民进党当局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中国化，企图完全切割台湾与大陆所有连结。这两大障碍必除之而后快，两岸同胞必须认清敌我关系，团结起来同这两股势力作斗争。“振兴中华”是两岸民众的共同目标，我们应以中华文化弥合历史裂痕，化敌意为善意，共同承接厚重的民族复兴使命，完成中华民族复兴最后一张拼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两岸的统一，有待全体中国人共同努力。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 月

□ 吴亚明

2022 年 12 月

2022 年“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闽举行

2022 年“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 1 日在福州市举行。活动中，台胞们对协商民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表示对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第十届海峡青年节峰会在福州举办

第十届海峡青年节峰会 2 日在福州市举办。峰会以“同心同行，复兴有我”为主题，梳理总结了十年海青节中涌现出的优秀青年、典型案例、项目实效等。峰会在台北同步设置分会场，并通过境内外媒体平台进行直播，350 名两岸各界嘉宾参加了现场活动。

“九二共识”30 周年论坛在香港举行

“九二共识”30 周年论坛 5 日在香港举行。来自内地、香港与台湾的百余位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共同探讨“九二共识”的思想内涵、历史意义与实践启示。

岛内各界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 6 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台湾同胞通过电视、网络收看直播，沉痛悼念这位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大家表示，将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共同奋斗。

“九二共识”30 周年图片展在香港开幕

“九二共识”30 周年图片展开幕式 7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通过视频致辞，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副主任陈冬等担任主礼嘉宾。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官员，中央驻香港机构有关负责人，图片展筹委会发起机构成员，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居港台胞等 700 余人出席开幕式。

台盟第十一次全盟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十一次全盟代表大会 7 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8 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会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台胞相聚平潭“共同家园”畅谈好的生活和未来

第十一届共同家园论坛 8 日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幕。论坛以“好的生活 好的未来”为主题，围绕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基层村里交流、电商合作等领域展开深入交流研讨，两岸各界 260 余人参加。

国台办：所谓大陆暂停进口台湾午仔鱼等水产品的报道与事实不符

近日岛内媒体称大陆无预警禁止进口台湾午仔鱼、秋刀鱼等水产品，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声称将表达严正抗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9 日答记者问表示，所谓大陆暂停进口台湾午仔鱼、

秋刀鱼、鲑鱼等水产品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所谓“严正抗议”更是无理取闹。

两岸专家共议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流合作

2022 闽台知识产权圆桌会议 9 日在厦门举行。会议以“知识产权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两岸 80 余位知识产权领域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探讨知识产权交流合作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

“思”字当选 2022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

由两岸有关机构共同主办的 2022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结果 12 日在台北揭晓，“思”字以最高票当选。

第十一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

第十一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 13 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两岸企业家峰会永久会址启用仪式在南京举办

17 日，两岸企业家峰会永久会址启用仪式在南京举办，约 150 位两岸嘉宾出席启用仪式。

第七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倡行“大爱和平，文明互鉴”

以“大爱和平，文明互鉴”为主题的第七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暨第二十四届中国·莆田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18 日在“妈祖故乡”福建莆田湄洲岛开幕。

台北动物园公布大熊猫“团团”病理解剖报告

台北动物园 19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病理解剖报告。报告显示，“团团”罹患的病症为“肥胖细胞型星形胶质细胞瘤”。

研讨林书扬文论与实践，两岸专家学者共话和

平统一

台湾统派知名人士林书扬先生逝世 10 周年之际，两岸专家学者 19 日汇聚线上线下，研讨林书扬文论与实践，共话两岸和平统一。

2022 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召开

2022 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 20 日在厦门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向两岸企业家峰会理事会发贺信，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年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峰会全体会员和与会嘉宾致以问候。

此次年会以“建构产业合作新模式，打造绿色数字新经济”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与会两岸工商界人士聚焦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话题，共同探讨扩大深化两岸产业合作的新策略和新路径。

台湾外销出口“三连黑”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 20 日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台湾地区 11 月外销订单 501.4 亿美元，同比减少 153.6 亿美元，下降 23.4%，连续 3 个月负增长。

国台办回应美国“2023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4 日答记者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美国“2023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作为美国国内法，公然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甚至包含为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事融资”和售武等内容。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违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所作的严肃政治承诺，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给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不满民进党当局“只做半套”，台湾民众发起“还我小三通”游行

台湾行政管理机构日前宣布重启“小三通”，却规定仅限金门、马祖地区的民众及大陆配偶申请返乡。此举引发岛内社会强烈不满，被舆论批评为“只做半套”，对广大想回家过年的台商、台生助益甚微。24日下午，来自约30个社团的近千民众在台北发起“还我小三通”游行，呼吁当局彻底取消限制，恢复“小三通”正常通航。

第八届穗台青年论坛在广州启动

第八届穗台青年论坛24日在广州正式启动。本届活动邀请两岸动漫、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嘉宾在线上线下开展交流研讨，来自粤台港澳动漫、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青年代表以及广州相关部门代表近100人参加。

海峡两岸百名中小学校长论坛聚焦深度学习

第十五届海峡两岸百名中小学（中职）校长论坛27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在厦门举办，两岸约180位校长参与交流研讨。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台湾当局延长义务兵役

针对台湾当局将义务兵役从4个月延长至一年，以应对其所谓“大陆威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

两岸推出“千年营造——敦煌建筑之美线上展”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敦煌研究院和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千年营造——敦煌建筑之美线上展”30日在海峡两岸线上推出。

黄埔情——两岸“同扬文化·喜迎新春”书画联展暨送春联活动举行

由黄埔军校同学会、北京至高美术馆与台湾史记文化出版社、台湾振兴中华民族暨文化经济促进协会共同举办的黄埔情——两岸“同扬文化·喜迎新春”书画联展暨送春联活动同时在北

京、台北、高雄举行，并以视频连线方式进行互动交流。

2022世界闽南语金曲大奖在厦门揭晓

2022世界闽南语金曲颁奖盛典暨海峡两岸闽南语音乐大奖赛31日在厦门华师希平双语学校举办。经过激烈角逐，马来西亚赛区的许伟胜获得冠军，亚军和季军分别由中国台湾赛区的李晋莹、厦门赛区的金水获得。

2023年1月

“笔墨抒怀 情聚两岸”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交流展在北京举行

以“笔墨抒怀 情聚两岸”为主题的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交流展6日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展出海峡两岸53位书画家创作的74幅书画作品。

“江山如此多娇”艺术馆在台北开馆

两岸写丹青，一步一山河。6日上午，“江山如此多娇”艺术馆开馆仪式在台北举行。艺术馆位于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主要展出两岸艺术家描绘祖国大好山河的书画作品。

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复航

7日，中断近3年的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正式复航。上午10时30分许，由金门出发，载有25名旅客的“金瑞龙”客轮停靠厦门五通客运码头，中午12时30分许搭载65名旅客返回金门，顺利完成复航首个往返航班。

台湾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

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日公布，2022年台湾地区人口总数为2326.4640万人，比2021年减少11.0674万人。2022年台湾出生人数为13.8986万人，创历年新低。死亡人数为20.7230万人。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

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 3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全国台联 10 日在北京召开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 30 周年座谈会，对这一旨在增进两岸青少年了解和友谊的品牌交流活动进行回顾总结。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慰问在京台湾青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开展一系列走访慰问台胞活动。

国台办发言人回顾 2022 年两岸关系并展望新的一年

国务院台办 11 日举行 2023 年首场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马晓光表示，新的一年，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为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而携手奋斗。

福建 2022 年对台出口增长 20% 以上

福建省省长赵龙 11 日在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22 年，福建接续推进闽台融合发展，对台出口增长 20% 以上，新设台资企业户数、实际利用台资金额均居全国首位。

中方对巴新政府宣布关闭“巴新驻台湾商务代表处”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

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日前宣布关闭“巴新驻台湾商务代表处”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2 日说，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

全国台联第二十九届台胞青年冬令营在北京开营

2023 年全国台联第二十九届台胞青年冬令营开营式 13 日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并以“云授旗”方式向参与冬令营活动的全国各地分营授予营旗。

全国台联举办“台胞过大年”联谊活动

2023 年全国台联“台胞过大年”联谊活动 13 日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来自各地的 300 余名台湾同胞参与其中。

岛内机构：台湾大学生数将现“溜滑梯”式下降，业界担忧“人才荒”

台湾当局“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 2022 年至 2070 年人口推估报告表示，2022 年台湾 18 至 21 岁大学生仅有 96.7 万人，较 8 年前下降约 25%。未来台湾大学生人口总体将呈减少趋势，可能导致生产力降低，影响产业创新及竞争力。

台湾省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产生

台湾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会议，18 日下午以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台湾省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3 名。

宋涛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28 日在厦门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春节祝福和问候。

国台办：继续为台湾食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9 日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对部分台湾食品企业注册信息不完整、不规范的问题，我们愿意继续予以协助解决，为台湾食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

谈谈航母战略问题

(下)

□ 石稼

航母也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s trap)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两败俱伤的战争而告终。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急速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之后研究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1500年的世界史作了梳理,发现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高达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于是,一些学者把“修昔底德陷阱”视为国际关系的“铁

律”,研究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和可能导致的战争危险,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转变。

美国著名保守派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就是中美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鼓吹者。亨廷顿预言:基于中国的规模,“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现象相形见绌”。相信中美终将陷入冲突的美国右翼学者的逻辑是:不管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只要威胁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宰的世界秩序,都会被认为是威胁,都要进行遏制。中国作为别于这一“国际体系”的异质性文明(亨廷顿称之为“儒教文明”),无论你是高调还是低调、“退缩”还是“冒进”,只要你不断地发展和崛起,都会被认为是西方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威胁。按照这样一个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无论中国方面如何让步,特朗普政府都不愿意放弃通过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的行为了。

2014年1月22日,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专访,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主席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又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2017年3月20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上表示:在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的利益已深度交融,如果发生冲突,只能是双输。因此中美关系不会走入“修昔底德陷阱”。

与中国领导人持续而坚定地相信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立场相反,美国从政府到学界几乎是一片悲观,美国国防报告、国安报告、核态势报告已对中国的崛起做了非常明确的定性,即中国在价值观、利益和

制度上已经对美国构成威胁和挑战。尤其是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明确把中国定性为战略对手,挥舞贸易大棒挑起中美贸易冲突,加大干涉台湾问题力度,派出航母战斗群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不断挑衅等,让人嗅到冷战的意味。一时之间关于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又开始被炒热。而中国国产航母的入列和后续加快的发展,无疑让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又添新的证据。

与对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炒作不同,美国政府、军方和媒体对中国发展航母并没有与中美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挂钩,多认为中国航母战力无法与美国航母战斗群相抗衡。2012年辽宁舰入列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称美方正注视中国的军事发展,但辽宁舰正式亮相,无须特别惊讶,认为目前还不具备作战能力。2012年11月26日,当中国歼-15舰载机首次成功起降后,美国《外交杂志》网站以《面对中国航母巨大进展,五角大楼打哈欠》为题报道美国军方的态度。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乔治·利特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我们已经注意到有关中国战斗机成功着陆航母的媒体报道,这不足为奇,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2014年4月,美

国军官参观辽宁舰后声称:这艘中国航母远远没有美国的先进,但同时指出,这艘船可以实现航空母舰的主要功能即起降飞机。当时接受美联社采访的美方官员也说,这艘航母没有美国航母的速度快,搭载的飞机数量也没有美国航母多。2018年8月30日,彭博新闻社网站刊发题为《中国拥有超级大国的实力吗?》的文章称:“就大项目而言——比如航母,中国要在全球投射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美军对中国航母发展和战力评估说得轻描淡写,但暗地里却在为可能到来的中美军事对抗预做准备。2016年5月14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2016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称,中国航母舰载机联队将正式上舰,进行实战部署,认为辽宁舰已具备了初始作战能力,能够执行一定的对空对海作战任务。美国“最新防务”网站以“中国崛起”为标题,称解放军正在“准备战斗并赢得下一场战争”,中国将是美国“日益严重的威胁甚至敌人”。2018年4月,美军候任太平洋总部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提出,中国在南海地区不断扩大军事部署,已有彻底控制该区域的能力,扬言“只有武力才能阻止中国控制南海”。

不管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

对中国发展航母如何评估,对中国本身而言,发展航母也如同中国的崛起一样,本无意也不愿更不会主动与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竞争甚至冲突。

一般而言,造成“修昔底德陷阱”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实力,即中国航母战斗群的实力要能达到美军航母战斗群实力的80%左右,才能构成挑战;二是意图,即中国对中美航母力量对比的现状不满意,有挑战美国航母的实力和谋求平起平坐的企图。就现状看,中国并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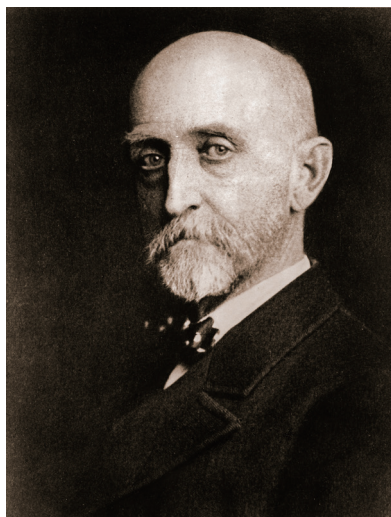
2017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纪录中国》中,航母专家李杰对中美航母实力对比作了一个评价:“相比拥有10个活跃的航母战斗群和一个拥有100多年经验的组织机构的美国海军而言,中国的船员还是幼儿园学生。”国防大学教授房兵在谈到中美航母差距时多次表达一个基本看法:应该客观认识中美海军的差距,跟美军比中国差的太多,很难超越,“中国航母技术比美国相差数十年”。

事实上,就发展航母的目的和意图看,中国也无意挑战美国在航母俱乐部的霸主地位。中国作为航母俱乐部的后来者,无论是起初还是现在,都没有要与美军一比高下的想法,更没有将自己定位为霸权的挑战者。当年

刘华清将军在谈到中国的航母计划时，说得非常明白，中国搞航母，不是为了和美国比赛。中国海洋军事战略的目标很明确，也很清晰，就是中国只发展与维护海上航线安全及国家海洋安全相适应级别的航母，没有去挑战美国海洋霸权的意思。中国国防部多次表示，中国坚定地奉行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决不会因为发展先进武器而改变。显然，中国的航母政策是防卫而非称霸。

对中国的航母发展战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锐生说了一句公道话：中国发展航母并不会对“美国控制的海上航道构成重大挑战”。从中国发展航母的价值取向上看，中美航母发展战略也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翻看“修昔底德陷阱”的经典案例，我们会发现这些案例均发生在西方世界，落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将那些新崛起的大国和守成的大国拉入残酷对抗的陷阱。而中国的强大进程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崛起，而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复兴的历史含义是，中国在历经百年受人欺凌、割地赔款、山河破碎的深重苦难后的民族觉醒，复兴后的中国既不再受霸权欺凌之苦，也不会恃强凌弱去欺凌别人，因为中国



马汉。

对霸权欺凌感同身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复兴后的基本价值取向。

2015年12月19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一篇名为《中国为何想要航母？》的文章分析称，19世纪，当时中国先后遭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侮，被迫签下践踏国家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并割让领土，“如果你知道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想要航母的原因，就不会感到诧异”。

中美航母为何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对东西方文明和价值取向的比较，也许揭示了其中的奥秘：“中国是一种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就是对中华文明的期待。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创造人类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以其二元对立观在世界制造了冲突、隔阂与对抗，陷入经济学家熊彼特

所言‘创造性毁灭’怪圈。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将是开创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探索人类新文明的过程，这既是世界的期待，也是人类文明的期待。”

航母战略需要超越马汉

1993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举办了一场主题为“马汉是不够的”(Mahan Is Not Enough)学术研讨会，研究美国海军如何在马汉“海权论”思想的基础上，寻求突破，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挑战。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1840年9月27日生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个教授楼内，父亲28岁即是当时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教授，后成为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给儿子取名赛耶是为了纪念为西点军校做过重要贡献的老校长赛耶。马汉长大后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一生成就辉煌，已经远远超过了西点老校长赛耶，被称为“海权之父”，成为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最崇拜的军事理论家。

马汉所写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等被称为“海权论”三部曲，影响深远。

1856年，马汉进入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学习，1859

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进入海军服役，后担任炮舰舰长。1885年担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主讲海军史及海军战略，并开始著书立说生涯。后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1908年担任美国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1914年12月1日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华盛顿海军医院。

纵观马汉的一生，都与海洋、海军、海权及海军战略等深度纠缠在一起。

关于强国与海洋之间关系的奥秘，马汉在分析了海洋的历史，特别是在考察英国如何成为18、19世纪的海上霸主后，揭示了其内生关系密码：通过建设强大的海上综合实力即海权控制海洋，再通过控制海洋实现控制世界，国家的崛起与强大自然就成为其必然的副产品。由此，马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

一个国家如何才能拥有强大的海权，马汉提出了六大关键性因素：

一、地理位置。如岛国，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比大陆国家拥有更明确的向海洋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发展海权的优越条件。

二、自然结构。致力于发展

海权的国家，必须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要有许多能够得到保护的深水港湾以及深入内地的大河等条件。

三、领土范围。国家发展海上力量必须要有一定面积的领土作为依托，领土的大小要与国家人口的数量、资源及其分布状况相称。

四、人口数量。必须有足够的人口，可以为海军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兵员，以及能从事制造海军设备。

五、民族特质。一个海军强国的人民一定要渴求物质利益，追求国内外有利可图的商业往来，也可概括为一个民族强烈地追求海外殖民地、追逐海外利益的民族精神。

六、政府性质。政府要具有海洋意识且重视海军，政策上具有连续性。

马汉认为，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了强大的海权，也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国家的强盛、繁荣、尊严和安全就随之成为必然。

马汉所说的海权是一个国家在海洋上的综合实力，包括海上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前者包括所拥有的舰队以及附属的基地、港口等各种设施；后者包括以海外贸易为核心的和与海洋相关的附属机构及其能力，也就是国家海洋经济力量的总和。

在马汉看来，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对促使国家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夺取制海权和打赢海上战争以及维护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海权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总体能力，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考察马汉之前和马汉之后大国各领风骚几百年的兴衰更替，我们会发现海上大国的崛起，无一例外不是按照马汉所揭示的规律演进的。

荷兰成为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是通过摧毁西班牙海上霸权实现的。而让后人惊讶的是，荷兰在16世纪之前还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称霸世界时人口只有200万，领土面积仅4万多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匮乏，这样恶劣的条件被认为是“不太可能养活其1/8居民”的国家。

但就是这样一个只有两个半北京这么大的小国，在1648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独立后的两年，其造船业居世界首位，商船数量达到1.5万多艘，数量规模全球第一，吨位相当于欧洲总吨位的3/4，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荷兰海军舰只也无比强大，几乎超过了英、法两国海军的一倍，成为其贸易发展和海外殖民掠夺的重要后盾和海上长城。

荷兰之后，英国通过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发动三次英荷战争以及在欧洲、北美和印度等一系列的征杀挾伐，到1805年，与法国在特拉法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海战，并取得最后胜利，树立了无人能撼动的海上霸主地位。其后，英国凭借着无比强大的制海权，进入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时代。

在英国称霸世界的200年间，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的辉煌已经达到近乎神话的程度，历史上没有哪个帝国能与之媲美。当时，全世界大约有4到5亿人口在大英帝国境内，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4，领土面积达3300多万平方公里，在世界各地都有广袤的殖民地，控制着大多数国际通道，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实力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当时英国人曾经这样自豪地形容自己的帝国：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谷仓；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矿区；加拿大和北欧半岛为我们种树；澳大利亚为我们牧羊；还有阿根廷为我们养牛；秘鲁送来白银；南非进贡黄金；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至于我们的棉花种植园正在从美国南部向地球一切温暖的地方扩展。

英国的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第一、二次世界大

战前后，英国开始从世界霸主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在二战后彻底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而海洋、海权、海军这些与海有关的基本要素依然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依托和凭借，马汉提出的一个海洋国家拥有强大海权并成为海洋强国的六大关键性因素，仍在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马汉的《海权论》被誉为“海军圣经”，在美军尤其是海军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声望。二战时担任过美国陆军部部长的亨利·史汀生的一段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马汉的影响力：“海军部有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它似乎经常脱离逻辑王国，退回到朦胧的宗教世界里。在那个世界，海神犹如上帝，马汉扮演先知，美国海军则是唯一的正统教会。”

几十年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以不囿于马汉、超越马汉的勇气研讨马汉海权理论的局限性、检讨美国海军战略，不管结论如何都值得点赞和借鉴。

马汉“海权论”的核心思想是“以海权称霸世界”，其初衷是要“唤醒美国人以海权称霸世界”，提出“美国拥有成为全球性海洋强国所需要的一切历史因素，美国政府只需要提供领导、意志和能力，就能实现其使命”。

马汉唤醒的不仅仅是美国

政府，而是几乎所有想称霸世界的海洋强国。毫无疑问，马汉的“海权论”推动了美国成为世界海洋霸主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航母得到快速发展，美国10个航母战斗群及其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使得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尚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抗衡。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揭示的是理论不能代替实践，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运用到航母与海权论的关系上，既要看到航母给海权论插上了新的翅膀，又要看到航母对马汉理论的“武器批判”。航母被赋予的功能、使命、任务等，使其在21世纪能成为马汉“海权论”影响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例证。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依然处在一个“海盗式竞争”的时代，热衷控制海权的游戏仍在继续，“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还在上演，发展海上力量和武力、控制海上贸易通道依然是各国追求的重要目标。

因此，在“海盗式竞争”的游戏规则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中国作为历史上长期重陆权、轻海权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发展海权和走向海洋强国的进程中，要做的首先不是批判马汉“海权论”的局限性，而是要让这一理论继续结出“中国式”海

权成果。中国发展强大的海权不是为了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而是要有能力把别人架在我们脖子上的刀隔开。

2013年1月，辽宁舰政委梅文在解放军报撰文《岛链不是发展的“锁链”》，称：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做后盾。人民海军只有形成强大的远海防卫作战能力，才能为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不应是束缚海军发展的锁链，而应是走向远海大洋的航标。

也要看到，“海权论”讲述的是木帆船时代的故事，当一百多年后木帆船变成超级航母时，马汉的“海权论”的立论基础已然在发生变化，超越马汉也自然成了一种历史必然。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球化取代殖民化，海权依附于国家主权。当前，全球化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国际社会连成了一张不可分割的网，每个国家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全球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各国的主流认知，其直接后果是所有国家的军事努力包括海权战略等都将殊途同归，指向同一个目标——维护全球化，而不是以殖民化为目标的开疆拓土。海权在某种程度上转

化为附属于国家主权的权益和治权概念，成为依据国际法确定的主权国家海洋权力和权益的结合体。

二是海洋共生性取代排他性，海权出现部分让渡。海洋除了作为强国的凭借和发展的命脉外，海洋自身无与伦比的战略价值，也使它成为托起人类希望的最后一个诺亚方舟。

从目前人类认知看，海洋的核心价值已上升到作为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在这个界定中，海洋是作为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诺亚方舟漂浮在这个地球上，体现了人类对海洋意义的最新探索和价值思考，超越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因海洋而起的贸易争夺战、资源争夺战、岛屿争夺战、地缘价值争夺战等。

在这一观念影响下，海权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特征：

其一，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是所有国家的责任，绝不可能由一两个国家独断专行，海权由独占性、排他性转化为共生性、共享性，传统的海权出现一定范围的让渡。

其二，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维护“良好的海上秩序”成为各国的共同义务。比如，亚丁湾和红海地区海盗猖獗，直接危害到各国商船安全和海上

利益，需要各国携手打击海盗，提高护航能力，而不是武装对抗以决定谁统治海洋。

21世纪，海权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各海洋强国为控制海洋而继续进行残酷的争夺，在一些地区和特定期还非常激烈，甚至兵戎相见，航母在其中自然就成为实力较量的核心要素。这在大国之间、东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国家似乎仍生活在马汉时代，充满着时刻准备战争的血腥味。

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制约和共同利益驱使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超越马汉时代，步入以共生、共享、共赢为主要特征的海上合作轨道。这在欧洲表现得尤为突出，欧盟海上军事力量的下降趋势和军事安全合作领域的加强就成为最好的注脚。航母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种威慑武器而存在。

在两种海洋观、海权观的战略选择中，2017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说出了中国的基本态度：“中国人的海洋观推崇郑和，看重的是海洋合作；而有些人信奉的是马汉，热衷控制海权。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希望海上合作更多一些，各方的信任更增几分。即使是中美之间，只要转变观念，浩瀚的海洋也

军语新解

□石评

突破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简单的算术推演结果。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



/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 (1897—1973)，是苏联时期著名的元帅，军事统帅，军事家，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二战中和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并称为苏联陆军的“野战三驾马车”。科涅夫善于指挥大兵团进攻作战，他在二战中指挥了许多气势磅礴、排山倒海的大规模战役，打出了一系列经典的攻击突破战，在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记录。尤其是为解放加里宁、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和波兰国土，以及攻克柏林、布拉格等做出重大贡献。战后，英国陆军元帅迈克尔·卡尔在他的《现代世界名将》一书中，将科涅夫列为二战苏军将帅中的第二位，认为他是红军中唯一能与朱可夫匹敌的名将。

科涅夫关于“突破是一门艺术”的名言，出自他写的《方面军司令员笔记》一书。他在书中对战争中的突破行动有着非常精彩的描述，将突破形象地描述为“一门艺术”，将突破的难度、复杂性、

(接前页)

完全可以成为两国合作的广阔天地”。

显然，中国的战略选择是超越马汉，超越称霸性海权，塑造以共建和平开放包容之海以及以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体现东方智慧的中国式海洋观。但中国所处的太平洋和有重要利益的印度洋有很多“马汉派”和马汉

主义者，超越马汉、推动海洋合作共赢和占据海洋道义制高点，并不能解决中国在南海、东海、台海、黄海以及在印度洋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中国进入世界海洋大国的进程中，还将面临各种围追堵截和海权封杀。

因此，在两条道路及价值取向面前，中国要跳出霍布斯的

“丛林法则”，推进自己的独特海权战略，必须兼具暴力手段与和平手段的统一。这既是中国坚定不移发展航母的重要原因，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遏制战争，使别国不敢与中国轻易开战，减少战争爆发的几率，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目的是赢得永久的和平。■

不确定性和重要性提到了和“战争是一门艺术”同样的地位和高度来看待。对战争中突破成功与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科涅夫既有切肤之痛的失败教训，也有值得自豪的成功经验。

科涅夫生平中最大的一次“败走麦城”是西方方面军的惨败。苏军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主力因为没有有效突破德军在维亚兹马形成的包围圈，成为卫国战争中苏军最大的悲剧之一，而之后他指挥的一系列堪称二战史上经典的战役行动，也多与突破有关。比如，加里宁反攻战的成功，是因为科涅夫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首先突破德军阵地前沿，为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转入进攻创造了条件，从而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德军，是德军自二战开始以来的首次大败。

科涅夫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名声鹊起的原因在于苏军打赢库尔斯克战役转入战略反攻后，其对“突破”战法的掌控力和卓越运用。在被称为“突破东方壁垒”的第聂伯河会战中，他率领的草原方面军前进迅速，强渡第聂伯河，一举粉碎了德军退守这一天险抵抗苏军的企图，收复了当时苏联的第三大城市——乌克兰首府基辅。他指挥的消灭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作战行动中，通过在德军坚固防御体系上打开一条长18公里、宽4—6公里的突破走廊，使德军防线迅速崩溃。

突破作为一个军事术语，是指在敌防御阵地或防线中打开缺口并突入的作战行动，是进攻作战的关键阶段和重要任务，目的是突破敌人防御，为投入后续力量、向纵深或翼侧机动、分割围歼敌人创造条件。当把突破作为一个名词、一门艺术和一种复杂的军事指挥和运筹进行研究时，突破就有了军事术语中战法的意涵。

在人类战争史上，突破作为一种古老的战法一直存在。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进攻作战，就是运用战车的机动性能和骑兵的冲击能力，实现对敌方阵形或营垒的有效突破。随着攻击兵器的改进，进攻

多选择敌方防御薄弱部位，集中兵力实施突破。即使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骑兵在战术层级和战斗中仍在发挥着突破的重要作用。电视剧《亮剑》中独立团的骑兵连，就是以骑兵实现作战突破的例证。

随着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战争中实现突破的手段不断增加，方式更加灵活，对战局的影响也更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攻一方对防御正面的突破，主要是集中兵力、火力，在狭窄地段上浅近纵深内实施，为后续梯队投入交战创造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进攻的军队主要是集中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在航空兵、炮兵的火力支援下，在一个或几个地段实施突破，并通过一系列作战行动，不断扩大突破战果。

我军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有效的突破战法。如：突破口的选择更加有效，多选在敌人的弱点或意想不到的地方进行突破；突破的时机更加精准，通过秘密接敌、突然发起攻击有效突破敌方阵地；突破更具关键性，通过集中兵力、火力实施重点突破或在两个以上地段实施多点突破，达到扭转战局或打破僵局的作战目的，等等。

突破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比如，从作战行动的规模看，突破可以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术层级的突破；从作战样式看，有进攻性突破和防御性突破；从作战意图看，有合围式突破和突围式突破，等等。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中，突破作为一种战法，对改变战场态势、扭转战局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具有优势的一方进一步扩大战果，也可以使本具优势的一方陷入被动，甚至一溃千里。这是突破作为一种战法的魅力所在。

环顾中外军事史上那些经典的战例，多与突破的成功与否休戚相关。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之所以能扭转战争初期的败局，就在于在仁川登陆的突

破。中国红军在北上途中进入彝民区后，之所以没有重演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悲剧，除了民族政策深得人心外，最关键的是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中实现了突破。

对作战指挥中如何实现有效突破，科涅夫从打赢一场战役的角度给出了经验：“消灭战术地幅内的敌军主力，为快速兵团——坦克集团军或方面军（集团军）第二梯队进入突破口创造条件。”这主要涉及两个条件：一个是扫清突破地幅内的敌军主力障碍；另一个是对突破的主力部队作战行动要形成有效配合，否则就失去了突破的意义。

一般而言，突破作为一种战法，具有兵力兵器高度集中、部队行动坚决迅猛、战斗异常激烈紧张等特点。基本要求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在主要突击方向，立体、纵深、梯次地部署兵力、火力，形成绝对优势和强大突击力，坚决、迅猛、连续地实施。二是突破口通常选择在敌防御薄弱部位，具

有一定的宽度与深度，便于发展进攻和突入敌纵深。三是周密组织突破地段诸军兵种的协同动作，按照突破进程和时间协调各种力量。四是先行火力准备和电子攻击，突然发起进攻，实施一点或多点立体突破。五是适时增加兵力，广泛实施机动，阻止敌预备队封闭缺口行动或改变进攻部队的突击方向，不断扩大和巩固突破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海湾战争、南联盟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看，突破在现代战争中的作战形式又有一些新变化新形态。美军提出的“五环打击理论”、空袭作战、“斩首行动”等，都是突破战法新的应用和发展。未来，随着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发展，突破的方法、方式和手段等将进一步增多，陆、海、空、天、网络电磁等多种作战力量实施联合突破，将使突破在作战中的应用更为广泛，作用和影响也更为突出。

黄埔百年主题征文启事

1924年6月16日，在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国共合作创办的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黄埔军校培养的一批批革命军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世代传扬，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我们将迎来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本刊特向广大黄埔同学、黄埔后代亲属征文。

征文内容：讲述自己与黄埔的故事，抒发对黄埔的情感，阐述对黄埔精神的理解，歌颂黄埔人对国家人民的贡献，思考新时代黄埔人的历史使命。要求事迹详实，感情真挚，图文并茂。

征稿时间：2023年3月至2024年6月。

稿件字数：2000—4000字，图片2—5张。

注意事项：稿件、图片请尽量提供电子文件。请在电子邮件主题中注明“黄埔百年征文”字样。手写稿不予退还，请自留底稿。

电子信箱：hpzzs88@sina.com

电话：010-58336325

联系人：陆东红、曹燕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黄埔》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75

黄埔“独臂将军”第一人刘畴西

(上)

□ 陈宇

黄埔军校在建校初期即成为国共两军将帅的摇篮。孙中山先生为创建黄埔军校注入的牺牲精神，成为黄埔军人的坚强信念和精神支柱，体现在战场上就是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在国共两党军队中有数十位“独臂将军”，这在世界军队是较为少见的。其中，拥有黄埔军校（第1期）、伏龙芝军校“双学历”的刘畴西，在第一次东征战役中负伤截肢，成为黄埔“独臂”第一人，也是国共两军“独臂将军”第一人。

投笔从戎入黄埔 割掉一臂又何妨

刘畴西，原名刘梓荣，曾用名刘之荣、刘仇西。1897年3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新康都沙围子竹篱笆屋场（今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芦江社区金星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国忠精耕细作，经营小本生意，家境逐渐宽裕，在当地修建了一栋二进8间房的住宅。刘畴西家子女八男一女，他排行老五，因此又有别名“五臣”“武臣”“瓦臣”。

1912年，15岁的刘畴西考



/ 刘畴西塑像。

入长沙县第四高等小学。在靖港人赵湘藻老师的启发教育下，他接受了进步思想，和郭亮两人被赵老师赞为“一高一矮，栋梁之才”。刘畴西家举全家之力培养他一人，而刘畴西也没有辜负期望，成为名扬乡里的“学霸”。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后，刘畴西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紧连在一起。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畴西发动同学积极响应，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参加了长沙驱逐张敬尧的行动，并为自己取名“武臣”，表示下决心习武，做国家的忠臣，以表达投笔从戎、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决心。他曾作为国货维持调查

员，主持了爱国学生焚烧日货的活动。

1920年秋，刘畴西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在当时聚集了数年后成为中共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众多青年才俊，如毛泽东、徐特立、李维汉、蔡和森、任弼时、郭亮、夏曦等。在这些人的政治影响下，刘畴西的思想进步很快，当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6月，经郭亮、夏曦等人介绍，刘畴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宣誓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这年秋天，刘畴西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到湖北省武昌沙洲的旅鄂小学执教。他在教学之余苦读马克思著作和进步书籍，更觉得中国社会黑暗，教育摆脱不了政治范畴，并认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真理，才是解决人类社会不平不公问题的思想武器。”

1924年4月，刘畴西决心弃文从武。经中共党组织推荐，他报考了黄埔军校。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招生复试，在《试述考

黄埔军校的志愿》作文试卷上，他再度易名，将名字署为“仇西”，旗帜鲜明地表示决心：“列强如此欺负我们，不报此仇，非炎黄子孙。”5月，刘畴西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分在第1队。同期同学有蒋先云、徐向前、左权、陈赓、周士第、黄维、俞济时等。刘畴西在黄埔军校中认真学习军事理论知识，刻苦训练，射击、刺杀、队列等科目均为优秀。10月，他参加了平息广州商团武装叛乱的作战。由于思想进步，品学兼优，他毕业后留校分配到军校第1教导团第3连任党代表。

黄埔军校建校后的首战，是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对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此役主要打了3次恶仗：淡水之役、棉湖会战及攻占兴宁。这几仗都是以军校教导团为主攻力量打胜的。军校教导团以“三千同志之军，死伤几达三分之一”的代价，打出了军威。

2月15日，在淡水城攻坚战中，刘畴西作为敢死队（时称奋勇队）员，冒着弹雨，架梯奋力爬上城头，身负重伤。

3月12日，军校第1教导团与叛军陈炯明的骁将林虎部主力，在广东棉湖西北山地展开一场恶战。双方阵地彼此交错，你争我夺，阵地更换了10余处。刘畴西与战友们连续打退叛军5

次进攻，就在他带伤率领全连反击时，高擎战旗的左臂突然中弹，血流不止。他稍事包扎，毫不退缩，坚持不下火线，高举旗帜大呼：“革命军不怕死，努力前进，冲呀！”鼓舞官兵们奋勇杀敌。战旗是战场上官兵们的精神支柱，刘畴西强忍断臂的巨痛，最终独臂高擎战旗插上敌军阵地。

历时8小时的激烈混战结束后，血肉模糊的刘畴西因失血过多，昏倒在战场上。他的左臂几乎已从中间断开，并且感染非常严重，担架队迅即把他抬到设立在汕头的战地救护所。救护所人员除军校医护人员外，照料受伤官兵的护理人员多是周恩来亲自派来的军校政治部工作人员，由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王逸常负责。刘畴西的左臂由于静脉破裂，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血管已经溃烂，医生告诉刘畴西只有截去左臂，才能保住生命。但刘畴西为了保住左臂，坚决不做截肢手术。刘畴西高烧不退，开始进入昏迷状态的他，还把脓血黏连在一起的左臂紧紧抱在胸前。王逸常用电话向周恩来紧急请示，周恩来十分关切地告诉王逸常，实在留不住，只得锯掉左臂，要确保他的生命。最后，由王逸常签字，刘畴西只得锯去左臂，保全生命。

第一次东征战役结束后，

工作繁忙的周恩来亲自到汕头战地救护所慰问受伤病员，特地来到刘畴西的病床前，询问他的伤势和截肢后的情况。黄埔同学们闻讯，纷纷前来慰问刘畴西，为他惋惜。刘畴西坦然地笑着说：“为了打倒军阀，性命尚可牺牲，割掉一臂又有何妨？请大家放心，我一只手也能干革命！”在东征总结表彰大会上，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讲述了棉湖战役的重要性，为刘畴西颁发了嘉奖令，并号召黄埔军人向他学习，称赞“刘畴西是黄埔军校的骄傲”。

5月初，刘畴西脱离了生命危险，从汕头转送到广州东山博爱医院继续治疗。妻子杨淑纯闻讯从长沙赶来看望，见到断臂的丈夫后以泪洗面。乐观的刘畴西劝慰妻子：“莫要悲伤，我丢了左手还有右手。再说革命是要流血的，为了革命流点血值得。”他还开导妻子：“革命党人的命是提在手里跑的。请不要多虑，要有思想准备。”

在东征中一战成名的刘畴西，成为黄埔“独臂”第一人。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黄埔军校给刘畴西颁发了军功状。校长蒋介石批准拨款为他安装了一只假肢。9月，刘畴西出院后留校工作。从此，“一只手”“独臂”成为黄埔同学对刘畴西的敬称。

10月初，国民革命军举行

第二次东征。刘畴西几次申请归队，均因身残未获准。他视此为一憾事，身在军校养伤，心中仍然挂念着前线的战斗。为此，他在给其兄刘钱侯的断臂照片背面写道：“3月12日伤，9月1日痊。正重征时也，恨不能前往，天之恨。”从照片上看，负伤半年后，他的左臂从中间截肢后萎缩了很多，但仍不改乐观从容的革命精神。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4月，蒋介石下令取缔“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另成立由他自任会长、受他控制的黄埔同学会。规定该会有一定的自治权，能决定毕业生的任免、升迁、调补等。为争取这一合法权益，刘畴西、蒋先云、杨其纲等受中共党组织委派，作为黄埔1期生的代表，参加黄埔同学会，刘畴西在组织科任统计员。6月，任黄埔同学会总务科长。11月，他随黄埔同



/ 刘畴西给大哥的照片。

学会由广州迁南昌，后又迁至南京。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后，周恩来指示刘畴西迅即撤离黄埔同学会，由南京绕道江西，到武汉加入贺龙的部队。刘畴西不动声色地处理了总务科的工作，秘密离开南京。刘畴西不敢走大路，专走水路和小路，右手提着装着书籍和衣服的皮箱，左边假肢上挂着马灯，昼伏

夜行。他靠着坚强的毅力和执着的信念支撑，走了一个多月，于1927年5月底，回到家乡靖港。

到家的当天夜里，刘畴西得知郭亮也刚潜回老家，第二天便找他会面。这时，郭亮正在筹划组织10万农军围攻长沙事宜。为了安全起见，郭亮并没住在家中，而是在湘江边租了一条渔船，夜宿船上。他与船家约定，如果出现意外情况，晚上就不点灯，作为暗号。刘畴西和郭亮谈完后已是黄昏，郭亮准备送刘畴西过河回家，然而，江边船上却未见灯火。看到暗号，两人当即改变计划，步行到丁字湾，次日搭乘运麻石的船只直奔汉口。刘畴西顾不上告别父母、妻子和女儿，从此再也没回过家，他的左臂假肢、皮箱和马灯也留在了老家。

在武汉，党组织指示刘畴西到贺龙所率国民革命军第20军做政治工作。7月初，刘畴西奉命到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任师部参谋，后来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在第24师任营长，随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的堵截，部队损失很大。9月中旬，潮汕战斗失败后，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分兵作战。刘畴西与部队走散，他化装成农民，昼伏夜行，躲避搜捕，后与郭亮等到了香港。1928年初，几



/ 刘畴西留在家中的皮箱，现存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档案馆。



/ 刘畴西使用的马灯。

经辗转，在上海找到了中共党组织。此时的刘畴西伤病交加，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党组织安排他在上海隐蔽休养了一年，同时协助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开展白区工作。

1929年初，中共党组织派刘畴西前往莫斯科，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刘畴西在长沙读书时，英文较好，他到苏联后在短时间内即通过英语交谈和英俄对照阅读，很快掌握了俄语，这对他学习专业帮助很大。他攻读马列军事原著，努力掌握军事科学理论知识。一年半后，他提前完成学业，经海参崴回国，于1930年8月到上海。10月，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革军委任参谋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多数开国将领没有上过正规军校。他们多是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而刘畴西是拥有黄埔军校第1期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双学历”红军高级将领，这种军校学历和在红军中的老资历，唯有左权一人可以与之相比。

全程参加反“围剿”

独臂将军美名扬

1930年10月，红1方面军攻克吉安后，部队进行整编，各纵队、支队的编制改称为师、团。由军长黄公略指挥的红3军

的3个支队依次改称第7、第8、第9师。其中，第8师师长龙芝道、政委戴奇，下辖第22、第23、第24团。12月，第1次反“围剿”作战时，红1方面军在龙冈设伏，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红8师师长龙芝道牺牲，红军总部立即命令刚到中央苏区1个月的刘畴西接替指挥。

从1930年冬到1934年下半年，刘畴西率部全程参加了中央苏区的5次反“围剿”作战。

——第一次反“围剿”活捉张辉瓒后，红军乘胜追歼逃敌，红8师随军部东进，在建宁、广昌一带建设根据地、发动群众。刘畴西率红8师于东韶拦腰截住敌人，对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红军总部表彰红8师“追如猛虎，守如泰山”。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刘畴西奉命率领红8师配合红4军作战。在军长黄公略的统一指挥下，红8师从永丰星夜驰骋东固，隐蔽埋伏25天，等待敌军钻进红军的口袋，创下红军埋伏史上的奇迹。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为了追击企图逃窜的敌第9师，刘畴西和师政委戴奇指挥红8师在老营盘截击敌人，激战40分钟，取得围歼敌蒋鼎文部1个旅的重大胜利。

1931年冬，刘畴西调任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



/ 红10军军旗。

任兼军事教员。他在教学中不拘一格，从红军学员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通俗易懂的教案。尽管失去了左臂，但他在训练时仍顶风冒雨为学员做难度较高的示范动作。他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把自己在国外学习的军事知识结合红军反“围剿”的实际，与学员一起进行战例分析，使学员们从传统教学的背诵操典、条令中解脱出来，学用结合，较快掌握基本军事知识和战术。这所学校先后为红军培养了近6000名军政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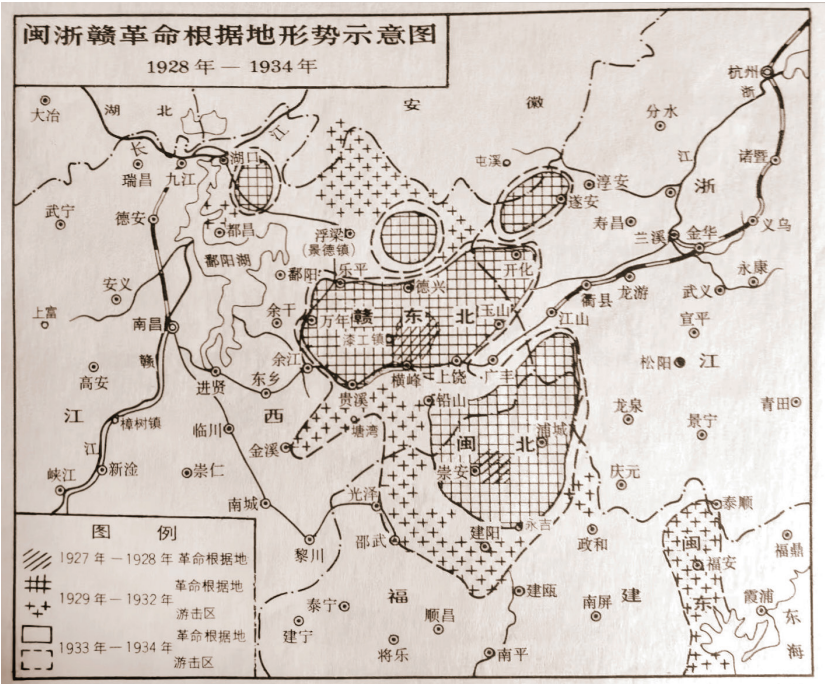
1932年6月，蒋介石调动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7月，赣南独立师和第6师合组红21军，刘畴西离开红军学校重返前线，接替左权任红21军军长，与政委李井泉率部征战于闽赣边境和赣南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红21军配置在彭德怀指挥的红3军团左翼，在黄陂地区全歼敌1个整师。



/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中心横峰县葛源镇。



/ 红10军的宣传画。



/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示意图。

1933年初，红21军编入红1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3月，刘畴西奉命前往闽浙赣苏区工作。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赣东北弋阳、横峰一带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的，起义武装后扩编为红10军，根据地发展为闽浙赣苏区，中心地在横峰县葛源镇。刘畴西到闽浙赣苏区时，红10军刚编入红7军团，调往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又重新组建了新红10军。在闽浙赣苏区第2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10月，调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军新编第10军代军长、军长。

刘畴西与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军民，全力支援中央苏区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大“围剿”斗争。11月27日，在横峰设伏歼灭突入根据地中心的敌第21师1个团，俘敌团长以下200余人，迫使来犯之敌纷纷撤退，取得了保卫弋阳、上饶苏区的局部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国民党政府为此分别悬赏8万、3万、2万大洋，缉拿方志敏、刘畴西和王如痴，并派军队截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

在激烈的战斗中，刘畴西经常身先士卒，冲锋在炮火硝烟里。独臂作战不便，他就跪着射击和装退子弹。他英勇善战，



/ 谭家桥战斗经过要图。

指挥出色，功勋卓著，被苏区军民誉为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

1934年1月，刘畴西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8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嘉奖他，并授予一枚二等红星奖章。

黄埔同学成对手

首战失利谭家桥

1934年7月初，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很吃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即长征）启程在即。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牵制敌兵力并分散敌军注意，中革军委在长征前派出了两支部队行动：红7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调敌”；红6军

团西进湖南“探路”。

7月7日，红7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之名，在中央代表曾洪易（后叛变）、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的率领下，从瑞金及宁化西北地区开始向东线行动，进军福建、皖南。中革军委命令红9军团担任护送红7军团的任务，也一同向东线前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打了多次胜仗，但由于兵力单薄、部队受挫损失严重，这支队伍并没有起到预期的牵制敌人作用。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离开瑞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向西突围，开始长征。

10月15日，中革军委电令北上抗日先遣队（原红7军团）由皖南黄山地区转移到赣东北苏区进行整顿补充。10月21日，

又电令应逐步转回闽浙赣苏区，暂将3个团改编为2个团。11月上旬，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赣东北重溪（德兴县绕二镇重溪村）与红10军会合。

11月4日，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成立新的红10军团致项英、方志敏、刘畴西、聂鸿钧、曾洪易、寻淮洲、乐少华的电报，决定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任命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任命曾洪易为赣东北省委书记，方志敏为赣东北军区司令员。指示“新的10军团的目前任务……应仍出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

红10军团对外仍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号。刘畴西任先遣队总指挥（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第19师，原红7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部队，师长寻淮洲；第20师，原红10军部队，师长刘畴西（兼）；第21师，原红10军部队，师长胡天桃。新组成的红10军团辗转征战于闽浙皖赣边，屡挫强敌。其中，寻淮洲率红19师挺进浙皖赣边境，打击“追剿”的敌军，相机发展新苏区；刘畴西率红20师、红21师留在闽浙赣苏区，保卫根

根据地。

11月18日，中央军委电示红10军团转到外线作战，创造浙皖边新苏区。指示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第19师政委）、刘英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指挥红10军团行动。

12月上旬，由于反“围剿”形势越来越严峻，也为了开创抗日新局面，方志敏、刘畴西等奉命率红10军团指挥部及红20师、红21师跳出敌包围圈，转移到外线作战，经开化、会宁等地北上皖南，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等地。途中击溃敌2个保安团，摧毁碉堡100余座。

随着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撤离西去，中央苏区附近存在的最大一支红军部队，只有红10军团，有效牵制和分散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向西突围的压力。

增兵到8000多人的红10军团，一路向着南京方向挺进。蒋介石大为震惊，急忙调集5个正规师、2个独立旅及浙皖两省的4个保安团共约10万兵力，部署在浙皖赣3省边境，竭力阻止红10军团的北上，前堵后截，妄图将先遣队消灭在皖南地区。

12月11日，蒋介石调整部署，除在浙西、赣东、皖南加强堵截外，另编组“追剿队”，委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总

指挥，统辖第7师第21旅李文彬部、第49师伍诚仁部、补充第1旅王耀武部、浙江保安第1纵队蒋志英部，约11个团的兵力专事“追剿”，企图南北夹击，将红军围歼于黄山地区。俞济时受命后，急设指挥部于皖南歙县，调遣驻太平县城仙源（今黄山区仙源镇）第7师第21旅“即向谭家桥扼要堵截”，补充第1旅集结歙县岩寺，第49师由婺源北上休宁，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和轰炸。

刘畴西出任红10军团军团长后，有尽快打一场胜仗扭转局面的愿望和决心。这时，尾随之敌补充第1旅显得尤为孤立突出。刘畴西决心把战场放在黄山东麓的谭家桥，这里地处太平（平）旌（德）歙（县）3县交界，扼皖赣交通要道，两侧山林茂密，地势险要，极利于伏击敌人。红10军团以3个师消灭敌补充第1旅，应有较大胜算把握，不但能获得物资补充，而且能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于是决定在这里打一仗，其他领导人也表示无异议。

国民党军补充第1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33年冬由保定编练处的3个补充团改编，旅长王耀武，他与刘畴西曾多次在战场上交手。当年刘畴西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加堵截的就有王耀武；刘畴西任红21军

军长参加第4次反“围剿”时，王耀武率部坚守战略要地宜黄24天未被红军攻破，被蒋介石称为“奇迹”。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74军，即后来的整编第74师，也是王耀武一手带出来的部队。然而，黄埔1期毕业生刘畴西显然没有把黄埔3期毕业的“小师弟”王耀武放在眼里。

此役，可说是刘畴西与黄埔第1期同学俞济时、黄维、伍诚仁及黄埔3期毕业王耀武等人的一次战场上的同学聚会。

12月13日，红10军团一部翻越黄山，到达谭家桥，分驻谭家桥街上、文雅、西潭、留杯荡等地。同日，红10军团指挥部随同主力部队，从汤口沿大岩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入谭家桥地区。刘畴西以红20师、红21师在伏击地域右侧担任正面攻击，却未把能攻善战的红19师放在主攻位置上，而是置于左侧，待正面打响后，再截敌退路。红20师、红21师主体兵力由地方武装、民兵组成，许多都是新兵，战斗经验不足，特别是缺乏野战经验。对如此兵力部署，军团参谋长粟裕和红19师师长寻淮洲当即表示异议，但刘畴西仍坚持原部署。新合编的红10军团内部矛盾重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12月14日凌晨1时，刘畴

西指挥红10军团各部陆续进入阵地。6时，敌俞济时部从汤口出动，向谭家桥方向进逼。9时过，敌前卫团（补充第1旅第2团）进抵距谭家桥约3公里处。红军中的新兵在伏击地域过分紧张，没等敌团指挥部进入伏击地域的包围圈，就提前开了火（另有新兵不慎走火之说），受惊的敌军立即停止前进，迅速以1个营占领乌泥关东南一带高地，其余在公路两侧展开，并抢占了路边高地。战斗开局出乎所料，反让敌军占了先机，原来部署的伏击战被迫打成了遭遇战。

王耀武后来回忆这场恶仗时写道：“敌人今天向我们袭击过早了，如待我们最后的部队通过乌泥关，他们再派部队占领，那不费一弹就可以占领该关。对我们形成包围以后，再开始对我们猛袭，我们就很可能失败了。”

红20师、红21师连续向敌前卫团发起猛冲，敌团长周志道被击伤。王耀武严令各部不许后退；令加强营和第3团3营增加到第2团的正面作战；令第3团主力向红军左侧背猛烈反击；令第1团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坚决守住。

红20师先被蜂拥而上的敌军击溃，乌泥关制高点被夺去。离得较远的寻淮洲看到了乌泥关的重要性，亲率红19师发起反攻，想夺回乌泥关高地。然而为

时已晚，敌人的火力太强，红军的几次冲锋都未奏效。寻淮洲腹部中弹，警卫员急忙将他背离战场。寻淮洲曾经5次负伤，谭家桥成为他的最后一次，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在次日转移途中牺牲，遗体葬于茂林附近的蚂蚁山上。在谭家桥战斗中牺牲的还有红83团团长牛叶春、红87团团长黄英特和政委许施应等人。红10军团出师不利，损兵折将，经过一天激战后，终因敌众我寡，连夜后撤。

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向王耀武报告：有10多名红军战士拼死护卫一个人的遗体。王耀武立刻派人寻找，发现此遗体正是红军师长寻淮洲。王耀武回忆，当他们挖出寻淮洲的遗体时，惊呆了，时值寒冬，寻淮洲几乎没有穿衣服。原来是红军缺衣少食，有人牺牲了，活着的人就把烈士的衣服扒下来穿上，继续战斗，即使是寻淮洲的遗体也不例外。由此可见红军当时的极度困难处境。

谭家桥一战，刘畴西原本设计好的伏击战落了空。红10军团大伤元气，已经无法在皖南立足，只能向皖浙赣边上撤退，在寒冷的山区风餐露宿，靠兜圈子避敌，逢敌必战，逢战必退，部队战斗意志大大削弱。

为保卫南京捐躯的青年将军华品章

□ 林开伦

抗战期间，西昌曾有一位为保卫南京，坚守雨花台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直至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青年将军，他就是黄埔军校第5期炮科毕业，原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8师262旅副旅长华品章。

从小立志 报效祖国

华品章，字荣褒（后改为希平），1901年出生在四川省西昌市西乡凤凰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他出生前两个月，父亲华宗清在给外祖父陈益谦修碉房时，不幸意外身亡。华品章出生后，外祖父资助其母一些“浆米”田耕种，谁料华品章的幺叔为了占有那些田，企图将他害死。母亲为保其命，忍痛将他送到亲戚家寄养，直到华品章8岁时才接回家读书。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华品章从小学习刻苦，小学时，老师每天讲过的内容，他能在第二天“回忆”出来不走样，对此，老师和同学无不称赞。后来，他约上堂弟华继明（翰章）到马坪坝朱海楠老师处求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宁远中学。中学毕业后，因家庭困难，暂时回



/ 华品章。

乡帮助母亲种田。华品章目睹自家清贫、孤寡受欺，坚定了奋发进取的信念。1919年秋，他与堂弟先后离开家乡去成都。他选择到成都军士教导大队习武。临行前，华氏家人为华家有这样的有志青年感到高兴，为了鼓励他为国建功立业，争相为他饯行，并由村里的“清明会”出钱给他作路费。堂弟后来到四川高师文科继续求学。

华品章在成都军士教导大队学习期满后从军，先后当过排长、连长。1926年又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炮科深造，随后参加北伐和抗战。其间，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叫荣褒，含有

贪慕荣华富贵的意思，而亲眼所见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让他无比愤慨，因此取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之意，改号为希平。

以身作则，治军严明

华品章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拥有良好的军人素养。他不论是在成都军士教导大队还是在黄埔军校炮科学习深造，处处都以军人职责严格要求自己。不管在北伐途中还是在抗战期间，他对部属赏罚分明，治军讲求实效。在实施军事训练中，他要求口令与动作要标准一致：讲求“四到”即“心到、口到、目到、手到”。平日生活中，他强调衣冠整洁，严守纪律，处处体现军人的品格。

堂弟翰章从成都高师文科毕业后回西昌县立中学教书，后来得知华品章在部队任职，便约上同乡吴华久和华品章的内弟陈彬如去部队找华品章，希望为抗战效力。3人来到华品章所在部队，华品章将其拒之门外，叫勤务人员先给每人20个大洋，要他们先买好衣服，换上军装后才准进入他的营区。



南京保卫战战迹寻研团 提供

/ 1937年12月10日,日军拍摄的攻击南京光华门照片。

华品章常说,做了人家的官长,虽“居高临下”,但最要紧的是自己要人格高尚、大公无私,部下才会心悦诚服。他说到做到,对自己的部属也从不姑息迁就。华翰章作为他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又是堂兄弟,在他手下任秘书,偶尔弄错了公文哪怕是一个字,他也不顾及情面给予严肃批评。

1935年,华品章升任国民革命军72军88师262旅524团团团长,驻防四川灌县。他严明部队纪律,处处以身作则,不损害老百姓利益,并积极协助地方行政官员兴修水利,为当地民众所赞扬。

南京失陷,为国捐躯

1936年底,为了适应抗日需要,华品章被调往江苏无锡荣巷建立军士教导大队,练兵备战。由于他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治军有方,他的军士个个同

仇敌忾,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即向全国发动全面进攻,在北方分路进攻华北,在南方向上海进攻。华品章所在的国民革命军陆军72军88师奉命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上海失陷后,日军调集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11月底兵临南京城下。为了守住南京,88师262旅奉命调进南京镇守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华品章任262旅副旅长兼野战补充团团长。第88师师长由72军军长孙元良兼任。12月3日,为了激发全师官兵的抗日斗志,提高士气,孙元良在金陵大学举行阅兵,慷慨激昂地指出“敌人不是打不死的!”

12月8、9日,日军陆、海、空三军同时向南京城发起猛烈进攻,炮弹雨点般地落在262旅的阵地上。262旅官兵没有退缩,誓死守卫脚下阵地,一次又



/ 日军占领雨花台后拍摄的战场一角。

一次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9日上午,日军攻占了光华门,262旅官兵奋勇战斗,终于夺回阵地。日军见雨花台、中华门、光华门防守坚固,又增添了两个精锐的海军联队从长江口直插而入,猛冲我军阵地。262旅在264旅旅长高致嵩率部增援下,再一次击退敌人。10日,敌人从早晨7点起,用飞机和大炮轰炸后,即以两个大队分由两侧猛攻雨花台,华品章带领官兵仍然坚守住阵地。11日战况更为激

/ 记录有华品章名字的死亡官兵调查表。

烈。这天，262旅、264旅均全部上了火线，连工兵营也参加了战斗。敌人一次次冲上山头，又一次次被打退。12月12日，敌人更是疯狂反扑，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不断猛攻，再次攻破中华门、光华门和雨花台。华品章看到自己的部下伤亡太大，内心悲痛不已，誓与自己的士兵和阵地共存亡，在已经受伤的情况下，仍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率领幸存的部下坚持抵抗，奋勇冲杀，与敌人反复肉搏，终因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寡不



/ 华品章雕像。



/ 华品章纪念碑。

敌众为国捐躯，年仅36岁。

俗话说“忠孝不能两全”，华品章从1919年离家赴蓉至1937年12月12日捐躯雨花台，18年间没有回过一次家。他那孤寡母亲在家把眼盼瞎了，但到死也没有盼到儿子归来。1937年5月19日，华品章给上级写报告，准备请假回家料理母亲后事，但报告未被批准。后来，他给堂弟的信中这样写道：“母亲坟地价值既已说妥，同卖主讲准于7月请假回家付款成交……”殊不知，就在7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国难当头，他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毫不犹豫地上了战场，最终把生命献给了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事业。

为了纪念这位西昌籍的抗日将领，2005年，西昌市人民政府在泸山风景区修建了“华品章将军纪念碑”。2012年，又在华品章家乡西乡乡凤凰村修建了华品章将军纪念广场，雕刻了华品章石像。2014年春，凉山档案局、西昌市档案局、凉山电视台根据资料摄制了《高品华章》两集专题片。

家祭无忘告乃翁

——记黄埔同学、民革党员毛鸿基

□ 闫锋



黄埔同学、民革党员毛鸿基，浙江杭州人，1916年3月19日出生，2001年7月13日去世，享年85岁。1941年，毛鸿基进入位于贵州的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17期通讯科学习。1949年11月在重庆率部起义。1985年7月加入民革。

1931年，毛鸿基在国民党南京交通兵团无线电教导大队当兵。1933年，奉命调到重庆交通兵团通信营1连任见习官报务员，后调至江西南城配属36军。1936年，调至南京通讯兵1团独立营4连任上尉排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鸿基所在电台担任防空通讯任务，主要联络江、浙、皖三省的防空指挥部，收集日军飞机的相关信息，为前方战场决策和后方保卫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1938年，通信兵团整编，毛鸿基调至广西桂林，后又奉命调到重庆，隶属防空委员会中央防空情报所，负责联络各防空司令部，掌握关于日军飞机袭击方向和被炸地区的情况。由于长期离家，思母心切，在给母亲的一张个人照片上，毛鸿基写



/ 受表彰的毛鸿基。

道：“慈颜避难离故乡，骨肉团聚甚欢畅，各奔异乡彼此念，奉上近影慰慈怀。”

1941年，毛鸿基进入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17期通讯科学习，主要学习通讯、步兵、炮兵、骑兵等对空联络作战的战略战术及军事训练等科目。毕业后分配到桂林军委会政治部电讯1大队直属区队任上尉分队

长，主要负责四战区、六战区、九战区前后方各军、师部队的战报工作。1944年夏，日军进攻桂林，桂林危急。毛鸿基奉命调往贵阳，承担同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联络及搜集各部队战报的任务，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他奉命调到武昌联勤总部无线电总台临时第十二区台任上尉领班。1947年后，先后调往南京联勤总台负责通讯业务、广州联勤总部无线电总台任台长、重庆国防部通讯署总台任台长。

1949年11月，毛鸿基率全台官兵随总部在重庆起义。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缺乏通讯设施和电台装备，毛鸿基指挥电台官兵将所有电台机器，各类密码呼号等清点、造册后上交，得到领导表扬。起义后，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通信学校等任军事通讯教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通讯人才，被授予军功章及“模范教员”等荣誉称号。此外，毛鸿基还多才多艺，京剧唱得好，二胡拉得更好。每逢部队有联欢



/ 1938年，毛鸿基给母亲童志警的照片及留言。

活动，他都会被邀请登台表演，表演的节目深受大家欢迎。

1954年5月，毛鸿基从华北军区学习团第1队转业。1955年，他服从组织安排，到太原水土保持站工作。工作期间，他深入基层详细了解水利、水土保持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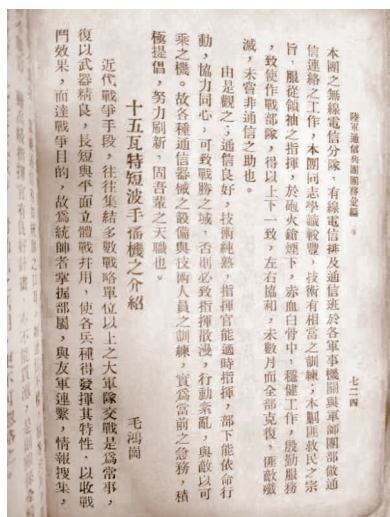
就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致力改善一些水资源贫枯地区的现状。后来，先后调到林业水利学校、晋源灌溉管理段、山西省汾河一坝灌区工作。1988年，72岁的毛鸿基从山西省汾河水利管理局退休。

作为一名黄埔同学，毛鸿

基始终铭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作为一名民革党员、台属，他牢记民革章程，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为工作重点，团结海内外人士，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努力工作。

毛鸿基的大哥毛鸿岗曾就职于国民党广州交通兵团、通信兵团任中校队长等职。1946年底去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毛鸿基与大哥暂时失去了联系。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毛鸿基与在台北的毛鸿岗一家取得了联系。刚开始时，毛鸿岗以为大陆贫穷落后，百姓生活贫困，经常通过相关人士寄钱给毛鸿基。在频繁的通信往来中，毛鸿基将大陆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告诉毛鸿岗，并在通信中附上生活照片，告诉大哥不要再给他寄钱了，希望他们一家能回大陆走走看看，亲身体验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7年7月5日，毛鸿基的大嫂毛杨剑秋（当时毛鸿岗已去世）同女儿毛颖芝、外甥女王韵婷从台北乘机到香港，再转机回到了阔别51年的故乡浙江杭州探亲。当时，毛鸿基正在住院治疗，他让大女儿毛颖青、二女儿毛颖松（均为民革党员）乘飞机赶往杭州与毛杨剑秋会面。毛鸿基的三弟媳（三弟毛培生也已去



/ 《陆军通信兵团团务汇编》里毛鸿岗写的文章。



/ 毛鸿基大女儿毛颖青(后左二)与毛杨剑秋(前)及其女儿毛颖芝(后左一)、外甥女王韵婷(后右)合影。

世)携儿女也从广西柳州乘机前往杭州。虽然大家只是看过照片,未曾见过面,但是,当毛杨剑秋一行人一出飞机场,接机的亲人便一眼认了出来。大家激动万分,热情拥抱。

第二天,毛杨剑秋不顾旅途劳累,就急于寻找曾经居住多年的老房子。已经87岁高龄的毛杨剑秋凭借旧时的记忆,找到了曾生活过的旧居——杭州市清波门四条巷15号。在旧居门口,她回忆起往事:昔日内战造成物价疯涨、百姓居无定所,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因病治疗不及时,加之经济拮据先后病故。看到今天杭州发生的巨大变化,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毛杨剑秋感慨万分。回到台北后,他们将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转告给了亲朋好友,加之毛鸿基的侄女毛颖芝在台北的人脉很广,促使很多台胞来大陆

投资旅游,为促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毛杨剑秋回杭州探亲时,带来许多介绍台湾现状的报纸、毛鸿基从军时的照片等,特别是还带来一本《陆军通信兵团团务汇编》。该书是毛鸿岗1946年从大陆带去台湾的,书中不仅有毛鸿岗的文章,首页还盖有毛鸿基的印章。

《陆军通信兵团团务汇编》共有728页,包括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情况的图片30多张,国民政府、军政部等颁布的图例、表格、规则等,美、英、法、德、意、日等列强军用飞机比较表(侦察机、轰炸机)、军舰吨数比较表(主力舰、航空母舰、甲种巡舰、乙种巡舰、驱逐舰、潜水舰等)、军费比较表、海军人人数比较表、陆军人数比较表等,还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有关

资料。该汇编内容完全超出了陆军通信兵团的范围,毛鸿基的家人真诚希望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进行收藏。

毛杨剑秋探亲时还说到,毛鸿岗一家到台湾时带走了一本毛家的家谱,上面记载了他们同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同属一个家族。毛家的三兄弟毛鸿岗、毛鸿基、毛培生(起义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转业到广西柳州)先后参加了国民党,成为黄埔军校学生,可能与此有关。

毛鸿基生前经常告诉儿女,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祖国统一,没能到台北为去世的大哥上柱香。希望儿女们能替他完成心愿,希望祖国统一的那一天,“家祭无忘告乃翁”。

(本文根据毛鸿基的大女儿毛颖青口述和提供的有关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我的部队在长沙

□ 顾少俊

孙建勋出生于1921年，参加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后来进入黄埔21期1总队步科学习，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兵。我多次看望过孙建勋，这是一个震撼我灵魂的黄埔老兵。

孙建勋住在高淳乡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2014年春天，我第一次去该村。那时该村不通公交车，我问了好多人，才找到这个村。在村里，大人小孩都认识他。有一个姓孙的老人说：“抗战期间，我们村里有好多人参军打鬼子，但后来大多都跑回来了。我邻居以前就是和孙建勋一个部队的，他说，看到死的人太多了，心里害怕。有一次冲锋，一颗子弹把他帽子打飞，越想越怕，把枪一丢，就逃回来了。孙建勋胆子大，一直在部队。”

进村不远，遇到孙建勋老人的儿媳妇，她高兴地领我去她家。孙建勋家的大门锁着，他儿媳妇拿出钥匙开门。我心中掠过一丝不解：“怎么把老人锁在家里？”见我疑惑，孙建勋的儿媳妇说道，有一次出门买菜，忘了锁门，回来发现老人不在屋里，



/ 孙建勋。

赶紧出去找，最后在离村很远的地方才找到他。问老人去哪里？他说：“去长沙，打鬼子！这次鬼子兵力多，战事紧。我们团要担任主攻，薛岳点名让我担任主攻团团长……”

老人的儿媳妇介绍说，孙建勋视力好，精神好，每天都看书，但看的内容一点都记不住。有时，刚刚还好好地在房间里看书，突然就把书放下往外跑，边跑边说：“长沙告急！长沙告急！！鬼子已过新墙河……阵地不能丢……”

我这才明白，他家平时大门上锁的原因。

孙建勋的房间不大，床头有一张桌子，桌上堆着两摞书，大部分是《黄埔》杂志，还有一些讲述抗战历史的杂志。一进屋，就看到老人在看书，精神很好。我心里一喜，看来不虚此行。

“您部队的番号是什么？”“部队！我的部队在长沙。”答完后，孙建勋自顾自地接着说，“我是连长，我们阵地没有丢。白天，鬼子把阵地抢过去，我晚上带敢死队又把阵地夺回来……大刀砍卷口了，就捡起牺牲战友的大刀继续砍，最后一个连只剩下两个人……阵地没有丢！长官交代的，人在，阵地在！”

“一个连只剩下两个人……”说着说着，他眼圈红了。

再问，他又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最后强调：“阵地没有丢！长官交代的，人在，阵地在！”翻来覆去离不开他打得最惨烈的长沙会战，其他记忆一片模糊，采访一时无法进行。

孙建勋家西边是一条大河，河边是一条通往村外的小路。当年孙建勋就是从这条小路走上战场的。那天早上，母亲在村口送他，孙建勋走出很远，回

头时看到母亲还站在村口，不时地用手抹眼泪。孙建勋狠了狠心，不再回头，大步向前走去，冀图给母亲一个铿锵的背影，一个乐观向上的形象，借此给母亲一点安慰。

孙建勋原名“孙秀清”，入伍后，改名“建勋”，他要在抗日战场上建立功勋。他一次次出生入死，奋勇杀敌。凭战功，他从士兵升到连长，并因作战勇猛，人称“孙大胆”。长沙会战打响后，军长给孙建勋连补充了兵员、弹药和装备，命令该连到新墙河南岸首当其冲的地段防守，正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当时，有谁会想到这支部队将成为新墙河边上的一颗硬钉子，面临一场极其残酷的战斗！出发前，师长到连队壮行。“请长官放心，人在，阵地！”连长孙建勋的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他话音刚落，一百多名壮汉齐声呐喊：“请长官放心，人在，阵地！”声音惊天动地。

孙建勋连刚入阵地，天降大雨。十几个日军摸上阵地，一阵枪响，孙建勋连队损失了十几个弟兄。受此大挫，孙建勋怒火冲天，拔出大刀，快步冲上去，银光飞舞之际，几个鬼子纷纷倒地。孙建勋身后的士兵一拥而上，战斗很快结束。

傍晚，日军渡河偷袭，刚渡到河中间被孙建勋连等守军的

炮火击中。侥幸冲上岸的，也被孙建勋及兄弟们打落到河里。虽然日军的大炮击毁了孙建勋连的守军工事，但日军的步兵还是无法登上南岸河滩。

次日，日军又出动数十架飞机对南岸我守军阵地狂轰滥炸，阵地遭到重创，但战士毫不退缩。当日军企图再次渡河时，南岸枪声再次响起，日军渡河再一次遭遇失败。

4天里，日军渡河8次，均被我守军部队击退。随后，日军施放毒气，师部通讯员通知孙建勋等部队撤退。这段战斗经历也在孙建勋心中刻下深深印记，永不磨灭。

1949年后，孙建勋回到高淳乡下默默劳作，曾经的兵戎岁月一直埋在心间，没有人知道他当年叱咤风云的抗战往事。每当下大雨时，孙建勋会走神、沉默，想必脑海里浮现出的应当是当年守卫新墙河阵地的一幕幕往事。

一个夏天的下午，天气闷热。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孙建勋似乎听到新墙河对岸日军的大炮声。“不好！日军要偷袭。”孙建勋家堂屋中堆着许多装满小麦的蛇皮袋。孙建勋把一袋袋小麦搬到天井里，叠成蛇腹状“工事”。“工事”刚筑好，天空中一道闪电划过，雨点紧跟着落下，砸起许多尘土。几

分钟后，暴雨倾泻而下。“工事”里积满了雨水，孙建勋纹丝不动，密切注视“新墙河对岸日军的动向”，任凭“炮弹”在阵地前后炸响。暴雨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他一直坚守“阵地”。那一年，孙建勋83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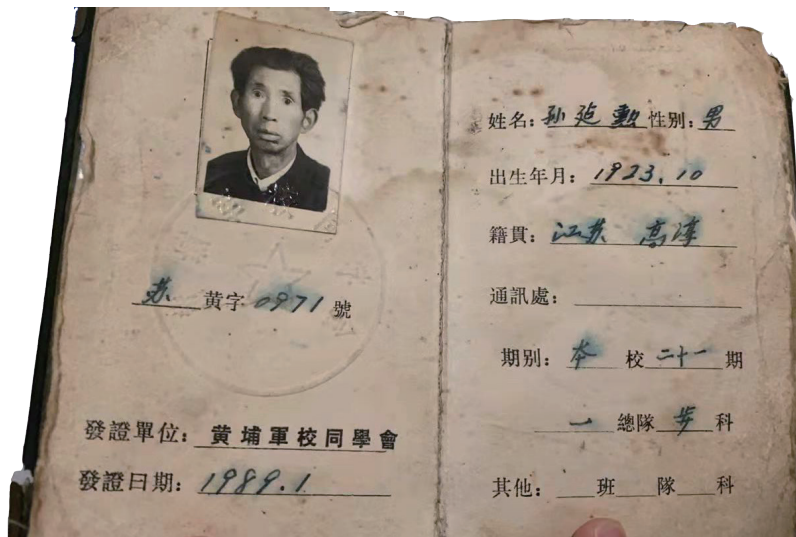
天气晴朗的日子，孙建勋要外出“侦察敌情”，在纸上画出“敌我双方态势图”。儿子担心他不认得回家的路，就在他衣服后面写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有一天，孙建勋跑到一座寺庙，说这地方是第九战区司令部，他要找薛岳汇报敌情。寺庙里的和尚给孙建勋的儿子打电话，儿子过来，好不容易才把孙建勋哄回家。

一个春天的早上，天色阴暗，细雨蒙蒙。正在屋里睡觉的孙建勋被几声春雷惊醒。突然，他好像看到通讯员跑到他床边传达上级命令：部队在高淳汽车站紧急集合，立即开赴长沙前线对日作战。孙建勋一刻也不敢耽搁，从床上一跃而起，飞快地穿上衣服，打好背包，向高淳汽车站狂奔。孙建勋急行军20里，赶到高淳汽车站，没有看到他的部队。他在高淳车站四周寻找部队，边跑边喊：“弟兄们！……弟兄们！……”雨水把他全身浇湿，他丝毫没有察觉。他身上背着子弹，刺刀已擦亮，怎么就找不到部队呢？“不好！肯



/ 孙建勋敬军礼。



/ 孙建勋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证。

定是长沙战事紧，部队已经去长沙了。”想到这里，他浑身打颤——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离开部队，岂不是比死亡还可怕？！他着急、难受。此时，雨越下越大，街上来往的车子很少。好不容易，孙建勋看到一辆汽车开过来，他一把拦下，语气急

切：“我的部队在长沙，送我去长沙……直奔新墙河阵地！”司机是转业军人，他从车上下来，发现了孙建勋背上有个手机号码。他掏出手机，对孙建勋说：“别着急，我让你们部队长官来接您。”随即打通孙建勋儿子的手机。这位好心的司机一直等到孙

建勋的儿子赶到才离开。分手时，这位司机向孙建勋敬了一个军礼：“您是军人，我也是军人。我敬重您！”那一年，孙建勋85岁。

一个冬天的早上，孙建勋在村外的鱼塘边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呼喊：“弟兄们，坚持住！人在，阵地在！”鱼塘边上，堆满了土块。他说：“手榴弹打光了，就和小鬼子拼刺刀。”孙建勋怒发冲冠，虎目圆睁，大声狮吼：“全体上刺刀，准备白刃战！”原来，儿媳烧饭时，在屋里看书的孙建勋突然接到“薛岳长官立即赶赴长沙参战”的命令，来不及向家人告辞，赶忙出村，奔赴“前线”。在村口，他似乎看到日军猛烈的炮火几乎摧毁中国军队构筑的全部工事。日军机关枪疯狂地扫射，压得中国士兵抬不起头来。水塘这地方是日军的主攻方向，最重要、最危险，一旦失守，长沙城就危险了，孙建勋要亲自防守。他说：“危险、重要的地方，我来守。”后来，孙建勋的儿媳和邻居赶来把他接回家时，他的嘴都冻紫了。即便如此，孙建勋的每一道作战命令都吐字清晰、铿锵有力：“人在！阵地在！”“全体上刺刀，准备白刃战！”“二狗子，快！把我的大刀拿过来！”……战况紧张，孙建勋又要身先士卒了。“二狗子”完整的名字是“刘

一位黄埔四期生的人生经历 (下)

——记父亲姚国俊

□ 姚建

抗战生涯

1932年8月，姚国俊被任命为第25师参谋长。1933年3月，25师奉命开赴长城古北口，会同东北军107师、110师阻击来犯的日军第8师团。经过3昼夜的激战，第25师伤亡近4000人，师长关麟征负伤。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让一向骄横的日军倍感吃惊。日方事后不得不承认这一战役是“激战中的激战”。长城古北口战役是姚国俊参与抗战的第一次战斗。25师将士

们为国牺牲的英勇气概深深打动了他，但由于缺乏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技术，加之武器装备远不及日军，所以伤亡较大，这也让他深感痛心和不安。

1937年9月平津失守后，日军动用3个师团，140余辆坦克、装甲车，260余门火炮，60余架轻、重轰炸机向保定进攻。此时，姚国俊任52军参谋长，军长是关麟征，下辖第2师（师长郑洞国）和第25师（师长张耀明）。中国军队为了抵御侵略，

与日军进行顽强的战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日方统计，日军参战兵力为88500人，被中国军队击毙1488人，重伤4000人以上。但中国军队伤亡更加惨重，仅第52军两个师就有14000多名将士伤亡！保定战役战况之激烈，正如当时的《大公报》记者所说：“（保定城垣保卫战）抗战之激烈，牺牲之悲壮，在平汉线为最甚。”多年后，姚国俊回忆这次战役时，说过这样一句沉重的话：“士兵和下级军官们血

（接前页）

二狗”，四川人，孙建勋的警卫员。当年长沙会战，在一次惨烈的白刃战中，只有他和孙建勋活了下来。后来，他和孙建勋在抗日战场上多次出生入死。这次，孙建勋差点冻死。那一年，他93岁。

2014年12月17日，铁血网站派人到高淳给抗战老兵孙建勋送勋章、牌匾、慰问金，并帮孙建勋向深圳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申请补助。来人告诉孙建勋：“鬼子打退了，薛岳长官派人给您送‘抗日英雄’的牌

匾。”并在纸上写：“薛长官让您在家休息。”孙建勋一听薛岳的名字，立即敬了一个军礼。随即要过纸笔，颤抖了半天，在纸上写下“见令即调”四个字。他把笔还给来人，解释说：“请转告薛长官，只要他一声令下，我立即调我的部队去长沙。”来人问他：“打仗，你怕不怕？”他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可能感到这个问题问得太幼稚了，说：“我是军人，军人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怎么会怕呢？！”那天，孙建勋特别开心，比平时多吃了一碗

饭。临走时，来人叮嘱他：“薛长官命令您在家休息，听儿子、媳妇的话。”孙建勋不停地对来说：“薛长官有命令，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这是一个时刻准备着的老兵。他随时在等待国家的召唤，等待长官再次给他下达作战命令。70年前“人在，阵地在！”的命令，至今在他耳边回响，他一直牢记。70多年过去了，他一直在坚守阵地。他的阵地一直没有丢，因为他还在，保家卫国的军人职责一直在。

流成河，不堪回首啊！……”

10月，52军奉命到达安阳以西的观台、水冶，与安阳以东的商震第20集团军（辖第32军一个军）共同守卫漳河防线。日军第6师团沿平汉铁路线正面进犯，第14师团之主力由肥乡、成安、临漳进犯。21日拂晓，关麟征、姚国俊等亲赴前线督战，指挥两个师的主力同时对漳河南岸之敌发起攻击。激战至深夜，双方在漳河两岸形成对峙。一天的战斗中，52军伤亡校官18员、尉官近百名、士兵3000余名。担任攻击任务的25师中，一位团长与敌人面对面拼刺刀而阵亡，一位团长负重伤，可见战况之惨烈。日军也因伤亡严重，后方空虚，退回漳河北岸。

1938年3月，日军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分别由山东诸城、临沂和津浦路南下，企图会师台儿庄，策应津浦路南段日军，攻占徐州这个津浦和陇海路上的大动脉枢纽，以便将其南北的军队联成一片。姚国俊随52军由亳州开往津浦线上的向城、洪山一线，阻击日军南下，配合正面作战。3月底，52军向盘踞在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的日军第10师团发起进攻。由于地形平坦和军械装备太差，进攻无法推进。后来，抓住日军昼战晚歇的规律，姚国俊同关麟征等策划部队昼伏夜出，采用夜

战、火攻战等消灭敌人，取得显著战果。4月初，部队继续向兰陵、洪山一带的日军攻击，歼灭当地敌人大部，支援了台儿庄的防守战。随后，52军又配合坚守台儿庄的正面军队，在外围歼灭敌人，并跟踪追击。日军大败后向枣庄、峄县方向逃遁。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4月下旬至5月中旬，52军与日军第5军在邳县以北激战。这是继台儿庄战役后，时间最长、战况最为激烈，双方伤亡最多的一次阵地攻防战。在这次邳北抗战中，姚国俊以他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在作战中的指挥应变能力，运筹帷幄，辅佐关麟征将军，打出了军威。根据日方资料，此役日本第5军所属第5师团战死1281人，伤5478人，第10师团战死1088人，伤4137人。而52军官兵亦伤亡过半（包括台儿庄战役中的伤亡人数）。

1939年9月，姚国俊随刚升任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的关麟征将军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姚国俊任15集团军参谋长，精心研究部署对日作战方案。当月中旬，15集团军在雷公山、草鞋岭一带，和日军连续作战5昼夜，双方伤亡均惨重。后来，由于当地抗日军民破坏交通，使日军后勤补给困难，日军权衡再三，被迫后退。15集团军抓住有利战机，大举

向日军进攻，加上地方部队协同作战，大败日军，收复失地。此会战从9月初始到10月初敌人溃退，长达一个月，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史上有名的“湘北大捷”，成为当时振奋人心的一件大事。关麟征也因战功显赫正式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初至1945年初，姚国俊调任52军第25师师长。他率部驻守云南南部，担任滇越铁路从河口，东至马关、麻栗坡等地的中越边境防守任务，击退了敌人多次侵袭，保证了滇南边防的安全，对于远征军向滇西一带日军发动进攻和打通中、缅、印交通线，起到了重要的掩护作用。

1944年10月，姚国俊出任第38军副军长。次年，参与了豫西鄂北会战。1945年初，侵华日军总部为了攻占老河口航空基地，遏制中、美空军对华北、华中主要交通干线的袭击，确保运输安全，发起攻占老河口航空基地的战役。在这次会战中，张耀明、姚国俊率第38军先至龙头岩，阻敌西进，后在大南岭、马家山之线阻敌。最后，日军以损失惨重的代价占领豫西并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

1947年初，38军奉命开往陕西，不久，姚国俊接任该军军长。

起义始末

军旅生涯中，姚国俊曾经参与过与工农红军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1936年，他随25师在山西阻截红军东进。1947年初至1948年底，他作为第38军副军长、军长，参与了在西北与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西府陇东作战、荔北战役。这些经历是造成他后来悔恨的主要原因，为此，他在60岁生日写的诗中用“世事沧桑自作愆”来表达这种心情。

其实，出生贫苦且深受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理论影响、并全身心投入抗日战争的姚国俊，并不仇恨共产党。例如，抗战胜利前后的1945、1946年间，他担任副军长的38军里发生了两次起义：一次是1945年7月，17师51团团长、共产党员刘威诚率该军17师的两个步兵团和一个步兵营及师直属部队之一部起义；另一次是1946年5月，孔从洲率该军第55师起义。这两次起义，特别是孔从洲的起义，对姚国俊来说并不意外。因为在38军，像孔从洲这样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军官，不论是秘密的还是已公开的共产党员大有人在。对此，姚国俊心照不宣，对他们仍以朋友、老乡或上下级相待。

另外，在陕西《咸阳文史资料》《礼泉文史》中，对姚国俊



/ 抗战时期的姚国俊。

在1948至1949年间保护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事迹，也都有所记载。如：

——他（姚国俊）同情革命和进步人士，并以合法的身份和手中的权力，多次保护掩护过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有次上级传达命令，让他派人去杀害兴平籍地下党员陈云樵，他说“我不能杀害乡党，双手沾满血迹”，予以拒绝，并暗示让其逃跑。

——1948年，他（姚国俊）还大胆提任姬溥为他部少将参谋长。姬溥，咸阳人，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多谋而干练，曾任孔从洲部参谋长。孔从洲起义后，他于1947年冬辞职归故里，因涉嫌“投共”，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监视。（《礼泉文史》1999年第一期）

又如：关于姚国俊保护陕西著名爱国人士茹欲立的事，《咸阳文史资料》（第七辑）是这样记载的：

1949年春，驻扎三原的第38军军长姚国俊忽接西安绥靖公署密电，命令其撤离时，胁迫茹先生南下，“如其不走，就地处决”。先是，姚驻防三原后，曾慕名前往拜望先生，交谈后更加敬重，因而对胡的命令坚决反对，乃持电稿找胡说：“这个任务，我无法完成。”不久，姚被撤职，由副军长李振西代之。

1949年4月底，姚国俊的38军军长职务被胡宗南撤销，随之被安排了一个“第19绥靖区中将高参”的闲职。撤消姚国俊职务的真正原因，是胡宗南怀疑姚国俊与共产党有关系。

20多年后，姚国俊在给儿子的信里，讲述了自己脱离胡宗南集团的经过：

……1948年，鉴于国民党失败命运已定，我曾经几次要求辞去军长职未准。1948年底至1949年初，我与38军副军长李振西、军需处长刘泊濡密商，准备有机会起义。不久，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得到在38军作地下工作的人员的报告后，

给我和李振西各写了一封信，李接信后即向胡宗南密报了。胡宗南在我接到信后第三天就撤了我的军长职，我辞去国民党所调任的第十九绥靖区副司令职。从那以后，我就与国民党脱离了关系，1949年5月携家眷来到成都……

1949年冬，已经卸职的姚国俊凭借与老友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和张耀明（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关系，在成都安顿下来，并与裴昌会及郭勋祺等人一起，策动了成都黄埔军校23期（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起义。

关于这次策动起义的经过，姚国俊曾于1979年撰写《我与军校关麟征和张耀明》（文章发表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9期）一文，作了回顾。1990年以后，在大陆公开发表一些文章和出版的一些书籍中，对此也有所记载。军旅作家陈宇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对姚国俊等多人的多次采访，写成了《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书中对起义的经过作了生动而详细的记述。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叙述。

新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接管成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成都军管会派人邀请姚国俊到解放军南京



/ 1962年，姚国俊全家合影（后排左二为作者）。

军事学院任教。姚国俊考虑后，谢绝了邀请。至于原因，后来他夫人对子女说：“你爸爸打了一辈子仗，当了一辈子军人，实在不想再当军人了。”共产党并没有忘记姚国俊。1955年1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第一届一次会议在成都举行。姚国俊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出席了会议，成为第一届四川省政协委员。

作为“特别邀请人士”的政协委员姚国俊，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负罪感。在他看来，自己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官至军长，参加过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自己应该认认真真学习和改造，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因此，刚当上政协委员的那几年，他对学

习和改造思想看得特别重。

他购买了一些理论书籍，如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等等。这些书籍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对姚国俊来说并不陌生。在黄埔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多少读过一些宣传革命的书籍。20多年后，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自己人生的起伏变化，再读这类书籍，他有了全新的感觉。每次阅读时，他都在书的空白处留下笔记，主要是内容提要、关键词、点滴心得等。此外，他还一丝不苟地钻研政协学习委员会发的各种学习资料。

姚国俊是抱着追求新知、

改造自己的信念和态度学习的，加上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过去那种战事频仍、民生凋敝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代之以社会改造、经济建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让他倍感欣慰。他始终相信共产党，乐观地面对生活和未来，同时他也要求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注意思想改造，做一个正直的人，勇敢乐观地面对生活、面对未来。他的言传身教以及和夫人一起营造的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使他的孩子们健康成长，有的成为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公务员，有的成为大学教授、中小学校长，并且在改革开放后，全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姚国俊作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所做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对台工作，即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到了70年代，70多岁的姚国俊依然没有“退休”的概念，仍然坚持工作。每周，他都抽几天，拄着拐杖步行或乘公交车到政协、民革工作。关于他在政协、民革工作的情形，曾和他一起共事的黄润蒲在2008年撰写了一篇文章（该文发表在《黄埔》杂志2008年第5期），满怀深情地对姚国俊的为人处世和工作作风等作了详尽的回忆。

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受四川省政协和有关部门的委托，姚国俊参



/ 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的姚国俊。



/ 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原会长郭汝瑰（左二）、副会长姚国俊（右一）、副会长裴先章（左一）合影。

与了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筹建工作。这时，姚国俊已年逾八旬，依然兢兢业业、一心一意地投入筹建工作，他和几位同事一起，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档

案，走访了许多原校友，齐心协力，完成了这项工作。1985年初，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姚国俊当选为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会长是郭汝瑰）。



/ 86岁时的姚国俊。

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伊始，就面临大量的工作任务要完成。其中最紧迫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部分原黄埔军校学员落实政策。姚国俊认为，自己作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帮助。落实政策是政府的事，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任务，主要是核实黄埔同学的历史情况，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材料和参考意见。这是一项繁杂、耗时的工作。因为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同，核实历史和部分现实情况，都要有真凭实据。姚国俊是黄埔4期学员，又当过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校友中威信很高，因此，大家对他抱有的期望值也很高。面对这样的信任与期盼，原本就对学弟们怀

有关爱之心的姚国俊更加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中。

每天一早，他都拄着拐杖步行到几公里以外的办公地点上班，直到中午。下午，他不去上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差不多每天下午、晚上，都有校友找上门来，请求帮助落实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对来找他的校友，他都热情接待，叫妻儿端茶倒水，然后认真听取、仔细记下重要内容。然后，找时间核对、落实或向有关部门反映，直到有一个让对方满意又符合政策的结果。来拜访的校友都对姚国俊的工作态度称赞有加。那时候，在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姚老太认真了，难为他了，感谢他了！”可

以这样说，自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姚国俊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同学会的工作上。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姚国俊响应组织号召，开始撰写文史资料。这时，他已75岁，右眼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模糊，写字十分困难。手术后，医生给他配了一副眼镜，眼镜的右边镜片犹如高倍放大镜。虽然看东西依然吃力，但总算看得清楚一些了。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一边从事政协和民革的工作，一边撰写文史资料。写作过程中，他常常反复修改、誊写稿件，实在吃不消时，就叫儿子帮忙誊写。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写了10多篇文史资料，共10万余字。这些文史资料，在他生前就已全部刊登在内部刊物《政协文史资料》《陕西政协文史资料》《四川政协文史资料》上，后来，这些文史资料又公开发表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徐州会战》《中原抗战》《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我所知道的胡宗南》和《关麟征将军》等书籍中，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1992年1月，88岁的姚国俊与世长辞。姚国俊逝世的第二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发出讣告，称“他的去逝，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与党长期合作的老朋友、好同志，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大损失”。

新疆黄埔人的空军生涯

□ 张玉堂

我出生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邮差，常年在外。幼年时母亲去世，我时常一人在家。1929年，我小学毕业。同年秋，14岁的我考取新疆陆军初级军官学校，其实，该校要求招生年龄不得低于16岁，我因为个子高得以“蒙混过关”。

新疆陆军初级军官学校是在杨增新所办讲武堂的基础上创办的。第1期学生共有108人，来自迪化和其他各县。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大概都比我大，较大的有30多岁（隐瞒了真实年龄冒称20几岁）。学员的待遇不错，每月津贴20两省票，吃、住、服装都由学校供给。我从此开始了“当兵吃粮”的生活。

军校校长由省主席金树仁兼任。教育长是陈品修，四川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学生分为4个队，总队长何积荣。4个分队长是刘宪章、马子贤、陶子晏和许宝林。军校没有分科，也没有专职的军事教官。我们只学习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

我们所学的课程有数学、语文、地形、测绘，还有战术课。由于师资不足，水平有限，



/ 张玉堂军校毕业照。

教学条件也不好，事实上没学到什么东西。

军校的管理比较严，一般不允许请假，平时不准擅自外出。星期日早晨8点离校，下午6点必须返校。住的是军校的营房，没有食堂，由校外一家饭馆一日三餐按时送饭，伙食还不错。我们每人发一套灰色军装，一顶没有帽徽的八角帽。第1期快毕业时大家都在传说，毕业后就是见习军官，每月薪饷能有128两省票，相当于连级待遇。

军校第1期于1931年初毕业。也许是因为年龄小，在军校这两年糊里糊涂就过去了，回想起来，究竟学了啥，居然没什么印象。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摸过枪。准备上战场了，不知道枪怎样背，

马如何骑。

由于军校开办得轰轰烈烈，待遇也不错，社会各阶层关注度很高。我的家族人数不多，报考军校的却不少。我的堂弟张玉昆报考的是成都本校23期，1949年后参加过二郎山隧洞的建设。两个妹夫——李发源军校1期毕业，和我同班；许忠志军校4期毕业，留校任教。内弟董广舒报考军校5期，在校期间意外身亡。

第1期学员毕业后，第2期也招生了，开学不久就因为哈密战事爆发而中止，直到1936年局势稳定才重新开办，招了第3期学生。1943年3月，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进入新疆后，将军校正式改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也称为“黄埔军校第九分校”。我们军校第1期，按黄埔序列算是黄埔军校第8期。

毕业后，我们赶赴哈密战场，我在盛世才麾下特务队做见习官。1934年底，我19岁，调任督办卫队第4骑兵团团长，驻防昌吉。驻防昌吉期间，我和盛世骥（盛世才四弟）发生纠纷，军事法庭处理不公，我一气之下



/ 1950年,张玉堂在南苑机场留影。

离开了骑兵团,在家赋闲。1936年,我考入新疆边防督办航空队2期飞行班。

考试时,考场内只有18名考生。最后录取了3名,其中有我。开学了,我们班共14名学员,从军校2期保送的有10名,他们是高明山、刘永厚、傅恩波、张实中、王惠德、王喜庆、刘毅、李基、张明季、安文金。加上我共有11人来自军校。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东北人。

新疆航空队(1932—1942年)是新疆督办与苏联合作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属国府空军系列。教学和执行任务归苏方总教官管理调配。共办有4期飞行班、3期机械班、2期侦察班。

第1期飞行班学员有13人,4名学员从军校保送。他们是陈



/ 1951年,张玉堂(前右一)和战友合影。

希贵、孙绪昌、何俊声、姜英堂。第1期侦察班中也有部分学员来自军校,时日长久名字记不清了。

第3期飞行班、第2期机械班共43人是众所周知的新疆培养的西路军飞行员和机械师。1938年3月入校。这两个班毕业时间分别是1942年和1939年。1946年返回延安。

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时期。新疆航空队第4期飞行班、第3期机械班、第2期侦察班共招

收学员80多名,绝大部分选拔自军校(16期)学生队。大家都知道空军是高技术军种,对身体条件、大脑反应要求很高,要优先从有一定战术素养的人中选拔,军校学生自然成了航空队的首选。

由于抗战需要,更是由于国府空军接管了新疆航空队。1942年,由我带队,学员中的大部分去了成都,继续在空军军官学校、机械学校等学校学习。也有部分学员经严格测评、考核,被



/ 1987年,航空队校友杨增荣、张宗从台湾归来合影。前排左起:杨增荣(机械1期)、张宗(侦察1期)、高继忠(飞行1期)、张玉堂(飞行2期);后排左一高鹤年(机械3期),左三马振铎(飞行4期),左四李成福(军械保管员)。

选派到美国继续深造。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各飞行大队和空军场站。此时,对于经历了抗战前期艰苦卓绝的战斗已消耗殆尽的中国空军,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我在送学员到达成都,把一切安顿好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命令我和高正臣、高尚谦(两位均为航空队同事)到重庆复兴关山下的中央训练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

我于1944年返回迪化。1946—1948年间,我经常一个人驾驶一架飞机守护着南疆库尔勒、库车、莎车、红其拉甫一线广袤大地。

1948年冬,航空委员会调我去南京受训。受训结束,直接安排我在武汉空军四军区机关任

作战参谋。1949年4月,空军安排少校以上级别人员向台湾撤退。到达湖南衡阳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我心里很清楚,国民党统治“气数已尽”,跟着一个被民众抛弃了的政权走是毫无前途的。再说,我一个人去台湾,留在新疆的一大家人怎么办?思虑再三,决定以接家眷为由,请假返回迪化。

回到家,我变成了无业游民。经航空队好友推荐、组织考察,1949年6月我加入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迪化的外围组织先锋社,还被推选为第三小组组长。先锋社全体成员积极参与了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7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的第三天(这时解放军还未进疆),就传来了原整

编骑一师(原骑五军)师长马呈祥所属的驻昌吉骑兵连抗拒起义,集体哗变,意图向境外逃窜的惊人消息。

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当即命令空军驻疆二五九供应中队(原新疆航空队)全力支援。邓力群指派先锋社负责人杨天云找到了我,紧锣密鼓地安排任务。当天,我就驾机沿着阜康向三台方向搜索,飞到五彩湾一带上空时,发现了正在逃跑的骑兵连人马,当即将所带的传单全部投向地面,然后迅速返航,向上级汇报军情。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表示庆祝,10月2日,新疆省政府在广场举行群众集会。这天,我驾驶飞机飞上蓝天,在会场上空做特技表演、撒传单,尽情表达新疆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美好祝愿。

1949年10月底,我和航空队的部分同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派来的专机接到了北京。我被安排在六航校担任飞行大队长。1950年秋天,第二批支援各航校人员离开新疆飞往北京,有飞行员张连贵、王德旺、傅恩波、崔慰民、王多文等人。其中傅恩波、崔慰民人民空军独立团当飞行员。崔慰民1956年转到地方民航工作,执行一次空

运任务时在西藏不幸罹难。张连贵、王德旺到北京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牡丹江七航校担任教官，还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教学工作。王德旺转业后回到新疆，在迪化蔬菜公司车队工作。王多文到空军后，被安排到吉林省的公主岭航空站工作。

在六航校的5年时间里，我们大队一共培养了8期学员。我在带飞时查出过两次重点隐患，由于及时发现，没有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保证了飞行安全，荣立三等功。我于1956年初转业，离开空军，回到新

疆参加石油生产建设。

离开了热爱的飞行工作，我的蓝天情结总是难以释怀！离开空军近30年后，在我70岁的时候，米泉县古牧地镇派人找到我，邀请我参与他们开发农用飞机的项目。还能有机会重温蓝天梦，真让我喜出望外。我约请了李仲凯、贾云柱两位老友，组成了一个精干有效的飞行、机务、管理班子。正当大家劲头十足、热火朝天地准备试飞的当口，这个项目突然被叫停了，我的蓝天梦功败垂成，感到非常遗憾。

在这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农用飞

机，决定购买“运-11”运输机用于农业生产。兵团领导派人找到我，希望我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在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我和相关人员一起赴哈尔滨选购飞机。虽说只是参与了此项工作，但这维系了我和飞机的不解之缘，让我非常高兴。

回顾一生，我和我的黄埔战友们一起，不断发扬黄埔精神，书写了一部爱国爱疆的、战斗的、不朽的空军篇章。

（本文取材于《蓝天未了情——新疆边防督办航空队飞行教官张玉堂口述回忆》，由张玉堂女儿张静整理）



/ 张玉堂,1955年,河北鸭鸽营机场。

张玉堂简历

祖籍陕西汉中，清朝末年父母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谋生。

1915年1月8日，出生于迪化。

1929年6月，小学毕业，秋季考入新疆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

1931年，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参加过两次哈密战争。

1933年，任新疆督办公署卫队2团8连连长。

1934年，任新疆第1骑兵混成旅第4骑兵团团长。

1936年，考入新疆航空大队飞行第2期。

1938年9月，新疆航空大队飞行班毕业后留校。在航空大队先后任助理教官、教官、3中队队长。

1943年，国民政府空军十六总站在迪化成立，任少校飞行员。

1949年6月1日，参加了秘密革命组织“先锋社”。

1949年9月25日，参与陶峙岳将军领导的和平起义。

1949年12月，调北京，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六航校2团2大队飞行大队长。

1956年，转业返回新疆，在石油局工作。

1973年，离休，住乌鲁木齐市。

2010年11月，因病辞世，享年96岁。

抗战大片《血战台儿庄》背后的黄埔故事

□ 李务起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5 周年之际，我有幸见到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凌锋先生，他原名费林军，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理事，也是电影《血战台儿庄》的编剧之一。他说，《血战台儿庄》上映至今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历史的风云尽管浩瀚汹涌，但不能冲淡人们对英雄的敬仰；岁月的河流尽管绵长蜿蜒，却无法带走人们对英雄的怀念。

从台儿庄战役到《血战台儿庄》

1937 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由于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不可一世的日军认为只要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南北日军就能连成一线、逐鹿中原。在攸关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军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正面战场的第一次胜利，这就是悲壮惨烈、可歌可泣的台儿庄战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提振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中国抗

战史上意义重大。

1986 年，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田军利、凌锋编剧的史诗级战争影片巨制《血战台儿庄》上映。该片再现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与日军决一死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抗战历史。上映后万人争看，有口皆碑。上世纪 80 年代的电影票价只有 3 角钱，电影《血战台儿庄》仅在 1986 年就收获了 2.7 亿票房，堪称中国电影史奇迹。该片也深受海外华人的普遍赞誉。1987 年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 50 周年，《血战台儿庄》在香港、澳门 16 家影院联映。首映那天，全港万人空巷，轰动一时。后来，这部影片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奖项，以及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的“力鸿杯”改革开放 30 年优秀电影剧本奖等。

《血战台儿庄》不仅在电影艺术上是成功的，在中国影坛上还有着无可取代、意义深远的地位，那就是以一部电影改善了两岸关系，促进了两岸交流。当时在两岸关系冰封的形势下，《血战台儿庄》坚持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罕见地正面塑造了国民党

军队将领形象，这也是内地第一次借助影视艺术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还原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更起到了推动海峡两岸破冰的作用。

主创人员、制片主任为黄埔亲属

电影《血战台儿庄》的背后还有鲜为人知的黄埔故事。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时刻，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田军利和凌锋冲破历史的禁忌，使得《血战台儿庄》剧本得以诞生。初创时，作者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采访了这场战役的多名参与者。之后，又经历了 17 次修改后，田军利和凌锋将剧本交给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由于种种原因，八一厂没能把《血战台儿庄》剧本拍成电影，八一厂生产处处长林亮将剧本推荐给了《八一电影》杂志。《血战台儿庄》电影剧本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发表，光明日报刊登该消息的当天，八一厂编辑部就接到了几百个电话，询问《血战台儿庄》剧本的消息。之后，林亮作为制片主任，和八一厂著名导演杨光远一起，把电影剧本推荐给广西电影制片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左二)与广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杨少毅(右二)、编辑部主任陈敦德(左一)、《血战台儿庄》编剧田军利(左三)、费林军(凌锋,右一)一起讨论剧本。

厂,最终使这部电影得以面世。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的林亮就是一位黄埔亲属,也是编剧凌锋的母亲。林亮早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新四军4师雪枫文工团团团员,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电影队指导员,并参加八一电影制片厂筹建工作,是八一厂建厂元老之一。

林亮原名顾林暲,祖籍江苏南通。顾家在南通是个大家族,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之后。顾家世代书香门第,有崇尚读书、忠厚孝义、苟利国家的好传统。抗战爆发后,日军的横行霸道,让顾家人个个义愤填膺,顾家子孙不忘祖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祖训,纷纷奔赴抗日战场。先是大姑娘顾永新、老二顾永馥、二姑娘顾永怀投奔了新四军,后是老三顾

永恪考上位于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老四顾永悟考入中央陆军机械化学学校战一期(黄埔15期)。1938年,顾永悟从陆军第200师装甲兵团,进入中央陆军机械化学学校学习战术,毕业后在全国唯一的装甲兵团——200师装甲兵团7连任排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昆仑关战役,担任过滇缅公路上的运输队队长,参加过保山腾冲战役、松山战役。抗战胜利后,顾永悟失望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经多方打听,找到在新四军的侄女林亮,经林亮介绍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特种战线上工作,实现了从黄埔学生到抗战英雄再到新四军情报主任的转变。

台儿庄大战中的黄埔师生

电影《血战台儿庄》源于



/ 影片拍摄现场。

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虽然台儿庄战役取得了胜利,但中国军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算上台儿庄战役前期的临沂保卫战和滕县保卫战,日军共投入5万人,自报伤亡11984人(实际应有2万余人)。而中国军队先后投入29万人,伤亡高达5万余人——也就是说,此役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比日军参战的全部人数还多。这场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其中黄埔师生的作用不可小觑。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广西桂林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接连丧失土地,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大多抱有悲观的看法。李宗仁率部在台儿庄大战中取得胜利,彰显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的勇气,也显示出黄埔名将的抗战精神和爱国情怀。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亲自接机,面对李宗仁谦逊请罪的言词,周恩来说,德公曾经指挥过著名的台儿

庄战役，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

在驰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一些黄埔师生在指挥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儿庄大战将领中的黄埔同学还有：李品仙（中央军校第一分校中将主任）、汤恩伯（南京中央军校教官）、冯安邦（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2期）、赵锦雯（黄埔工兵教官、管理处处长）、关麟征（黄埔1期）、王仲廉（黄埔1期）、李仙洲（黄埔1期）、张雪中（黄埔1期）、覃异之（黄埔2期）、池峰城（中央军校高教班）、张轸（黄埔4期战术总教官）、陈大庆（黄埔1期）、张耀明（黄埔1期）、郑洞国（黄埔1期）、甘丽初（黄埔1期）、刘振三（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2期）、蔡剑鸣（黄埔3期）、戴安澜（黄埔3期）、黄鼎新（黄埔3期）、吕公良（黄埔5期）、彭佐熙（黄埔2期）、石觉（黄埔3期）、罗芳珪（黄埔4期）、潘朔端（黄埔4期）、曾泽生（黄埔高级班）、邓春华（黄埔1期）、吴瑤（又名吴伯华，黄埔1期）、王隆玠（黄埔3期）、吴超（黄埔3期）、张忠中（黄埔4期）、杜鼎（黄埔5期）等。

吹响两岸破冰的号角

广西电影制片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虽处于南方边陲少数民族地区，但广西厂领

导和艺术家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拍摄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影片，培养出诸如张艺谋这样的艺术大师。当广西厂编辑部主任陈敦德第一次看到《血战台儿庄》剧本的时候，眼前一亮，当即与前来谈合作的八一厂林亮处长以及杨光远导演一拍即合。

《血战台儿庄》电影剧本经过田军利和凌锋多次修改之后，终于投拍。李宗仁的儿子李幼邻在美国得知内地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迫不及待地乘飞机回国，下飞机后没有到宾馆休息，而是直接找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杨少毅厂长、陈敦德主任，希望第一时间看到这部电影。当时影片还没有完成剪辑和配乐，但李幼邻坚持想立即看，最后看了没有配乐剪辑合成的样片。李幼邻才看了10多分钟，就忍不住热泪盈眶，对着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连声说：“太像我爸了！”

《血战台儿庄》在香港公映时，看完电影的台湾“中央社”香港负责人谢忠侯大感意外，当晚就通过电话向蒋经国汇报，蒋经国马上让当时担任国民党新闻局局长的宋楚瑜去香港想办法买到电影拷贝。新华社香港分社紧急上报北京，经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批准，《血战台儿庄》拷贝被送到了台北。收到《血战台儿庄》拷

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观看了影片。蒋经国在看完影片后深深感慨：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的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做些调整了。没过多久，蒋经国宣布允许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

1987年11月3日，第一批台胞从香港经深圳罗湖口岸入关，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奔赴家乡，与骨肉分离了37年的亲人团聚。仅仅一年时间，台湾来大陆探亲的人数达到了30多万人。谁也不会想到，一部电影竟然对促进两岸同胞的沟通和交往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李宗仁当年的秘书、时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程思远为广西电影制片厂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对《血战台儿庄》解冻两岸关系的贡献表示赞赏。

由黄埔亲属编剧、制片的《血战台儿庄》，艺术化地再现了黄埔师生和中国军民的抗战壮举，对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凝聚两岸同胞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和“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爱国主义精神养分和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海内外黄埔同学和亲属应当以黄埔情缘，共同为祖国复兴而努力。

抗日伤残官兵生产自救的安置事业

(下)

□ 杨守礼 黄胜利

中央伤兵管理处的工作

一、中央伤兵管理处安置荣军的措施

军政部中央伤兵管理处(荣誉军人总管理处)1939年8月至1943年12月安置荣军的措施如下:

1939年4月准第六临时残废院(临时教养院),1940年8月准第九、十三、十四临时残废院,1941年6月准第一、七、八、十二、十五、十七临时教养院及第五教养院,1941年7月准第四、十八临时教养院及第六教养院,成立工艺股。编制均为:官佐19员,士兵3名。1942年1月修正荣誉军人教养院、临时教养院工艺股编制,现规定在编官佐1226员,士兵8名。工艺股是中央伤兵管理处(荣誉军人总管理处)在教养院和临时教养院里设置的专门负责组织荣誉军人学习各种生产技能的机构,对荣誉军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9年8月,令各临时残废院将轻伤官兵编成园艺组,租佃民地,种植蔬菜,自耕自食,

并组织代耕队,为民众服务;1940年4月,令各临时残废院组织生产工业,以期自给自足;1940年5月,准第八休养院选派士兵协助桐油实验场种植油料作物,拨第一、第九两临时教养院伤残官兵,交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接收垦殖。

1940年9月14日,军政部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处长黄雍签呈《军政部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垦殖团编制表》,成立3个垦殖团、7个分团,以便容纳伤残官兵1万人。前呈已用电垦筑路办法安置伤残,已开发之“雷马屏峨计划书”,一并会同经济部,电请四川省政府核复意见。

1940年12月,令第十一临时教养院开驻靖县屯垦;1941年1月,令第十四、十五两临时教养院,拨送荣军到靖县第十一临时教养院屯垦;1941年8月,令第一休养院临时教养队开往靖县垦植;1942年1月,令第十五临时教养院开往靖县屯垦。

1941年3月,颁布《各教养院荣誉军人经商办法》。一等残废员兵随带眷属,生活困难,拟

定经商管理办法以资补助;1941年9月,拟定《各休养院机障官兵组训及担任各该地劳动服务办法》,令发遵照办理。

1941年6月,推行合作事业注意事项,颁发登记组织须知。令各院整理促进荣誉官兵生产事业;1942年3月,收集合作事业一般实际状况,及改善办法,发各院参考。

1941年12月,规定各休养院机障员兵转拨垦区工作,以期安置;1942年2月,令各临时教养院查报适于垦殖残障官兵,分配垦区工作。

1942年6月,令第九临时教养院选拔适于垦殖之机能障碍士兵,交由农林部四川东西山屯垦试验区从事垦殖;1942年9月,令第二临时教养院选拔轻伤残适于垦殖员兵300人,到农林部西昌屯垦实验区从垦,令第九临时教养院选拔荣军56人,到本部荣军生产事务局第二示范农场从垦;1942年12月,令第六临时教养院选拔轻伤残适于垦殖员兵317名,赴农林部安福垦区从垦。

1943年1月,调整前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直属垦区接受该局

之雷马屏峨垦区，及童家溪、东大台寺示范农场；2月，调整前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直属场厂：原属该局第一农场及第二工厂合并，改为军政部荣誉军人实验工厂；4月，该厂在编官佐30员、士兵35名，实习荣誉军人名额暂定为150名；6月，前“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警备队”改为“军

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特务队”。
1943年3月，签准组设江彰平北区荣誉军人屯垦总队，编制官佐41员，士兵35名；同月，电令第十八临时教养院，查勘陕西省府划拨祁阳县高岩镇官荒，选派荣军垦殖。
二、生产消费合作社的组建
荣誉军人总管理处及其各

级管理处，用古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的残而不废的事例，鼓励荣誉军人就业，再创美好的人生。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就是即可行又立竿见影的创业之路，这里列表（表6）概括了收集到的有关组织的生产、消费合作社的事项。

表6 1940至1943年有关组织的生产、消费合作社事项

时间	省、部	垦区	接受荣军情况
1940年5月	军政部	桐油实验场	第八休养院荣军协助种植油料作物
	军政部	荣军生产事务局	第一、第九两临时教养院荣军
1940年10月	湖南省	靖县垦区	由湖南荣军管理处开垦管理
1940年12月	湖南省	靖县垦区	第十一临时教养院荣军垦殖
1941年1月	军政部	第11临教院垦区	令第十四、十五临教院荣军垦殖
1941年8月	湖南省	靖县垦区	第一休养院临时教养队荣军垦殖
1942年1月	湖南省	靖县垦区	第十五临时教养院荣军垦殖
1942年4月	湖南省	靖县垦区	14对荣军集体婚礼，尚有另2次
1942年6月	农林部	四川东西山屯垦试验区	第九临教院适垦机能障碍士兵
1942年9月	农林部	西昌屯垦实验区	第二临时教养院荣军300人
	军政部	荣军生产事务局第二示范农场	第九临时教养院荣军56人
1942年10月	农林部	各垦区	包括荣军总共收44864名垦民，垦地243666亩
		河西屯垦区	新建垦区
		六龙山二屯垦区	新建垦区
1942年12月	农林部	安福垦区	第六临教院轻伤残适垦员兵317名
1943年3月	农林部	四川金佛山垦区	第一临时教养院荣军100名
	军政部	荣军北碚自治实验区	第一临时教养院荣军192名
	农林部	东西山垦区	第九临时教养院荣军251名
1943年3月	军政部	江彰平北区荣誉军人屯垦总队	组建此屯垦总队，编制官佐41员，士兵35名
1943年3月	陕西省	祁阳县高岩垦区	第十八临时教养院荣军垦殖
1943年4月	军政部	荣军实验工厂	编并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第一农场及第二工厂在编官佐30员、士兵35名，实习荣誉军人名额暂定为150名
1943年4月	农林部	西昌垦区	第二临教院荣军262名
	农林部	岷县垦区	第十三临教院荣军203名

时间	省、部	垦区	接受荣军情况
1943 年 5 月	农林部	雷马屏峨垦务局	被荣军总管理处垦殖一团接收
1943 年 6 月	农林部	东西山垦区	第九临时教养院荣军 128 名
1943 年 8 月	农林部	六龙山垦区	第四临时教养院荣军 192 名
1943 年 9 月	农林部	东六龙山垦区	第四临时教养院荣军 64 名
	江西省	万县垦区	划拨 2000 余亩官荒为荣军垦殖
1943 年 10 月	军政部	江彰平北区屯垦总队	第八临时教养院荣军 430 名
		沂山垦区	第十八临时教养院荣军 316 名
1943 年 12 月	荣军总管理处	湖南省武冈垦区	开拓垦区,收容荣军
		湖南省绥宁垦区	同上
1939—1943 年	农林部	陕西黄龙山垦区	接收荣军及战乱无家可归难民
		陕西黎坪垦区	同上
		江西屯垦试验区	同上
		甘肃屯垦试验区	同上
		河南屯垦试验区	同上
		福建屯垦试验区	同上

这些合作社都是生产与平民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也是荣誉军人所熟悉的生产方法,甚至有的荣誉军人曾经是某个方面生产的行家里手,所以这些合作社成立起来并不难,只要有人组织,大家互相切磋,再请一些较专业的人士加以指导,就水到渠成了。关键是伤兵管理处等机构再设法从必要的简单设备方面及原材料来源方面提供帮助,这些合作社所需设备大多并不难取得,有一些甚至可以自己动手制作。

表中所列各种生产合作社的能效都比较突出,例如地处四川镇远的第四临时教养院,1938 年 6 月成立,1940 年该院组织一所染织生产合作社,工作社员

30 人,制造线袜毛巾等项,每月生产线袜 120 打,毛巾 60 打。此外,他们另有 10 所卷烟生产合作社,共计社员 114 人,每月出产纸烟 20 万支,土制雪茄烟约共 75 万多支,产品质优价廉,销路极广。他们还同镇远县政府洽商,划拨白云山麓等 50 余亩荒山,作为荣军造林区,命名为荣誉林场,栽种桐树 5000 株,杉树 13000 株,杨树 2000 株。他们还自垦荒地 200 余亩,组织农垦合作社,社员 56 人,种植麦棉菜蔬等类。以上种种荣军生产合作社,使得第四临时教养院百业兴旺,生气勃勃。

三、培训和教育伤残官兵
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中央伤兵管理处)处长魏益

三在《社会服务周报》发表题为“残废军人教养”中指出:“现代国民均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国家亦有供给教育的义务,残废军人虽属肢体缺损,决不能因此失掉这个权利。”为了鼓励荣誉军人接受教育,教育部和军政部于 1941 年 8 月 2 日制定了《荣誉军人就学公立中等以上学校办法》,规定“荣誉军人倘若有志就学于公立中等以上学校,经军政部荣军总管理处核实资格后,发给就读证明书,然后可根据相应规定进入公立中等以上学校继续学习”。还规定“荣誉军人入各校就学,无论为正式生还是旁听试读生,一律免收学膳宿杂等一切费用”。

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

表 7 1940 至 1943 年部分分发伤愈军官任职表

时间	人数	分发去处	伤愈官佐来源
1940 年 1 月	637	各机关部队	军校第二分校荣誉大队毕业学员
1940 年 1 月	39	二十九补训处	四川伤管处第一补训处荣誉大队
1942 年 7 月	40	各部队	第九战区荣管处军官队第三期学员
1942 年 7 月	7	各部队	第五休养院健愈无队可归军官
1942 年 9 月	20	第三战区各部队	第二休养院健愈无法归队军官
1943 年 2 月	71	第三战区各部队	江西荣管处军官队第三期结业
1943 年 3 月	27	各部队	第六战区荣管处军官队第三期结业
1943 年 5 月	53	九战区荣管处军官队第四期收训	第一休养院健愈官佐
1943 年 9 月	36	各部队	第九战区荣管处军官队第四期
1943 年 11 月	44	各部队	陕西荣管处军官队第四期结业

对于荣誉军人的培训和教育做了大量工作。

伤兵培训和教育：1940 年 8 月，拟定《休养院军士队教育计划》；1941 年 1 月，令教养院举办班长训练；1941 年 1 月，准各教养院伤残员兵选送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予以专业训练，介绍工作；1941 年 10 月，规定《各院荣誉军人标准识字读本》；1941 年 12 月，规定荣誉军人申请就学范围及就学期间待遇；1941 年 12 月，颁布《各院伤兵治疗时期特种教育纲要》；1942 年 4 月，制定《荣誉员兵出院受训及学习待遇表》，发各院遵照执行；1942 年，准西南游击干训班在粤湘桂铁路沿线各医院、休养院选领愈兵加强突击实力；1943

年 10 月，订颁《各休养院 33 年度（1944 年度）住院修养士兵学术预定表》；1943 年 10 月，令第一临时教养院选送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第七期受训荣誉员兵唐建忠等 83 员名。

军官培训和教育：1939 年 2 月，令各院选送轻伤已愈官佐入游击干训班受训；1939 年 4 月，准各院已愈无队可归官佐提出证件，核送本部补训处军官队受训；1939 年 5 月，令第三休养院选送两腿健愈军官入“中央训练团荣誉班”受训；1939 年 7 月，令各院选送已愈无队可归军官入第二分校荣誉大队受训；1939 年 11 月，奉准由军校第六分校附设荣誉军官队，收训健愈伤官，并令各院选送，以资深造；

1939 年 12 月，湘省各院无法归队之健愈伤员，送军校第二分校军官训练班总队第五期荣誉军官队受训；1940 年 2 月，改定军校第二分校第五期荣誉军官队，特训已愈伤官以 500 人为限，并电该分校准备收训；1940 年 5 至 11 月，收训无队可归伤愈军官分别为 459、255、291、86、61、94 和 203 名；1941 年 9 月，核定《第六战区及陕西荣誉军人管理处军官队教育计划大纲》；1941 年 10 月 1 日，核定《荣誉军人校官教养队编制》；1942 年 11 月，核议荣誉军官不能再赴前线者，择优选送中央警校警官训练班受训，拟具原则呈核；1943 年 9 月，电中央警官学校派员考选各休养院机障荣誉军官，受训一年派充警

表 8 农林部和各省垦区接受荣军垦殖情况表

时间	省、部	垦区	接受荣军情况
1940 年 5 月	军政部	桐油实验场	第八休养院荣军协助种植油料作物
	军政部	荣军生产事务局	第一、第九两临时教养院荣军
1940 年 10 月	湖南省	靖县垦区	由湖南荣军管理处开垦管理
1940 年 12 月	湖南省	靖县垦区	第十一临时教养院荣军垦殖
1941 年 1 月	军政部	第 11 临教院垦区	令第十四、十五临教院荣军垦殖
1941 年 8 月	湖南省	靖县垦区	第一休养院临时教养队荣军垦殖
1942 年 1 月	湖南省	靖县垦区	第十五临时教养院荣军垦殖
1942 年 4 月	湖南省	靖县垦区	14 对荣军集体婚礼,尚有另 2 次
1942 年 6 月	农林部	四川东西山屯垦试验区	第九临教院适垦机能障碍士兵
1942 年 9 月	农林部	西昌屯垦实验区	第二临时教养院荣军 300 人
	军政部	荣军生产事务局第二示范农场	第九临时教养院荣军 56 人
1942 年 10 月	农林部	各垦区	包括荣军总共收 44864 名垦民,垦地 243666 亩
		河西屯垦区	新建垦区
		六龙山二屯垦区	新建垦区
1942 年 12 月	农林部	安福垦区	第六临教院轻伤残适垦员兵 317 名
1943 年 3 月	农林部	四川金佛山垦区	第一临时教养院荣军 100 名
	军政部	荣军北碚自治实验区	第一临时教养院荣军 192 名
	农林部	东西山垦区	第九临时教养院荣军 251 名
1943 年 3 月	军政部	江彰平北区荣誉军人屯垦总队	组建此屯垦总队,编制官佐 41 员,士兵 35 名
1943 年 3 月	陕西省	祁阳县高岩垦区	第十八临时教养院荣军垦殖
1943 年 4 月	军政部	荣军实验工厂	编并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第一农场及第二工厂在编官佐 30 员、士兵 35 名,实习荣誉军人名额暂定为 150 名
1943 年 4 月	农林部	西昌垦区	第二临教院荣军 262 名
	农林部	岷县垦区	第十三临教院荣军 203 名
1943 年 5 月	农林部	雷马屏峨垦务局	被荣军总管理处垦殖一团接收
1943 年 6 月	农林部	东西山垦区	第九临时教养院荣军 128 名
1943 年 8 月	农林部	六龙山区	第四临时教养院荣军 192 名
1943 年 9 月	农林部	东六龙山区	第四临时教养院荣军 64 名
	江西省	万县垦区	划拨 2000 余亩官荒为荣军垦殖
1943 年 10 月	军政部	江彰平北区屯垦总队	第八临时教养院荣军 430 名
		沂山垦区	第十八临时教养院荣军 316 名
1943 年 12 月	荣军总管理处	湖南省武冈垦区	开拓垦区,收容荣军
		湖南省绥宁垦区	同上
1939—1943 年	农林部	陕西黄龙山垦区	接收荣军及战乱无家可归难民
		陕西黎坪垦区	同上
		江西屯垦试验区	同上
		甘肃屯垦试验区	同上
		河南屯垦试验区	同上
		福建屯垦试验区	同上

官；1943年6月25日，新订《荣誉军官入中央警校受训办法》；1943年9月，准江西荣誉军人管理处军官队第四期学员于西鱼开学。

各种伤残官佐参加受训后，陆续分发到各战区、各部队任职。现将收集到的1940至1943年部分分发伤愈受训军官任职情况列于表7。农林部和各省政府协同安置伤残官兵从事垦殖工作。

1943年9月，荣誉军人总管理处致电江西荣誉军人管理处，查勘江西省政府划拨万安县官荒地2000余亩，选拔荣军从事开发。江西省政府还派遣荣军进入工厂学习，并帮助各残废军人教养院工艺股的残废军人学习工艺技能、获得报酬，安排了此后生活的出路。

湖南省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维持伤兵永久生计，创办伤兵合作农村，旨在为伤兵谋取一份职业，凡是愿意且体格适合归农的伤残军人都能加入。湖南省荣军管理处于1940年初获得湖南省支持，将靖县作为安置点，安排伤愈的荣誉军人从事屯垦。荣誉军人进入屯垦区以后进行分组管理，每8人组成一小组，每组授政府官荒地二三十亩。开办费及房屋、道路、沟渠等其他费用由政府先行垫付，耕牛、农具等由荣誉军人生产事务

局筹备处统一筹款购置。垦区的日常生产活动除了种植普通农作物之外，也注重养蜂养鸡等。位于湖南桃源的第六教养院共有伤残军人1505人，其中69人分散到常德、芷江、桃源、吴县等处经营商业。该院虽然收纳眷属1102人，但并未影响教养院荣军的生活水准。1943年12月，荣誉军人总管理处派员查勘湖南省政府划拨武冈、绥宁两县官荒，选拔荣誉军人从事垦殖。

1943年10月，第八临时教养院选拔荣军430名，到军政部江彰平北区屯垦总队从垦；第十八临时教养院选拔荣军316名到沂山垦区从垦。

农林部未成立之前，全国的农垦事务主要由经济部负责，农林部成立以后，接手了原有的陕西黄龙山、四川金佛山以及陕西黎坪这三大屯垦区，然后又先后在江西、甘肃、河南、福建等地设置屯垦试验区，一直到1942年10月，除新近成立的河西、六龙山二屯垦区外，其余各垦区总共迁移垦民44,864名，荣誉军人867名，垦地243,666亩。随后参与屯垦的荣誉军人逐渐增多，屯垦区的垦地也逐渐扩大。

现将收集到的农林部和各省垦区接受荣军垦殖的情况列于表8。

农林部在抗战期间开拓垦

区，收容荣誉军人和因战乱而无家可归的难民，为他们找到可以容身之所，并使其有了可以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农具，这对于荣军和难民来说是无上的恩德，对于国家而言则是获得了国民的信赖和安宁。特别是大批垦区的开发，不仅给收容的垦民以安身之所和谋生之路，而且为全民抗战提供了可观的粮食这一战备资源，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表中所列农林部和各省垦区接受荣军垦殖的事例，可说是挂一漏万，农林部各垦区接收荣军的人数远不止所列的人数，各省开拓的垦区表中所列甚少，不止于湖南、陕西和江西三省，只因资料收集条件所限，不能从各省的档案馆一一挖掘出所有资料，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作者的歉意。这种遗憾和歉意不止于表格，包括作者关于抗战伤残官兵救治、管理、抚恤和安置的系列文章之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偌大中国，档案浩如烟海，有待发掘。

本文资料来源与前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伤兵救助管理抚恤机构和社会组织》（《黄埔》2022年第5期）相同：“台湾国史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李翔、吕文洁、苏旻、廖芳芳、付楠和苟兴朝等人的论文。详见前文备注。

我珍藏的黄埔生朵含章签名本《军队教育》

□ 单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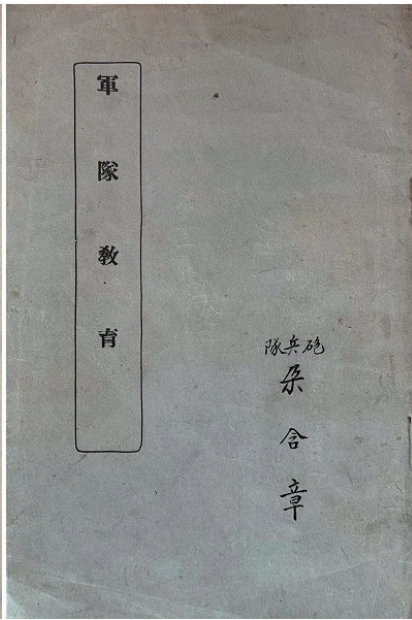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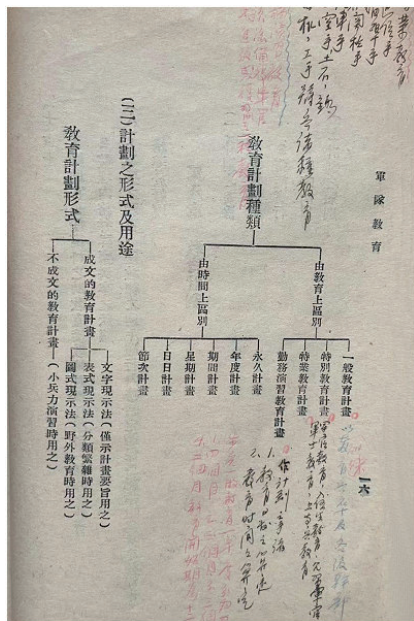
笔者所藏黄埔军校教程中有一本《军队教育》，何谓军队教育？释义：“军人者，上自军官下至士兵之总称也；军队者，以军纪结合多数军人之团体也；军队教育，由教育军人以及于练成军队之谓也！”是教程系民国十九年（1930）改订，大32开，120页，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印行。封面有蝇头小楷签名“炮兵队朵含章”6个字，内页有多处笔注。查黄埔同学录得知，朵含章是第10期第2总队炮兵队学生，青海门源人。经朵含章之子朵云鉴定，签名为其先父手迹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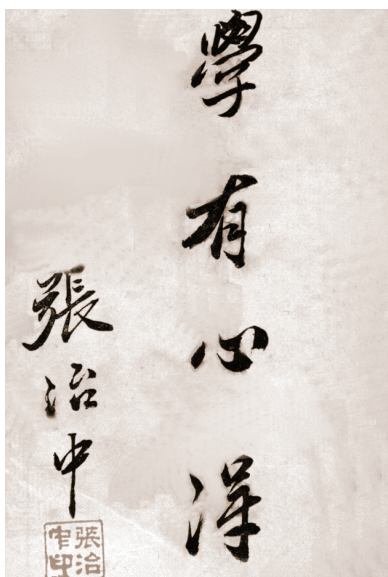
/ 朵含章。

朵含章（1910—1951），别号明正。考名取《易经》含章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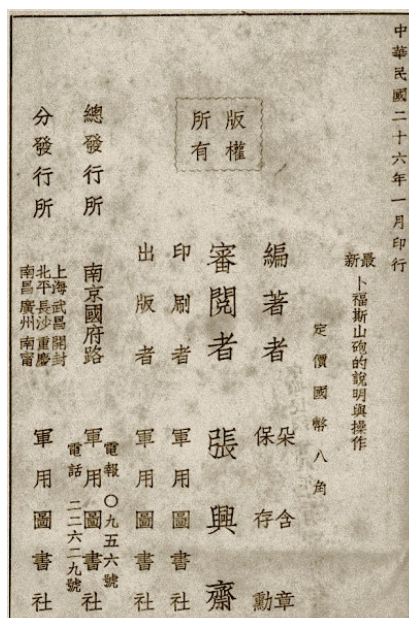
贞之“含章”，号出《文心雕龙》明正事理之“明正”。其生长于藏族牧民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追求上进，心怀家国。西宁师范毕业后，1931年从军，入陆军新编第9师，继入师办青海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结业任师工兵营中尉军需。1933年8月被保送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第2总队深造，入校编队分炮科受训。时炮兵队有学生百人，占本总队学生人数十分之一。炮科学生多为数理化成绩较好、体格健壮者。历三年炮科专业学习，完成炮兵初级军官的养成教育，对炮兵战术与技术的基础知识，达到精深的理解，如炮兵运用、射击指挥、观测通信、驭马术等。尤其是对一个炮兵连的指挥动作，达到驾轻就熟，运用自如。炮兵队受训使用的火炮以野炮、山炮为主，教练演习用的火炮有克虏伯野炮、三八式野炮、六年式山炮、卜福斯山炮等，通常使用的是卜福斯山炮。所用教材以德式为主，日式为辅，由德国顾问胡诺斯坦指导。1937年1月炮兵队学生毕业之际，由南京军事图书社印行两本书以示纪念：一本是《测地教练及实施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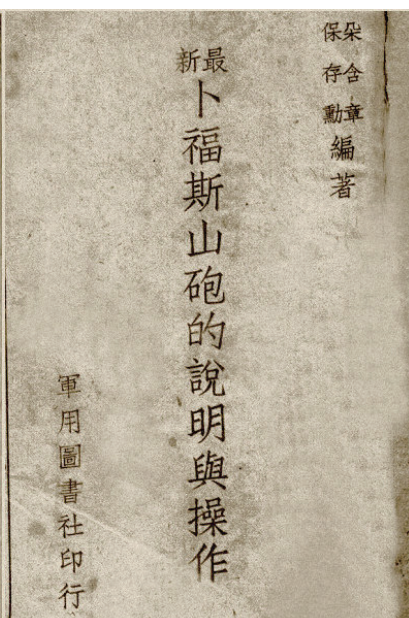
/ 朵含章签名本《军队教育》。



/ 《最新卜福斯山炮的说明与操作》中张治中题词。



/ 朵含章、保存勋编著的《最新卜福斯山炮的说明与操作》。



/ 卜福斯山炮射击演习。



/ 德国炮兵顾问胡诺斯坦。

记录了中央军校第10期第2总队炮兵队学生测地教练及实施野外演习之过程，内附测量手朵含章等角度测量记录表。另一本是《最新卜福斯山炮的说明与操作》，是朵含章与同窗挚友保存勋（别号九章，青海乐都人）编著，审阅者为炮兵队上校队长张

兴斋（山东平原人，保定军校6期炮科）。此书内页有中央军校官长墨宝，如上将教育长张治中题“学有心得”，办公厅少将主任刘永祚题“足资参考”，教育处少将副处长唐仲勋题“日积月累”，炮兵科少将科长傅正理题“精新足式”，炮兵队上校队长张兴斋

题“精详有序”。关于书内容，炮兵队同学张琳（别号贡九，甘肃天水人）作序曰：

世界兵器之精良无过德国，吾国军训之完善，当推本校卜福斯德之新兵器也！于吾国更新编著者十期二总队同学也！距离校

最近受飞进之教育，产时代之新书，理固然也！吾国炮兵寥若晨星，其参考书籍，亦乏良本，且以器材复杂，操作繁难，苟非长时流汗，绝难阐发秘诀。窃以本期操作山炮时间最久，顾问胡氏指导至周，凡属聪颖专致之同学，自有优异独获之心得。嗟夫！吾国科学始萌，武器落后，已为耻矣！若再于人之兵器不求甚解、敷衍塞责，则更耻矣！苟独解之而不能助人共解，亦非丈夫之志，故吾同学朵君含章、保君存勋，有鉴于此，尽精竞虑，朝夕探讨，三载血汗集成锦册，以享海内之干部而尽助人之美德，其内容之新颖，次序之整饰，文字之显达，均有异于流本。如上编说明之部，对山炮各部及鞍挽具与弹药之名称，结构至一孔一钉，无不详加解释，绘图显示。如下编操作之部，对各干部及士兵之动作与射击之方法，虽一姿一动皆以曲文形出，举例证明，即未学炮兵者执此书亦可以操作矣！洵操典之详解，干部之良友也！吾因之有感焉！近年坊间流本关于军事参考书籍，半为吾校前期之笔记，可知吾校之精神，除革命外更扬溢乎学术矣！二君在校已有如此成绩，则他日离校其前程岂易量哉！是为序。

民国廿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学弟张琳谨序于军校



/ 朵含章毕业留影。

朵含章自1937年1月分发回青服务后，正如序中所预言“其前程岂易量哉”，历任陆军100师副官处长，壮丁司令，82军上校书记处长。1940年又赴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5期学习。1942年7月毕业返青，先后任40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军法处处长，青海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高参，行宪国民大会青海省代表等职。1949年9月西宁宣告解放，朵含章赴台后念及在乡妻儿老小，恐负不孝之名，只身乘机从台湾飞回大陆，顺应历史潮流，向人民政府投诚，入西宁解放军官训练班学习。12月，受解放军委派到各县平定匪患，为巩固当地人民政权做出了贡献。后来，朵含章先后担任青海省政府委员、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省军区参议、省

政府胜利公债推销委员会委员等职，并被选为青海省少数民族人民代表，出席了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951年，朵含章遭不公待遇含冤罹难。1983年5月31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错判，为朵含章冤案平反昭雪。

朵含章出身黄埔为俊才，崇尚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恪守“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信条，清廉自持，不慕荣利；践行校训“亲爱精诚”，修身立德，待人执礼谦和，深得军政要人、社会贤达的赏识与器重。如爱国将领张治中曾为其著题“学有心得”；元老于右任曾以墨宝相赠，题唐诗名句“日月千龄旦，河山万族春”；冯玉祥将军也曾题词勉励；国画大师张大千亦赠与画作。交往者还有吴敬恒、鹿钟麟、叶楚伦、张之江等前辈。每省亲乘骑到村外必下马步行，其“敬老慈幼，无忘宾旅”的中华传统美德至今为乡亲所传颂。

浦东神炮立奇功

抗战之前，国民政府武汉行营设炮兵整理处，按照火炮种类整编了炮兵部队；编成两团制炮兵旅4个，独立炮兵团5个，独立山炮营、独立野战炮营、独立重迫击炮营各3个。炮兵旅通常装备的是瑞典制造的卜福斯

75 毫米口径山炮或德制克虏伯 75 毫米口径野炮，少数装备仿日辽造 14 式 77 毫米口径野炮。据估计，七七事变前，中国军队拥有 75 毫米以上火炮（迫击炮、要塞炮未计）1500 门以上。

黄埔 2 期炮科生孙生芝（1907-1985），别号桂萌，字志平，山东高唐人，抗战初期参加了淞沪会战，其撰文回忆：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我任陆军炮兵第 2 旅（蔡忠笏）第 2 团团团长，9 月初接事。当时该团编制为两个营 6 个连及直属部队。第 1 营 3 个连全部在浦东参战，第 2 营第 4 连在杭州湾之澈浦，第 5 连在澈浦以北乍浦，第 6 连在金山卫驻防。防线由杭州湾至上海浦东，全团拥有德制卜福斯山炮 24 门，团部及直属部队驻在平湖县城。我接事后，推进到闵行，因浦东战况激烈，我常驻浦东。

浦东当时只有步兵第 55 师，师长李崧山；另有独立战斗的陆军炮兵第 2 旅第 2 团第 1 营，该营有卜福斯山炮 12 门，还有良好的观测通信器材。卜福斯山炮口径为 75 毫米，最大射程 9200 米，最高射速为每分钟 25 发，为当时炮兵中最优良的炮种。该营主要任务为还击黄浦江上日军军舰的炮击，相机支援浦西我步兵作战。

9、10 月间，我浦东炮兵曾多次组织单炮小分队，外出夜袭吴淞日军的驻地、仓库、码头和船只。9 月 18 日，奉命配合空军夜袭，击中黄浦江上的敌旗舰“出云”号，并击毁敌舰多艘，沉重打击了敌舰群。10 月的一个夜晚，又受命奇袭日军飞机场（原浦西高尔夫球场），击毁、击伤敌机 12 架。为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曾多次以电话请驻守浦东的第 8 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传令嘉奖我部第 1 营。当时上海报刊对浦东炮兵多有赞誉，称之为“浦东神炮”。

战火重生“卜福斯”

“卜福斯（Bofors）”是山炮名，德国制造。自欧战后，德国因受凡尔赛条约之限制，不能在本国制造军火，便于瑞典境内卜福斯设立炮厂。此炮为 1930 年由该厂制造，是当时最新式之山炮，其炮身长度为口径 7.5 厘米之 20 倍，故名之曰：30 年式 20 倍山炮（卜福斯 M1930 7.5cmL/20 山炮），通常简称卜福斯山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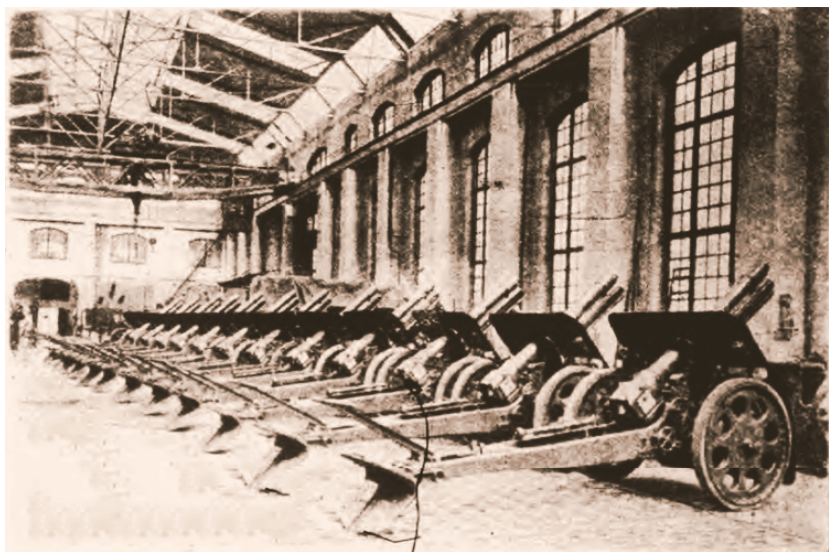
黄埔 11 期习世祥回忆：

我是河北平山人，从省立高中毕业后，于 1934 年 9 月投考南京中央军校第 11 期，录取后编入 1 总队炮兵队受训，1937 年 8 月 27 日在南京灵谷寺举行毕业典礼。之后，全体同学按兵种分发

各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当时炮兵学校教育长邹作华向军委会呈请派炮校练习营参加上海抗战，并请示从中央军校分派炮科毕业生补充基层军官。经批准后，由中央军校从 11 期炮兵队志愿报名的学生中，核准 8 人到炮校练习营。9 月初，我和郑崇城（察哈尔赤城人）、黄君材（别号觉中，广东龙川人）3 人奉命到炮校练习营第 2 连报到，按报到的先后顺序，分别担任连附及 1、2 排排长。在校时，我们 3 人同队同班，在一起生活学习，共同操练卜福斯山炮。到第 2 连，我 3 人仍一起生活、共同战斗；练习营使用的也是卜福斯山炮，我们都很熟悉此炮，因此，能在十分钟内装卸完毕。我们爱护“卜福斯”如同生命，同它建立了感情。我们 3 人情同手足，遇事互相商量，和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凝结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卜福斯山炮是当时从德国购进的比较先进的武器，射程远、精度高、运输便、装卸易。拆散后可搬抬、背扛、驮载和拉推，能使用于多种地形，实属步炮协同之优良灵便武器。在淞沪战役中，我连集中支援军师攻防，增强我军战斗力量，分散掩护连排进退，阻止敌人攻击。我连曾在南翔集中击退敌机对我阵地的轰炸，击中敌机一架。

淞沪战役 3 个多月，敌我伤



/ 瑞典卜福斯炮厂。

亡损失均大，到1937年11月5日，大批敌人从杭州湾登陆，我侧背受敌，遂奉命从上海撤退。练习营第2连也随之转进到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因敌人进展快，我连刚在中华门外雨花台占领阵地，日军已逼近城郊。我连在战斗中，多采取分散配属战。我们3人，每人携卜福斯山炮一至二门，配属连排协同战斗。我曾于12月11日配属一个排，携带火炮一门，炮弹15发，到前沿阵地掩护步兵战斗。我把火炮置于阵地侧方的掩蔽地，用望远镜侦察目标，直接瞄准目标实施分段射击，到弹尽补充无望时，即退回原阵地。两天后日寇攻占南京城，大肆杀戮奸淫抢劫。我军因指挥撤退部署失误，部队混乱逃散。居民能逃的早已离开南京，有的跑到外国使馆区避难，无法可逃的惨遭敌人杀害。此时我们

3人在郊外树林里商议：“弃炮逃生，人分散了未必能生；救炮则目标加大，人炮均不易保存，如之奈何？”我手握腰间佩剑，想起毕业时授剑官“成功成仁”的训词，作为黄埔军人应以爱护武器为天职，与火炮共存亡，怎能弃炮而逃呢？于是我们痛下决心：“三人生卜福斯存，三人亡卜福斯毁。”我们立即分头在农舍、路侧、沿河侦察情况，设法解决运炮问题。农舍人去屋空，门窗零乱，路途军服装备抛掷遍地，河里水障未除，河边被丢弃的破烂残船随处可见。郑崇城提议说：“我们自造运具把炮运走吧！”于是我们搜集木板和残破船只及一些废料，找到一位当过木工的士兵，合力修钉船筏，仅半天时间就修钉筏、船各一。我们把4门炮拆开，搬到筏、船上，乘着夜色冒着危险穿过城外的护城河。

当时只想把炮运走，那管结果如何？大家齐心协力，排除万难，向前航行，终于进入大江，把4门卜福斯山炮运到了长江北岸，“卜福斯”获得了重生！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各部门群集武汉，炮兵学校迁驻零陵。我们3人携带卜福斯山炮行军到湖南，炮校教育长闻讯后，传令嘉奖归来官兵。我们各获奖法币一千元，当即捐献抗日救国，我们3人还晋升军阶军职各一级，分任第1、2连和警卫连连长。稍事休整后，这4门卜福斯山炮又投入了保卫武汉的大会战。

礼和洋行军火商

礼和洋行是一个德国商人组织，股东是德国几个大企业主，如克虏伯等，总行设在德国汉堡，在世界各国大多设有分行，在中国单位独多，各大商埠都设有分支机构，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

礼和洋行主要业务是经营以下各厂及品牌的产品：德国克虏伯炼钢厂、蔡司光学器材厂、伊默克化学原料、也得西拉公司、蛇牌卫生医疗器材、汉堡轮船公司、瑞典卜福斯炮厂、英国司端尼油厂、美国古特立汽车轮胎及橡胶制品。礼和洋行是对外的总代表，它不但可以操纵德国国内市场，而且还控制着世界市场。凡是由礼和洋行经营的商品，按

照经销量，由各厂给以利润。不但如此，凡厂方直接售出的这些商品，厂方也还保留礼和应得的利润，允许礼和坐收利益。如南京军政部兵工署要购办兵工材料，认为经过礼和之手，要多损失一笔佣金，就直接向德国克虏伯炼钢厂订购。兵工署长俞大维电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谭伯羽（俞原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回国后即由谭延闿儿子谭伯羽继任），向德国克虏伯炼钢厂订购。结果谭伯羽来电，签订的合同，其价格比较南京礼和洋行报价还贵了一些，其中原因他们始终没有理解。

南京礼和洋行的代理人是福昌贸易行经理丁福成（1896—1966），浙江宁波人，1930年留美回国从事贸易工作。抗战前，民国政府通过礼和洋行从德国进口了不少军事装备，丁福成也从中获利不少，还在南京中山路兴建了一座豪华的福昌饭店，取“福泽四海，昌隆四方”之意，同时吸纳礼和洋行部分股份。福昌饭店建筑面积1483平方米，主楼高6层，是当时南京最高建筑。

财政部宋子文从国外购买军用物资，如前所述，既不愿与任何洋行接洽，也不愿同任何洋行签订买卖合同，他要直接和外国厂商洽订合同。他认为经过洋行，便多一道费用。礼和洋行为了争取宋向德国厂商购买，千



/ 1948年朵含章与家人合影。

方百计地探听他需购军用物资的品种、规格、数量、技术要求。用礼和洋行与德国厂商自备的密电码，急电厂方，及时催促，从速与宋电洽。必要时，还电邀厂方派员来华，由丁福成以厂家驻华代表资格，陪同来员与宋接洽，签下合同。从表面看，礼和是局外人，而事实上，礼和还是取得了佣金。宋向厂方直接订购，在价格上并不比礼和居间便宜。

礼和洋行兜售军用物资的

手段，还有一种是其他洋行无力办到的。1934年初，礼和了解到国民政府要扩充炮兵部队，需要购买山炮和高射炮。礼和所经理的瑞典卜福斯炮厂送来了说明书、图样、照片，以及有关火炮优点的参考资料，礼和就转交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同时要求发给进口护照，声明愿运送卜福斯7.5厘米山炮4门、7.5厘米高射炮2门，并配备炮弹若干，来华试放，借以证信卜福斯火炮的优良、准确、灵活，提供

国民政府和军事技术人员实地观摩参考。当火炮运到时，就在南京汤山射击场试放，军政部、参谋本部、炮兵学校、中央军校，以及其他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都派员参观。何应钦、朱培德、俞大维、邹作华等 150 余人受邀莅场。当时由卜福斯炮厂代表龙贝格亲自进行试放，他是欧洲有名的炮兵射击能手，一共试放几十发炮弹，射击目标准确，证明该炮杀伤力强，操作灵活，移动轻便，得到一致好评。试放结束，龙贝格还当场亲自分送纪念品，如有卜福斯火炮标识的金表等，并以茶点款待来宾。这次试炮，厂方花费了一笔巨款，约合法币 80 余万元，最后做成了一笔大生意。国民政府向卜福斯炮厂订购了第一批 7.5 厘米口径山炮 260 门，高射炮 24 门，连同 AEG 探照灯在内，总价值千万美元。炮厂试炮虽然花了巨款，实际上还是获利颇丰。配置高射炮的 AEG 探照灯并不是礼和经营的，AEG 公司有自己的代表在南京，这次虽然放弃不做，让给礼和经手，但是按行规 AEG 公司代表仍然拿到了佣金。1931 至 1937 年间，国民政府接受德国顾问团建议，由礼和洋行经手，向外国订购军用物资的品种、数量，约计如下：

1. 财政部宋子文订购：(1) 卜福斯 7.5 厘米口径山炮 380 门，

每门 1.6 万美元；7.5 厘米山炮弹 3.6 万发，每发 20 美元；(2) 卜福斯 7.5 厘米高射炮 36 门，每门 3 万美元；7.5 厘米高射炮弹 1.8 万发，每发 35 美元；(3) 移动式 10.5 厘米要塞炮 12 门，每门 3.5 万美元；10.5 厘米要塞炮弹 6000 发，每发 35 美元；(4) 军用光学器材，包括测远镜、炮队镜（旧称剪形镜）、瞄准镜等，约值 300 多万美元；(5) AEG 制造的直径 1 米半探照灯，连发电机约 100 多套，每套 1.8 万美元。

2. 军政部兵工署订购：(1) 各种机器设备车床、磨床、钻床，以及其他工具约值几百万美元；(2) 大批钢材器材；(3) TNT 炸药、卜福斯炸药，等等。

3. 军政部军械司订购：(1) 7.9 毫米口径步枪 2 万枝，每枝 30 美元；(2) 毛瑟木壳枪若干，每枝 25 美元；(3) 毛瑟白郎宁手枪若干。

4. 卫生署军医署订购：(1) 精密显微镜 800 架，每架 300 美元；(2) 外科用医疗器材，约值几十万美元。

5. 铁道部订购：(1) 克虏伯机车 36 辆，每辆 3.5 万美元；(2) 机车零件及钢轨，约 300 多万美元。

6. 资源委员会订购：(1) 矿山机器 5 部，每部 8000 美元；(2) 开山钻头及零星机械材料，约几十万美元。

7.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订购：全部设备，包括气象台用精密仪器仪表，约值百万美元。

8. 中央军校、炮兵学校、步兵学校以及其他单位订购：机器脚踏车、军用器材，约 10 万美元。

9. 军政部订购：美国古特立 32×6 卡车轮胎 3000 套，每套 40 美元。

如上统计，南京礼和洋行在这 6 年当中，经售各种军用物资，约计总价值为 2.7 亿金马克，折合约 9000 多万美元。

据丁福成回忆：“礼和洋行经理各厂商品，厂方给礼和的利润，一般按价 25%—30%。数字大的交易是 5%—10%。福昌贸易行代理礼和洋行做交易，所得佣金规定按货价 5%—10% 计算，每年可以做到一二百万美元营业额，每年可得佣金 10 万美元左右。礼和洋行给我个人的佣金，以军用物资来说，数字百万美元以上，一般是 0.5%；在百万美元以下的给我 1%—2%。礼和洋行给我的佣金并没有固定数字，要看情况而定，有时彼此争论，礼和洋行便把厂方来往电报对我公开，以厂方订购价格为依据。1931—1936 年间，由我经手为礼和洋行约做了近 1 亿美元的生意。”

（朵含章玉照及证件由朵云先生提供）

一寸丹心图报国

——从一枚六分校实寄封说起

□ 王翀

“张凤仙小姐亲收”

笔者所藏“寄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桂林奇峰镇李家村第六分校回教学生第3队的实寄封”，虽是一张看似无奇的邮政纸片，但是通过寥寥几行地址和备注，信息量却不容小视，让我们得以见证一段鲜为人知的黄埔第六分校回族学生参军抗战的爱国爱教历史，和一段革命时代珍贵的爱情。

该信封上写着：云南省澄江县仁西镇景宁街 175 号，张凤仙小姐亲收。信件发出地址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桂林李家村第六分校回教学生第 3 队。从称呼上和寄件地址中“学生第 3 队”的信息推断，寄信人和收信人年龄相仿，不禁令人猜测二人也许为恋人关系。

通过并不清晰的邮戳辨认，此邮件的时间为“三十一年二月二日”也就是 1942 年 2 月 2 日，“廿二”则为寄件时间 22 点。寄出地点是李家村。邮戳下方为李家村的拼音。在没有汉语拼音之前，1867 年，有个叫威妥玛的英国人发明了一种威氏拼音法，用来读和翻译汉语，当时广



/ 寄自李家村第六分校的实寄封。

泛应用于中国的人名地名中。威氏拼音法直到 1958 年才逐步被汉语拼音取代。根据威氏拼音的翻译方式，“李家村”应被译为 LICHAIKEN，与邮戳上模糊不清的字迹大致相符。

六分校回教学生队溯源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宁正式成立，并按总校序



/ 信封上的邮戳。

列，称为第六分校。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部长、桂林行营主任的新桂系回族将领白崇禧，一直非常关注回族青年的成长，在“兴教建国”口号下，以中国回教救国会理事长的名义号召各省回教青



/ 白崇禧。



/ 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学生正接受时任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将军校阅。1940年8月拍摄于桂林李家村。



/ 总队长安舜。

年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分校。

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回忆：

1937年，抗战军兴，蒋委员长号召全民抗日，后在重庆成立中国回教协会，父亲出任理事长。父亲倡导“十万回民十万兵”，号召大批回教青年投入抗战，对抗日有很大贡献，亦培养了不少回教军事人才。对于培养回教青年，父亲不惜余力。抗战期间，考选回教青年到埃及留学，研习宗教及语言。到土耳其研习军事，成为后来外交、教育、军事等重要人才。

自第15期起，全国各地招考有志青年报考，尤其是从山东、河北、河南、云南等敌占区招考了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回教青年入伍深造，并组成回

教大队，以满足抗战前线急需中下级军官的需求。山东省回族热血男儿投考数量居首位。山东回教救国会号召全省各地支会和清真寺积极动员和组织回族青年报考，全省共计300多人报名，经面试与笔试后录取243人。除此之外还有前往延安和参加马本斋回民支队的回族学生。

六分校首期番号为第15期第6总队，总队长安舜，字宾尧，河北保定人，回族，生于1898年。毕业于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第9期步科，后入陆军大学第11期深造。曾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谋、组长。1935年任参谋本部参谋。1937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少将学生总队总队长。1943年，任西北步兵学校副主任。1945年2月20日授少将军衔。

曾在抗日战争中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第40集团军参谋长。

总队下辖两个大队，第1大队是汉族学生（包括归国华侨），第2大队是回族学生，约600人。每大队各辖4个中队（简称队），一个队有3个区队，每个区队有3个班。第2大队俗称“回民大队”，在教学和训练内容的安排上，回民大队和其他大队唯一不同之处就是每周多上一节“伊斯兰教义”课，由教官尹光宇主持。

黄埔军校回民大队由于保持着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伊斯兰教信仰，在过严格的军事生活的同时，也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从黄埔第15期起，虽无随军专职阿訇，但大队和基层负责军官都是回族。这些回族军官，有的有很深的宗教学识和严格的宗教操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主



/ 作者藏六分校训练装备。



/ 1940年,中央军校第六分校16期生毕业典礼。(石俊荣供图)

任政治教官尹光宇上校(后为少将)。他曾留学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精通阿拉伯文和英文,游历过许多阿拉伯国家,到过中东朝觐,是位投笔从戎的儒将。

每到主麻日,尹光宇或者在桃花江教学生洗大小净或在操场上教学生做土净。由他领拜,认真过好聚礼日。每到斋月,回教大队官兵都要集体封斋,但军事科目和各种操练都不能停止,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大家精神饱满,纪律严明,深受其他连队的称赞。一个姓韦的上校还为此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经过学校研究同意,黄埔15期回教大队还正式成立了教务委员会,每个礼拜听尹光宇教官讲一次伊斯兰教义课,宣讲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以及爱教必先爱国的道理。还油印教义小册子,广为宣传。逢伊斯兰

教三大节日(开斋节、圣纪节、古尔邦节),都要放假一天。为了更好地规范学员的宗教生活,由尹光宇、筑城教官马全仁等起草并经校方同意,制订了15条严格的“礼拜规则”,要求回族学员认真执行。

回民大队学生的回忆

第六分校第15期第6总队第2大队赵尔谦回忆:

北平沦陷后,老父亲毅然决然地让我及姐姐迅速逃离北平,临行的叮嘱是:“能上学即读书,不能即去抗日救亡,切记!切记!抗战不胜利,决不可回家,不做亡国奴!”

在父亲的鼓励和鞭策下一路坎坷到达武汉,报考了黄埔军校,入六分校15期回民大队。时年16岁。该大队是黄埔历届中

人数最多最纯粹的一个完全由回民青年组成的学生大队。在校学习期间发奋学习,成绩优异,我的射击考核总是最优秀的!

第六分校第15期第6总队第2大队脱恩铸回忆:

到达桂林后,我们扔掉了生满虱子的破衣服,换上了新军装。接着正式编队,我被编入4中队,队长是黄埔9期毕业的张立人(少校)。由他教唱黄埔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新校舍建在桂林李家村,尚未竣工。我们在桂林休息一周

后，又徒步行军经阳朔、荔浦、鹿寨至柳州。借驻江西会馆、粤东会馆的房舍，开始了入伍教育的训练。我们的番号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第15期第6总队。下辖两个大队8个中队。1大队是汉族学生，2大队是回族学生。总队长安舜（回族、少将），总队副张权（上校），2大队长汪复邦（中校）。

入伍后首先要认识长官，认识环境，识别军阶、号音、各单位的号帽等。我们诙谐地把号音编成顺口溜，譬如开饭号为：“大米大米干饭，大米大米干饭，白菜汤……”紧急集合为：“快来吧，快来吧，快来快来快来吧……”一般集合号为：“出去玩的快快回来，快快回来……”

在学科方面首先重视政治课，课程是总理遗教、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领袖言行、军人精神教育等。军事学科课程有四大教程：兵器、地形、筑城、交通。另外还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斗纲要、阵中要务令等。

外语是学日语，教官是回国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或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学日语的目的在于准备战场应用。学唱的歌全是抗日流行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等。术科方面有：基本教练、战斗教练、射击教育、阵中勤务、

筑城实施、夜间演习、体操、劈刺等。基本教练在操场，战斗教练在野外。射击教育以轻兵器为主。阵中勤务是演习步哨、斥候（侦察）、行军、宿营等。筑城实施是构筑各种掩体。体操包括跳高、跳远、单杠、双杠、各种障碍通过等。劈刺是日式。学完基本动作后，还要能穿上护具和教官实战对刺。

日常生活方面：早上起床后点名、升旗，然后全副武装跑到黄村头（十余里），跑回来再吃早饭。每天学术课8小时，晚自习两小时。晚自习后点名、唱校歌、训话后就寝。有时深更半夜，睡梦中被号音惊醒，全副武装，到指定地点紧急集合，接着几里路的跑步。这样反复多次地训练，直至达到要求为止。过礼拜天也不轻松，要擦枪，整内务。钢盔、枪支、饭盒全要整齐、干净。外出穿外出服，还要注意礼节。柳州有一座清真寺，是我们节假日常去的地方。寺里有卖小吃的摊贩，都别具风味，亚热带水果也很便宜。我们的衣食、医疗、书籍全部供给，每月还发给相当一个上士的薪饷，足够我们零用的。

柳州虽物华天宝，风光宜人，但我们大都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饮食和山岚瘴气。不少人染上了伤寒、疟疾、黄水疮等病，以致影响了学习。入伍期末

考试，丁春滨等就是因体弱多病，跟不上班而淘汰回家的。

我们受完这“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锻炼和教育，从一个文学生初步训练成一个军人。我们符号的背面有四句铭言：“不贪生，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

每逢星期一上午，必举行孙总理纪念周。宣读《党员守则》《军人读训》。当时进行这些教育，以培养军人爱民族，爱国家，爱人民，坚贞英勇的高尚精神。

……

李家村的校舍建成后，我们又从柳州返回桂林，再次领略了“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风景甲桂林”的意境，饱览了祖国的秀丽山水，旖旎风光。

李家村校址在群山环抱之中，漓江支流相思江穿过其间，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是极为理想的教育训练之地。校主任由中将黄维接任，副主任兼总队长是周嘉彬，政治部主任是少将倪文亚，2大队长是少校韦隽三。是年（1939年）春，我们在桂林以集体入党方式，全部参加了国民党。一天，校长蒋介石由张治中等陪同，来校阅兵并训话，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勇于杀敌，拯救中华。这时正是国共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时期。陈诚、李宗仁、白崇禧、黄琪翔等高级将领都曾来训过话。

学校有时把教育好的战俘弄

来,要他们自我检讨如何反法西斯侵略,如何反战。由日语教官翻译,借以教育我们和提高我们的日语水平。

我们在桂林复习了一遍入伍课程后,即开始分科接受军官教育。各人按志愿自己选科。青州同学中的杨福生、丁昌镇、赵玉英、杨春华、赵东祥选学了炮兵科。丁昌燕、马传一选学了工兵科。马忠兴、马镜波、赵厚功选学了通信兵科。我和刘金海、马光耀、丁俊科等十九人选学了步兵科。

我们重点学习排连教练,学习步兵重兵器(重机枪、步兵炮)、战术(基本、图上、沙盘、现地),学师以下的攻、防、追、退、遭遇战及特种地形战术,实兵指挥,阵勤演习(大部队)各种科目的夜间教育。现地测绘,在野外专业实施半月,要求人人都能独立测绘地图。筑城实施也以连为主。其他体操、劈刺、政治课、军事学科、外语均高深一步。

2大队回族学生尚有伊斯兰宗教课,教官是中校政治教官尹光宇。他多次朝觐麦加,阿语、英语均十分流利。他两撇八字胡,神气十足,既担任宗教课,也领导宗教活动,常带我们去漓江洗大净小净。到了礼拜时间,由他领拜。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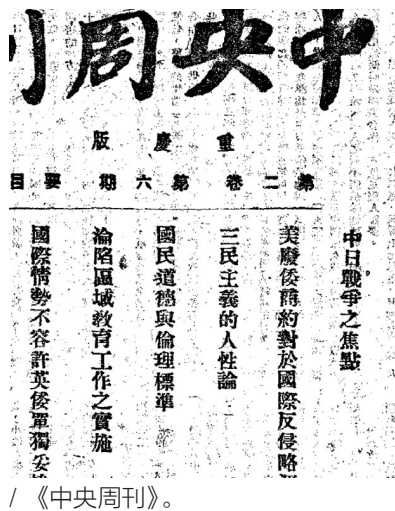
一天比一天艰苦,大家开始吃三等粗米,副食质量也日渐低下。日机经常来空袭,幸好这里天然山洞很多,飞机来了,我们都躲进山洞,在大山洞里,还能坚持上课。就这样经受了一年多的风风雨雨,我们的军官教育结束了。最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综合实战演习。学步兵科的于1940年元旦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其他各兵科也都陆续毕业。

“内《中央周刊》一件”

实寄封上有“内《中央周刊》一件”字样。

《中央周刊》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的时事政论性刊物,创刊于1928年6月,原名为《中央周报》,每周一期,至1937年6月停止发行,其间共出版473期。1938年7月7日在长沙复刊,更名为《中央周刊》,同年8月移至重庆出版,1948年11月停刊,复刊后共发行500期。

该刊内容十分丰富,设有评论、论著、天下事、本刊专访、批评之批评、国际论衡、艺与文等栏目。所刊载的文章系统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时事政治、经济建设、军事及国民党党务等方面的情况,是当时重要的官方刊物。《中央周刊》每期都会开辟一个栏目刊登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的体裁以散文和翻译



/ 《中央周刊》。

外国小说占主要。该刊的散文作品内容丰富,种类多样,语言平实自然,叙事、描写、抒情、议论都各具特色,从而使《中央周刊》中为数不多的散文创作呈现了特有的艺术风格。

队里的文娱室书刊丰富,队里按月拿出一些经费,同学们每个月也出一些钱订报刊杂志和购买一些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狄超白的《政治经济学入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甚至连《共产党宣言》等都有。报刊不仅有广西本地的,也有其他各地的,既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也有《救亡日报》和《新华日报》,甚至还有《解放》和《群众》等刊物,还有李公朴、邹韬奋办的《全民抗战》和《全民周刊》,以及胡风的《七月》……总之,五花八门,各类书刊都有。同学们还在活



1926年5月10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广东省农民大会及第六次教育代表大会代表900余人到黄埔军校参观

□ 贾晓明

1926年5月10日上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广东省农民大会及第六次教育代表大会代表900余人到黄埔军校参观。军校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校长蒋介石主持大会并代表校

方致欢迎辞；邓中夏、李立三、苏兆征等人代表全国劳动大会、广东省农民大会及教育代表大会代表发表答谢演说；秘书蒋先云代表军校同学致辞。

1924年1月，在孙中山的

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发展成为新

（接前页）

动室旁边办了一栏墙报，每期有四五十张稿纸，两个星期一期，由同学们自己编辑、自己抄写。

景宁街175号张凤仙小姐

笔者通过地图漫游截取了景宁街图像，反复多次翻看，175号似乎很难寻觅到了，于是准备放弃，抬头正巧看到一束阳光，仿佛在告诉我：山河依旧，往事随风，这段故事终究怎样结果？不必强求了。

在旧社会，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青年人没有选择权和话语权，封建包办婚姻毁了多少青年人的梦想和爱情。因此，当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在革命队伍中，有很多青年男女因为有着共同的

理想和信仰走到了一起。

“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入梦，愿你安好。”这是1947年的中秋佳节，周恩来写给远方妻子邓颖超的信，寥寥几字，却充分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的浪漫主义情怀，更表达了丈夫对于远方妻子的思念。革命时期的爱情就是这么美好，这么单纯，只要两个人精神契合，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信仰，那就是一生的守候，即便是一个人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了，另一个人也会发自内心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没有再找到这封书信的更多信息，但是以实寄封内容推测，这很可能是一封抗战期

间革命青年间传达爱意的书信。这位背井离乡的回族青年身处桂林李家村军校，想起远在家乡的凤仙小姐，在书信中还不忘记附上“中央周刊一件”借以传递必胜的抗战信念。不知信内说了些什么，分享了些什么，我想一定是在和倾慕的女子分享着背井离乡从军报国的乡愁和忧国忧民期望早日奔赴疆场的决心，同时向凤仙小姐表达着含蓄的爱慕之情。

如果真像推测的那样，待硝烟散去，祖国山河依旧，解甲归田的黄埔学生和心仪的凤仙小姐终成眷属，手挽手每日漫步在这条名为景宁街的小街道中，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和国民大革命的兴起。

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办一所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的学校”。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孙中山特别指出：“为得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工农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这就是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主旨，这就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使命。”

黄埔军校成立后，正值全国工人运动恢复、发展之时。军校师生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中，规定政治教育应“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工农群众的物质要求，革命的胜利亦必须靠工农群众的努力始能有所保障”，同时专门开设讲述工农运动伟大意义的课程，要求在政治教育方面“讲授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各三次”，以加深师生对“扶助农工”政策的理解。恽代英担任军校政治教官后，还特别编写了《本党与农民运动》《本党与劳动运动》两种讲授工农运动的教材。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都曾应邀在黄埔军校就中国

工农运动发表过演讲。

广大黄埔师生积极投身于当时的工农运动，连续采取多项措施，对当时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积极给予支持和保护，大力培训工农运动骨干，帮助建立工农武装，不仅有力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更与广大工农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早在1924年8月，广州工人代表会议决定立即编练工团军，“辅助革命政府，镇压反革命行动”，就得到了廖仲恺的大力支持。10月，黄埔军校接收广州工人组成的工团军到黄埔岛驻扎、进行训练，后又派1期生李之龙等担任训练教官。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黄埔军校组成了革命军人代表团参加大会，以表示对工人运动的支持。1925年6月，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军校政治部专门邀请了工运领袖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到校演讲，以加强军校与工人的合作。军校多次发表拥护和支持省港罢工的宣言，高度赞扬省港罢工工人的反帝爱国精神，肯定罢工的作用和意义。周恩来出席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并在作政治报告时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系，共同来打倒帝国主

义。”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及其他教官干部也受邀前往授课，以实际行动支援罢工。罢工工人纠察队成立后，黄埔军校接连派出赵自选等多名黄埔毕业生任教练员，负责纠察队组建和军事训练工作、充实纠察队的各级领导。

在省港大罢工斗争中，黄埔师生和工友并肩作战，不惜流血牺牲。6月23日，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黄埔军校师生在何应钦、蒋先云等带领下，与广州工农群众10万余人共同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遭到帝国主义租界军警的扫射，造成黄埔师生和工农群众的严重伤亡。“沙基惨案”发生后，黄埔师生更加积极地开展支援省港罢工的活动，召开援助省港罢工工友大会，决定“凡本校人员，月薪在30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一作为援助工友的费用”。10月30日，英帝国主义唆使陈炯明叛军残部千余人包围驻沙鱼涌的工人纠察队第10支队。该支队队长为黄埔1期生蔡林蒸。蔡林蒸率领工人纠察队队员坚守阵地，打退敌人数次冲锋。驻深圳的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率领一个排和工人纠察队一个小队前往支援。11月4日，纠察队予敌人以较大杀伤后，在当地农民自卫军的支援、配合下主动突

围。战斗中，蔡林蒸和多名工友不幸牺牲。为感谢黄埔军校师生的无私支持，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特向黄埔军校赠送“革命前驱”横匾一幅，广东铁路工人代表向军校赠送“东方的红军”锦旗。广州国民政府举行东征、南征时，由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就已经组织约3000名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支援东征、南征前线。工人纠察队则在广州维持治安，巩固后方，为国民政府取得系列军事行动胜利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黄埔师生还积极支援农民运动的开展。1924年8月，广东农民自卫军成立。成立当天，广东省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对自卫军发表讲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政治，认真进行军事训练，为保护农民利益，为保护广东革命政府而战斗。商团叛乱前，农民自卫军移驻黄埔军校，领到枪支85支，并在黄埔军校教官指导下，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后来又和工团军、黄埔师生一起参加了平定商团武装叛乱的战斗。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赴西江支援农民运动期间，军校政治部派出伍翔、武文生、冷相佑等9人随同前往做宣传工作。

1924年7月，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就接受了广州农民运

动讲习所全体学员到黄埔，进行为期3周的军事训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邀请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郭沫若、高语罕等先后在农讲所担任工作和讲课，其中，周恩来到农讲所讲《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课程特别受到学员的欢迎。同时，讲习所又聘请黄埔1期生任文君、赵自选等担任该所学员的军事训练教员。军事训练课程包括射击、刺杀、潜伏隐蔽、夜间演习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学员掌握了不少军事技能，成为日后广东和全国各地农民武装的骨干力量。

两次东征期间，黄埔军校政治部明确提出，要“特别保护农民”“我们陆军军官学校的军队特别和农民亲密”。在军校政治部的带动下，东征军所到之处“恢复农民协会”，“并协助农会训练自卫军”，积极发动东江群众参加革命。东征军得到东江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东征军前进途中，每天都遇到“无数农民，联袂偕来，更前行，所遇愈多，且多执青天白日及农会旗帜”夹道欢迎。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市国民党中央大礼堂开幕，与会代表共计502人，代表有组织的124万名工人和400多个工会组织。大

会由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人共同主持进行。英、俄、法、德、美、日等国家的工会组织代表也应邀参加。中共中央执委会、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都向大会发来了祝词。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邓中夏致开幕辞。

2日上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及第二次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正式会议召开，到会者有劳动大会代表400余人，农民大会代表200余人，新闻记者及旁听100余人。

谭延闿、蒋介石也应邀出席会议（在4月30日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预备会上，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和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几位外国代表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汪精卫因“身体不适”未出席会议）。

会议共进行了13天，讨论了12项报告，提交决议47件，并最终通过正式决议案9件，报告后决议案10件。大会的核心议题是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经验，并对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的高潮确定革命策略。全总副委员长兼副秘书长刘少奇向大会作了题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香港海员总工会、武汉工人代表团向大会作了报告，李立三等分别就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情况与中华全国总

工会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向大会做了介绍。

1926年5月8日，第三次劳动大会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交《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其中指出：“现我中国工人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唯一出路，即在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以及与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作殊死之斗争，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方能保证我被压迫民众之生存。钧府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心，代表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奋斗，为我全国工人阶级所爱护。敝大会谨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向钧府表示最亲挚之同情和拥护，特此前来，请愿出师北伐，打倒一切军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拯我人民于水火，释我领袖于囚狱。为工人复仇，为民众伐罪。敝大会全体代表当率领全国工人，一致参加，以为钧府后盾。”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是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同时于5月1日在广州开幕的。到会代表，除本省214人外，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贵州、江西等11省的18名代表也出席了大会。此次会议实际上“已略具全国大会的雏形”。林伯渠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的报告，介绍了国民党第一、

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农民问题的政纲与政策，号召与会代表“引导农民有组织的参加国民革命行动”，“武装团结起来”，“负起国民革命的责任”。大会共通过了二十几项决议（包括与劳动大会共同做出的），强调要“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联合各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大会还明确提出：“现在全中国皆在反动政治势力之下，只有国民政府所在地之两广有政治自由。当今北方国民军败退，张、吴重兴，帝国主义嚣张跋扈之际，人民应立即起来拥护国民政府，立即出师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0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邓中夏向出席第三次“劳大”的全体代表及大批旁听者介绍了马克思的一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过程及巨大意义。

5月9日，蒋介石宴请三大会议（第三次全国劳动暨第二次广东全省农民协会、第六次教育代表大会）代表，并赠送各代表纪念章。

5月10日，黄埔军官学校师生在军校内召开欢迎会，欢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全省农民大会和第六次教育大会代表。

蒋介石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他说：“革命军不是别人的军队，就是工农学群众的军队。”“革命军应当受工农学群众的指挥，来拥护工农学群众，不受工农学群众的指挥的，就不是革命军。”邓中夏说，他拥护蒋介石所说的“工农兵大联合”，并表示“打倒北方的反动派，统一中国，这个责任，完全是在黄埔军校各同志的身上，然而我们工农学界也不能放弃责任”。随后又有苏兆征、蒋先云等依次发言。

值得一提的是，发言的人中，只有李立三没有向蒋介石表示“敬意”和“感谢”，仅代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答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欢迎的盛意”，并指出：“广东全省的农民工人，年来统统拥护国民革命军，就是因为国民革命军真正能够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缘故。”李立三还根据劳动大会《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的精神，代表劳动大会表示强烈要求和热烈支持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李立三这个“与众不同”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人士的注意，也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北伐期间，蒋介石率部途经湖南醴陵时，特地抽出时间在他的专车上约见李立三的父亲李镜蓉，“表示关怀和尊敬”。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十二)

□ 熊子杰

第十二章

两岸同胞携手在台湾基隆挫 法军

1884年，中法因越南宗主权问题发生一场大战，从安南（越南古名）、云南、福建，一路打到台湾。法国内阁总理茹力费理（Jules Ferry）曾说：

在所有的担保品中，台湾是最良好的。是最适当的、最容易守的、守起来又最不费钱的担保品。

法国想通过战争向北京要好处，就想利用台湾做筹码，在此商业利益考量下，法国攻打及占领台湾只是被拿来当成了清法战争中与清廷谈判的棋子。今日美国以天价卖些不堪一击的武器及军备给台湾，目的与法国人一样。台湾还是个棋子。看看南海仲裁结果便知，台湾永远是被这些强权利用出卖的。

中法战争的会外赛：法国侵略越南

1858—1883年，法国在越南共发动三次侵略战争，目的就是

全面占领越南，再取中国云南。

1879年6月，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称：“法国必须占领北圻（今河内）……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清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清国腹地的人。”从土尔克的言论可见，法国真正的目的，就是假借越南之争，蚕食大清江山，进可借机占领一部分大清领土，退可要求大清巨额赔偿及贸易特权。

1881年7月，在总理茹力费理主导下，法国国会通过240万法郎的军费预算用于攻打越南。

1883年3月，法军占领南定（今越南南定省）。同年5月19日，清将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河内“纸桥之役”伏击法军获得胜利，法军上校李威利（又称李维业）身亡。法国政府随即宣布要“为她光荣的孩子复仇”。

1883年6月，法国政府拨款350万法郎给越南河内法军，成立北圻远征队及北圻舰队，以波滑（Bouet）为北圻法军司令，孤拔（Anatole Courbet）担任北圻舰队统帅，表面上是要为

李威利报仇，实际上是想借机侵略中国。

1883年12月，米乐任法国越南河内法军统帅。次年3月12日率1.6万人进攻越南北宁省，北宁失守，随后越南太原省和兴化（今越南老街省）皆失守。慈禧震怒，罢免恭亲王奕訢等5名军机大臣，并派李鸿章与法国议和。5月11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6月6日，法越订立《第二次顺化条约》，否定了清朝对越南的宗主权，从此中国藩属国越南变成法国殖民地。

中法战争初赛：“观音桥事变”

6月22日，法国将领杜森尼率约700名士兵抵越南北黎省的观音桥，声称前来接收越南谅山，要求驻守清军投降、撤军。清军守将广西提督王德榜由于未收到清廷撤守通知，自然不从。6月23日，法军竟毫无预警地向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双方发生战斗，法军死28人、伤46人，清军则伤亡300人，法军仓皇败逃，此冲突事件史称“观音

桥事变”“凉山事件”或称“北黎事件”（观音桥古名北黎），这是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的引爆点。6月28日，法国派驻北京代表谢满禄向清廷提出抗议，要求清守军7日内撤兵及赔偿法国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李鸿章同意撤兵，但并未同意赔偿。7月1日，法驻华大使巴德诺上任，再次要求清廷自越南全面撤兵及赔偿，与两江总督曾国荃在上海谈判，曾国荃断然拒绝赔偿，直至8月2日双方并无共识，清法战事又启。

中法战争准决赛：基隆之役

1884年6月26日（光绪十年闰五月四日），清廷诏令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当时台湾无巡抚，由福建巡抚张少栋兼巡，重点是做好军事防务抵御法国侵略。刘铭传来台前，先去向北洋大臣李鸿章谢恩，并取得李的全力支持，再往上海购买新式枪炮及军备后，率淮军旧部于7月10日启程赶赴台湾，7月16日抵达台湾基隆，7月20日进驻台北，与诸将共筹防务。

当时驻守基隆的清军有8营：恪靖军（左宗棠嫡系湘军）6营，由福宁镇总兵曹志忠统领；武毅军（淮军）2营，由记名提督章高元统领。清基隆守军至少有3000人，加上台勇，共有

四五千人。

1884年8月3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命副司令列士皮（Lespes）率3艘军舰攻打基隆。次日，列士皮船舰抵达基隆外海，要求清基隆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清军当然不理。5日，法舰向基隆炮台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台及营房，清军向高地撤退。孤拔指挥法军400多人从现在基隆港西21码头附近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破坏殆尽。

8月6日下午，法军已占领整个基隆市区，开始攻击基隆附近的高地，总兵曹志忠与提督章高元率湘军及淮军突击法军，双方发生激战，法军伤亡百余人，不得已退回军舰。第一次攻占基隆的计划失败。

巡抚刘铭传派擢胜营营官杨洪彪去拆基隆八斗子煤矿机器，将15000余吨存煤烧毁，目的是避免资敌。法军首战基隆失败后，第二次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及赔偿，清政府当然拒绝。8月23日，法舰突然转向中国福建，对福州发动袭击，将福州马尾的南洋水师所有11艘战舰及19艘运输舰全部击沉。法军此举目的是掌握台湾海峡的控制权，以利下阶段目标——封锁台湾。清朝被迫于8月26日对法宣战。

9月14日，孤拔请求挥军北上攻打旅顺及威海，法国国会不愿扩大事端引起各国干涉，仅授权孤拔占领基隆作为补给站。

9月30日，法军援军到了基隆，共14艘军舰，53位军官及1800名士兵。孤拔及列士皮分两路，孤拔率领11艘舰攻打基隆，列士皮率领3艘舰前往沪尾（今淡水）。

10月1日，孤拔率士兵再犯基隆，基隆港及周围阵地尽失，法军受伤约18人，清军损失400多人，大基隆区恐将不保。而此时刘铭传亲信李彤恩却三次来信告急，谓法军即将对沪尾发动突击，淡水状况危急。李彤恩对孙开华及湘军擢胜营极度没信心，认为湘军无战斗能力，所以不断要求刘铭传增援淡水。

10月2日早上，法军继续攻打基隆，登陆基隆。此时刘铭传连夜从基隆撤退，声称考虑到台北府城乃统帅部所在地，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淡水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退防淡水，以免法军突破淡水而直入台北城，所以仅留3营兵力驻守基隆狮球岭，主力部队移师淡水。刘铭传的决定非常有争议。法军对基隆久攻不下要求和谈，显然双方战力是势均力敌，且法军要的是煤

矿及施压清廷，这是刘铭传早就知道的，所以实在没有从基隆撤退的理由。刘铭传却听信李彤恩的告急信，贸然撤守基隆，令所有守军及台民不解及愤怒。

10月3日，法军再度攻陷基隆。10月4日，法军长驱直入基隆市街，占领东岸的小基隆山，而曹志忠部则死守月眉山与狮球岭，阻碍法军攻势，使其无法推进到台北城。

从结果来看，李彤恩的信息及判断都是错的，法军并未如李彤恩所说10月1日攻击淡水，主力部队还在基隆。在10月4日，法军还积极攻击基隆市区，意图占领小基隆山，直到11月2日，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港、月眉山、狮球岭，清军才退守，而法军登陆攻打淡水是10月8日的事。

由此可看出：一、李彤恩消息完全错误，法军10月8日才上岸攻击淡水，10月2日的炮击，还是清军主动的，法军反而被动还击。二、清廷及刘铭传明知法军目的就是攻下基隆取其煤矿及占领基隆，而非淡水，打淡水根本是次要的，所以法军主力军1800名一直留在基隆，10月2日才调600名士兵支援淡水登陆战，尚留下主力军1200名士兵攻打基隆。三、李彤恩对孙开华及湘军擢胜营战力的低估，

也是错估或偏见。孙开华及曹志忠属左宗棠的精锐部队，是湘军中最骁勇善战的部队。四、虽然刘铭传最后只留下3营兵力驻守狮球岭，主力部队全移师淡水，但从后来基隆港、月眉山等攻防来看，曹志忠仅以3营兵力足能抵挡法军，达到牵制法军的效果，证明基隆山区本就是易守难攻，当时如刘帅不放弃基隆，基隆是不会被攻陷的，那样，对基隆的伤害及战事的影响或许没这么大。

所以，由于上述错误资讯及研判，差点让台北甚至台湾北部沦陷，所幸有孙开华率领湘军、淮军、土勇（台勇）等奋勇阻挡及牵制，才没让法军得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见之后左宗棠、刘璈参劾刘铭传，并无诬陷之情形。

刘铭传在两岸近代史上享有声望及地位，大多数台湾人和笔者一样对刘铭传在台湾现代化中的贡献是肯定的，对其人也是尊敬的，不过基隆之役的功过及两刘之争的是非，这些年来陆续有许多台湾学者提出不同思考方向。笔者一直希望以历史的事实提供两岸读者一个新的思考方向，以期还原真相及促进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无论解读为何，绝不影响湘军、淮军及其他族群对台湾牺牲奉献的事实。

笔者特引述台湾最高研究

单位“中研院”著名学者许文堂教授的观点及研究，也就是基隆不该撤守！

许文堂在《清法战争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学、史实及集体记忆》中说，刘铭传“不顾部将之反对，‘舍基隆啖敌’，执意撤军两百里至新竹。不料，退至艋舺即为台民怒而围之，捉爵帅发，由轿中拽出肆毆，且诟之为汉奸、为懦夫，此事传出，亦为湘军所讪笑。所幸基隆法军为留守的曹志忠营及林朝栋率土勇三百人所阻……而淡水方面，则有孙开华等力战，逐退登陆法军。因此，尽管诏旨有‘谤书盈篋’之语，但值用人之际，刘铭传尚能保全，主要是依仗李鸿章之力保”。

当时守台湾清军，包含台北知府陈星聚、基隆通判梁纯夫、坐探委员李成瑞等都不同意刘铭传的做法，甚至刘铭传嫡系部属铭军也都不愿刘铭传从基隆撤军，铭军提督章高元等甚至跪求刘帅千万不要从基隆撤兵，但刘不为所动。台民更是气愤。刘帅原本是想撤退到新竹，而不是去支援淡水，此与他事后所上奏朝廷的情形又不一致，与他所言移防淡水差别也很大。如从基隆退至新竹，就涉嫌临阵脱逃。刘铭传似乎是知道法军援军到了，担心基隆、淡水甚至台北都将不保，于是想撤退

到新竹？不过最后在艋舺龙山寺被台湾乡民阻挡，刘铭传是被迫留在台北城内，也未参与淡水之役。

英国茶商陶德记载，刘铭传带着1000名士兵从基隆败逃到艋舺，有意挟带珠宝、金银、细软、粮秣，再往南撤退到30里外的竹塹（新竹），但被艋舺民众发现，他们堵住刘铭传，把他软禁在龙山寺。

根据清朝《法军侵台档》资料，淡水海关税务司法来格（E.Farrago）禀报：

刘爵帅退至板加（艋舺）地方，该地人民怒而围之；捉爵帅发，由轿中拽出肆毆，且诟之为汉奸、为懦夫。（陈政三《档案的故事第三集》，摘录自台北市档案管理局，2005。）

许文堂教授认为，此役后刘铭传为自保及袒护自己的亲信，却嫁祸部属兵备道刘璈，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多次严重隐瞒事实，涉嫌欺君之罪：

……基隆之战，刘铭传上折称：……我军伤亡才数人。

……实际上法军在此役中，一小时之内摧毁所有炮台，200兵力上岸搜索，面对2500以上兵力守军的反击，仅阵亡两

人……而清兵死亡在200人以上之谱，战况远非刘所自陈。

1884年10月1日战况也非刘所陈，严重有夸大不实，明明法军才死5人，却说成300人。并袒护部属李彤恩，及掩饰自己基隆退兵之失，竟谎称淡水之战是10月1日开打……

……刘铭传却为回护李彤恩，并掩饰自基隆退兵之失，故意上奏同日双边开打，淡水告急不得不赴援。（许文堂《清法战争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学、史实及集体记忆》，“中研院”，2006。）

……孙（指孙开华）密函左宗棠以辩白刘铭传诬其防护无能故舍基隆以救淡水之说，且言及刘欲逃往新竹之事……（《中法越南交涉档》第五册，“中研院”。）

由上述史料及许文堂教授的分析可以看出，刘铭传报喜不报忧、夸大其词，多次谎报战绩及敌我伤亡数字，屡犯欺君之罪，理当斩头。尤其是严重歪曲淡水开战日期的重要资讯，目的就是为掩饰其撤军基隆之错误。而基隆撤兵根本不是为淡水，而是为撤退到新竹，因此，刘铭传涉嫌临阵脱逃之罪，按当时的法律，如属真实，很可能

遭“斩立决”，只是朝廷碍于外患不断，正处用人之际，并为安抚朝中淮军势力，未拿刘铭传开刀，否则台湾历史可能大不同。

如今还原历史，孤拔攻打淡水，可能是以中国三十六计中的“围魏救赵”“声东击西”“暗度陈仓”三计进行。孤拔久攻不下基隆，心中于是萌生三计。于10月1日故意放出紧急攻打消息给淡水守军，就是希望刘铭传就近调动基隆部队救援淡水，如此孤拔便可轻取基隆，此乃“声东击西”；10月8日发动侧翼（仅600人）登陆攻打淡水，此乃“围魏救赵”；孤拔如能一举拿下淡水，就直攻台北，再从后方夹攻基隆，如此基隆清军在前后受敌之下势必无法久守，此乃“暗度陈仓”。对法军而言，刘铭传及李彤恩都中计了，只是淡水布满水雷且登陆战大败，无法暗度陈仓，最终功败垂成。如果法军得逞，非但基隆可能先失守，台北、淡水更不保，甚至危及新竹及全台。

10月8日，法军进攻淡水受挫惨败。

10月11日，法军失去斗志，只好拟定新的议和条件。清军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和谈。法国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海岸线。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一时中断。然而，

由于台湾海岸线太长，防守不易，封锁更难。左宗棠命湘军王诗正夜渡台湾南部，军民也皆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的封锁线。

11月2日，法军再次攻击基隆港，经过5小时的激战，清军退守。

1885年1月7日，法国的非洲军团援军到基隆。

1月20日，法军100多人进入大武仑，遭台勇击退。

1月24日，法军集结约1900名士兵准备攻占基隆月眉山。

1月25日，第一次月眉战役，法军中校指挥约1900名士兵分四路进攻基隆，其中一路袭击深澳坑，另外三路主力进攻月眉山，月眉山一度失守。

1月28日，曹志忠率林朝栋等台勇奋战，逼退法军，夺回月眉山头。

1月30日，曹志忠率林朝栋等反扑法军，夜袭法军营，双方发生激战，持续至次日清晨，曹志忠等才撤退，清兵伤亡约700人。

2月4日，法军集结约400名士兵，计划再度攻占大武仑，失败。

3月4日，第二次月眉山战役，法军再次发动攻击。当日凌晨3点，法军几乎全军出动，派

出约1280名法军自基隆八斗子登岸突击月眉山，和曹志忠部激战于深澳坑，最后法军夺下月眉山山顶。

3月5日，曹志忠和左宗棠派来支援的王诗正恪靖军结合，发动突袭，反攻月眉山山顶，王诗正年轻气盛，率军一马当先，试图仰攻夺回失地，双方都有伤亡。法军以三路围攻曹志忠，另外派军深入深澳坑后方。后路受创，曹志忠、王诗正等只得撤守，法军攻下月眉山。此日，法军有20人死亡、50人受伤。

3月7日，清军撤退至基隆河南岸的暖暖，而法军因大雨不停，弹药有限，无法再战，部队无法越过基隆河北岸，不过法军已控制基隆、八堵、基隆河以北等大部分区域，有22名士兵死亡、71名士兵负伤。4天战役（3月4—7日），法军42人阵亡、121人负伤。

3月8日，连续大雨，不利法军进攻，清军全部撤出基隆。

法军多次发动攻击，占领台湾北部，并以基隆为主要战场，就是想长期占领基隆，取得基隆附近煤矿及开采权，以确保法国远东舰队在远东活动所需的燃料及补给。

3月14日，法政府决定停止增援台湾战役，并命孤拔转占澎湖。

3月29日，孤拔率领8艘

战舰进攻妈宫城（今澎湖马公），清军将领梁景夫死守，与法舰相互炮击。

3月30日，法军在越南的战事不利，法军又在谅山吃了大败仗，消息传到正在攻打澎湖的法军，精疲力竭的法军更觉前途茫茫，意志消沉，斗志尽失。

3月31日，法军占领澎湖，镇守清军死伤惨重。法军死5人，伤12人。

4月3日，基隆法军撤至澎湖。

4月14日，中法开始和谈。

4月15日，法军正式解除台湾封锁。

5月15日，澎湖暴发瘟疫，孤拔罹患赤痢，澎湖法军因病死千余人，久攻不下台湾和越南的法军士气备受打击，进退维谷。法国国内民众也不谅解，极为愤怒。小胜的清朝廷却是欣喜若狂。

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全称《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中法双方正式停战。

6月11日，孤拔去世。

6月21日，法军撤离基隆。

7月22日，法军全部撤出澎湖。

法军官兵五六百人同葬在基隆法军墓园，澎湖还有一座孤拔墓，如今到基隆及澎湖都还看得到这些历史遗迹。